马国川 著

看中国

CHINA IN THEIR EYES

世界大师
基辛格
科尔奈
尤努斯
科斯
青木昌彦
赫克曼
李光耀
福山
眼里的中国

吴敬琏 资中筠
柳传志 俞可平
钱颖一 重磅推荐

与四位诺贝尔奖得主
六位世界知名政治家
三位世界顶级思想家
五位世界级经济学家以及众多知名学者对话
共同洞察建言中国改革与未来发展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看中国

作者:马国川

ISBN:978–7–5086–5558–1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序言
站在世界看中国

翻看这本《看中国》，我首先想到一个问题：过去30多年间，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言人人殊。有人从生产要素角度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便宜；有人从制度角度分析，认为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人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放权让利，调动基层的积极性，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了许多国际人士，发现他们也都在试图解答这个“中国之谜”。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人士对中国应对危机的效率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反思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

概括而言，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福利超越政府承受能力引发的危机，所以应该减少社会福利，提高社会效率；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贫富差距两极化的恶果，因此要均衡发展，人民应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应该说，两个问题都存在。本来人民能够享受多少福利，应该根据所在国家发展水平来决定。可是在民粹主义的压力下，各国政府竞相提高民众福利。如果社会福利长期超越政府承受能力，必然引发危机。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两极化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通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严重恶化，而且将会继续恶化下去。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注]。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相对还是稳定的橄榄型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慢慢演变为金字塔型社会，社会稳定度也在相对下降。

怎样才能找到经济发展活力和民众分享利益的均衡点？皮凯蒂建议，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左右。显然，这样做势必抑制社会活力，因此是不可行的。但是如果在贫富差距恶化面前无动于衷，任其发展，也会引发社会动荡。就大趋势而言，不能大折腾，还是要微调，既要照顾到民众利益，也要考虑到资本发展。显然，这是一个世界级难题，迄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完全解决。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与经济低迷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许多国际人士把中国作为一个标杆，通过中国来审视和反思自己。

2014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表文章指出，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障碍，“难以做出必要的决策以回归经济增长。在满足本国公民需求方面，一些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似乎不如威权国家有竞争力——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为此，布莱尔呼吁，“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民主，就让我们着手拯救它”。[注]还有国际知名学者福山，在苏联解体之初以“历史终结论”蜚声世界，但是近些年他的观点也有调整（详见本书《福山：历史终结了吗？》一文），承认民主制度存在失灵的危险。

美国的表现就很典型。在平衡机制的作用下，美国两大党尽管治国理念不同，但都是细微的政策调整，就像钟摆一样围绕中心运转。

可是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两党难以达成一致，政府施政发生很多掣肘。结果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中国不能因国际的赞美而自满，而是应该学习人家反躬自省的精神。我们应该借助“第三只眼看中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之处。

总的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是成功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释放了巨大的生产能量，如果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在过去不到4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发展过程中确实也积累下来很多的问题。

例如，多年来中国人均收入增长远落后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因为国家拿走的太多。政府投资过大，没有提供高效的公共产品。由于民众分享的发展成果有限，导致储蓄率很高，消费不足，高储蓄率也不能及时转化为有效投资，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处所在。而在发达国家，政府也拿走很多，但是人均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速度，而且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另外，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怎么正确处理资本方和广大民众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人们习惯以“左”或“右”分析问题。在我看来，“左”和“右”都有点极端，任何事情做过了头，都会对社会造成伤害。还是应该“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就是不哗众取宠，兼顾大多数人利益、采纳各种长处。其实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提倡的就是中间道路。走中间道路，防止矫枉过正，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民主制度有时制约力度太大，可能会影响政府效率。缺乏权力制衡的威权主义又使得一个国家权力太集中，万一

决策失误，就会出现大问题。有没有可能创新出一种制度，既保证一定的政府效率，又有适度的权力制衡？这是政治学家应该研究的时代性课题。

20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威权时代时，只要别出大问题，就能够获得高速发展，因为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唯一的问题就是必须得碰对人，像新加坡的李光耀。如果碰上希特勒，就可能满盘皆输。怎么碰对人？这就是历史的博弈论。怎样才能在历史博弈中胜出？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的答案是建立“思想市场”。

2011年底，年届百岁的科斯在《财经》年会上致辞说：“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他认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

可以说，《看中国》这本书就是一个“思想市场”。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外国人看中国。还有一部分是中国学者通过中外对比看中国。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是都对中国未来改革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值得认真对待。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与特色，但是不能因为特色而否认人类共同文明的存在。每个国家都有权利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只有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才能少走弯路。现在世界处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并且深受其益。中国既不能自惭形秽，妄自菲薄，更不能闭目塞听，故步自封。过去30多年，中国吸收了很多来自国际上的经验和智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保证。2013年以来，中国正在推进新一轮改革，当然更应该广纳群言，广集众智。

一个真正自信的人，必然是一个富有包容精神的人。国家同样如此。“俯视大江东去，开拓万里心胸。”站在世界看中国，聆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这既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具有的胸襟，也是一个现代大国应该拥有的气魄。

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

王波明

---

1.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 Is Democracy Dead?Tony Blair: For True Democracy, the Right to Vote Is Not Enough[N].New York Times,2014-12-4.

第一篇
中国与世界秩序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生，美国前国务卿，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政坛常青树”。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7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013年3月的一个上午，我匆匆赶到钓鱼台东侧的七彩云南酒店。当时全国“两会”刚结束一个星期，新一届政府领导人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国向何处去”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门开了，一位身材臃肿的老人扶着拐杖，慢步走了进来。他西装革履，一条蓝条纹的领带，一副黑框宽幅眼镜，虽然有些佝偻，但是步态稳健，气质从容，脸上始终洋溢着矜持的笑容。

这就是基辛格博士。他是来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作为一位贵宾，他总是受到中国高层的重视。就在那天早上，国务院副总理还和他共进早餐。

在餐桌上，基辛格不时停下手中的刀叉，细心地倾听大家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看法，措辞谨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就像一位身处席明纳（Seminar）的大学教授。当谈到中俄关系升温的时候，他引用了中国古代成语“远交近攻”。显然，他对中国历史很熟悉。事实上，数月前在他刚刚推出的《论中国》一书中，他就对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进行了鸟瞰式地描述，而且不乏新颖见解。

我仔细端详这位名闻世界的外交家。他有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下巴肥大，鼻梁高耸，蓝色的眼睛，敏锐的目光似乎有些忧郁，一头典型的犹太人的小卷发已经完全白了。自从1972年陪同尼克松访华开始，他就是继斯诺之后在中国最知名的美国人。

尤其令人称奇的是，40多年来中南海已经更换了数代领导人，白宫也换了七位主人，基辛格却成功地成为中国每一届领导人的座上宾。尤其是邓小平，自从1974年在纽约第一次会面之后，两人保持了长达20年的交往。风云动荡的1989年，基辛格为中美关系积极斡旋。那年11月他带着老布什总统的口信到北京，最后一次会见了邓小平。

因此，当2014年8月邓小平110岁诞辰之际，我向远在美国的基辛格发去了一份书面采访提纲。很快，我就收到了答复。基辛格给予邓小平高度评价，而且对邓小平之后中国的走向表现出谨慎的乐观态度。基辛格对邓小平的评价，又何尝不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评价?

尽管基辛格本人在国际社会上毁誉参半，著名记者法拉奇对他就有很多尖刻的批评[注]。但是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这位经历过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亲戚中有14人死在纳粹集中营）的老人是真心爱好和平的。1973年，基辛格和越南政治家黎德寿因越南和平协议谈判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由于中美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所以他希望中美两国“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为此“要培养真诚的战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

当然，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对未来保持着冷峻的警惕。他在《论中国》一书的后记里引用“克劳备忘录”[注]的历史案例，对中美可能陷入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战略冲突进行了推演[注]——虽然他认为中美完全可能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中美关系对中国的未来也极其重要。近年来，中美摩擦让中国的有识之士感到担忧，因为假如中美陷入冷战乃至冲突，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有可能中断，几代中国人艰苦奋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是中国的一位谏言者，他的话值得认真听取。

基辛格：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

采访时间：2014年8月中旬

采访地点：北京——华盛顿（书面采访）

马国川：您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先生是在1974年4月，当时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此后您和邓小平先生有许多次交往。在您的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基辛格：与数位非凡的中国领导人一道重启中美关系，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当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决定恢复高层交往时，双方都发出了战略转变的信号。然而，转变的形式和方向仍然尚未确定——在两个国家都有倾向不同方向的集团。

邓小平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定义其世界角色带来了勇气、信念和不可战胜的精力。他对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实事求是，对未来充满远见。他确立了很多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解放了中国人民的能量和创造力。

在国际舞台上，邓小平为毛泽东——尼克松会谈开辟的转变注入了实际内容。他与从前的“敌人”恢复关系，进一步夯实中苏关系，同时把美国变为紧密的战略与经济伙伴。在使中国适应20世纪70年代现实的过程中，他创立了具有几十年前瞻性的改革框架，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个人交往中，邓小平一贯务实，直截了当。他会打断讨论，直奔主题，视离题寒暄为浪费时间，把精力集中于双方共同利益上。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经历过个人和国家动荡的人，汲取了其中的教训，现在正致力于中国长期繁荣的建设中。他最终以超凡的能力实现了这一目标。

马国川：邓小平一生经历许多挫折，在70多岁重返政治舞台之后，推动了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作为一个经常访问中国、密切关注中国发展的国际人士，在您看来，邓小平的改革为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

基辛格：邓小平复出时，中国的经济几乎处于绝境。集体和组织化的农业几乎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人口需求，人均粮食消费量与毛泽东时代早期基本相同。只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充分体会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邓小平在维护了独立和团结的现代中国上台执政，但当时的中国并非经济大国。它没有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未触及现代科技。“文革”后，中国在很多方面仍被隔离在世界之外。邓小平确信，当代中国只有融入国际社会，才能维持其历史地位。

事实证明，计划经济无法管理现代经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停滞。他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以来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的束缚。前期的“继续革命”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一起被扔到了一旁，邓小平开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的标准。他仰赖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

邓小平带领中国社会从过去走向未经之地。中国生机勃勃的城市建设热潮、国家的全球经济地位——这一切在当时都是无法想象的。这些说明，伟大的成就最需要的是远见和实现它的勇气。

马国川：清王朝灭亡之后，中国开始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您如何评价邓小平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基辛格： 我观察到邓小平晚年为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开始的规模宏大的事业：推动共产党人接受权力下放和改革；从传统的封闭中国走向现代化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是中国过去常常拒绝的目标。我还目睹了邓小平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的不懈努力。

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提炼了他们眼中国家利益关切的远景和时代的需要。毛泽东领导了一场革命，使人民达到了团结的新高度，向世界表明中国是需要应对的新力量。

邓小平的方法完全不同：不吹嘘，而是通过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扩大中国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他开启了中国从革命时代到可持续发展及其制度建设的转变。

马国川：1997年，邓小平在93岁高龄时去世。您认为他为中国留下了哪些“遗产”？

基辛格： 邓小平带来了改变亿万中国人生活的经济改革。在19世纪中国维新派自强运动失败一百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让中国在改革的路上勇往直前，到现在中国终于以其成就和悠久历史重现辉煌。

中国成为今日的经济超级大国应归功于邓小平，因为他履行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最终职责——让社会呈现了崭新面貌。社会可以依赖一般行为标准运行，靠沿袭旧制来维持，但要有富有远见的领导才能得以进步。这样的领导人知道该做什么，同时还有勇气看准就干。

邓小平全力维护改革计划，反击所谓背叛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指责。他认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是“革命”行为。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时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为了捍卫改革，邓小平在国家政策中极力主张实用主义和国际接轨，并被随后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重申。这些变革改变了中国历史及当代世界格局。

马国川：在您看来，现在的中国领导人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应对？邓小平的智慧对于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启示？

基辛格：中国国家领导人向人民列出了一长串需要完成的任务，其中包括打击腐败，提高贫困省份的发展水平。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处于发达社会水平，而西部地区还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实现社会和谐很困难。中国现在的劳动力正在老化，也更为熟练，导致一些基础制造业岗位流向越南、孟加拉等低工资国家。随着中国逐步变成城市化社会，重大任务还包括在领导人和农民之间建立更多联系渠道，培养村级民主选举，提供政治透明度。

习近平主席确立了堪比邓小平时代改革的愿景。这包括制度改革，使上亿人口由乡村进入城市，重新确立中国经济的方向，同时与美国绘制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等等。

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从他们经历的中国近代史汲取鼓励与教训。这些政策的成功代表着邓小平开启的历史进程将得到有力的延伸。

马国川：您曾提出中美关系应当“共同进化”，怎么理解“共同进化”？

基辛格：中美合作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惠，而是关系到双方国家利益。这适用于邓小平时代，今天亦然。这种伙伴关系的必须性在当前可能更为迫切，因为当代问题的广泛性，例如能源、环境、恐怖主义等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单方解决。

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是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马国川：近些年来，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有些人士担心，

中美有可能走向冲突。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中国和美国能够培养真正的战略互信吗？

基辛格：中美关系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障碍，但是中美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扼杀太平洋两岸一代人取得的进展。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该成为零和博弈。要培养真诚的战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紧张关系并不是新现象，无怪乎两国的有些学者预测对抗。但当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本质及现代武器的威力时，主要大国的冲突对双方都将是毁灭性的。当冲突结束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今天面临的同样任务：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和美国同为重要且互相合作、互相尊重的成员。

力量的平衡仍然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元素，但是管控平衡的传统手段需要通过基于共同目标的合作进行强化。诸如“太平洋共同体”和“共同进化”等概念强调，尽管美国和中国是有着不同历史的国家，但他们还同为一个共同体系的重要部分。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依赖于中美发展一种共同的目标感，尽管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竞争。

---

1. 法拉奇. 风云人物采访记[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2. 《克劳备忘录》是1907年元旦时英国外交部高级职员艾尔·克劳向英国国会提供的一份战略报告，该报告极具说服力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形势，认为冲突是各国关系的固有结果，因为各国互不信任，都以最坏设想做准备，最终无人在危机中让步，窒息了外交空间，冲突必不可免。
3. 亨利·基辛格. 论中国[M]. 胡立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1925年生，美国政治家，曾任尼克松总统军事助理、福特和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是共和党内外交政策的领军人物。

同样的事件，当事人却往往有不同的回忆，在外交史上更是如此。1989年7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和一名秘书，不带警卫和其他人员。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回忆说，当他所乘坐的经过伪装、涂掉标记的美军运输机进入中国领空时，由于中方没有通知空防部门，中国军方发现这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后，打电话请示杨尚昆主席要不要把它打下来。杨主席告诉部下，不要开火，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飞行使命。[注]

可是，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回忆录里说，“中美两国就斯考克罗夫特专机进入中国领空的路线和时间事先进行了充分的磋商，中方为此做了周密的安排……美国专机正是在中方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在这种情况下，斯考克罗夫特所说的‘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注]

不管怎么说，斯考克罗夫特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早在1972年，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军事助理，毕业于西点军校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就参与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破冰之旅”。1989年，斯考克罗夫特两度担任总统特使秘密访华，推动中美关系重新走出谷底。邓小平在会见时请他转告老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2013年夏天，我在北京顺义的一家酒店采访了斯考克罗夫特。当时他已经88岁了，但是没有丝毫老态。他身体挺直，目光锐利，俨然

一位威严的将军。事实上，他曾长期在美国军队任职，1974年晋升为空军中将，1975年底退役。

在美国，斯考克罗夫特是和基辛格齐名的重量级政治家。他是唯一曾为两任总统（福特、老布什）服务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过，斯考克罗夫特更大的历史作用彰显于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结束冷战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为人低调谦和，极少出现在媒体面前。40多年来，这位美国共和党的元老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他和邓小平以来的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尽管面临一系列国内问题的严峻挑战，但是中国和美国经济体量距离的缩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比较快地到来。

在那次专访中，斯考克罗夫特全面阐述了对中美关系以及世界热点问题的看法。他说，“中美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世界观也因此会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双边关系，这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2008年奥运会以后，“和平崛起”受到了国内鹰派人士的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是一股危险力量，绝不会允许中国“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应该坚持追求世界大国甚至超级大国的地位。为此除了经济崛起，还要军事崛起。在充满民族主义的喧嚣声中，中美之间出现了“信任赤字”。

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两国有普遍的、共同的全球目标和利益，不能只顾各自国家、民族的利益。”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足够大的，中美双方可以有一定的共识。他呼吁中美加强沟通，努力消除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促进互信，“如果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进一步加深，将进一步促进中美合作，避免某些危机的再次出现。”

斯考克罗夫特：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全球目标和利益

采访时间：2013年7月1日中午

采访地点：北京顺义和园景逸大酒店

中美两国不能只顾各自国家、民族的利益

马国川：“斯诺登事件”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也影响着美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您怎么评论这个事件?

斯考克罗夫特：抱歉，我现在不想讨论“斯诺登事件”。这个事件涉及网络安全问题，这对中美双方都是挑战。

一方面，美国对于中国的防务政策、军事能力有一些质疑，美国企业也担心自己的知识产权，甚至非常焦虑。另一方面，中国也非常关注对国内网络空间的渗透和侵略。

网络安全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目前还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对于这类问题，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应该坐下来认真地对话协商，寻求解决之道。我们有双边工作组在研究这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也讨论过。未来需要努力确定一些规则，通过持续的探讨来解决这个问题。

马国川：其实除了网络安全之外，中美之间还存在其他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

斯考克罗夫特：确实，这些问题都需要找到解决的途径。要做到这点，需要建立中美之间的互信。在过去40年里，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双方的了解日益加深，对彼此观点的理解也日益加深。虽然中美两国关系也发生过一些或大或小的危机，但是每一次双方都理智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进一步加深，将进一步促进中美合作，避免危机的再次出现。

现在中美两国就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的一些重要议题正在积极接触。诚然，中美合作的现状不尽如人意，在合作中有一些空谈。现在中美之间有所谓的"信任赤字"，我也不奇怪。

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一次性来解决，但是很难建立互信关系，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上建立这样互信的关系。我们确实应该谦虚地正视这个现实，努力消除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

实际上，中美比之前更加了解对方，现在信息渠道发达，包括各种媒体，如电视、电影、互联网，因此在信息中也有更多的选择，它们有助于我们互相了解。还有其他一些力量，像教育、文化、科技等共同塑造着我们的未来。

马国川：由于文化的不同，中美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差异，似乎很难弥合。

斯考克罗夫特：中美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世界观也因此会有很大不同。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尽管民族国家还是重要组成因素，但是基本服务、劳动力、技术还有思想，现在都是没有国界的。共同生活在这样的全球化时代里，尽管中美之间有分歧，但是没有理由不去建立两个大国之间的一种新的双边关系。

习近平主席2012年1月访问华盛顿，以及他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庄园的会面，都提到了这个问题，而且非常认真地提出了一个"新

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不管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战略上，都要寻求建立一种这样的关系：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建立一个新的权力，同时不去减少另外一个国家之前获得的特权。我们需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有普遍的、共同的全球目标和利益，不能只顾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亚洲，中美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

马国川：诚如您所说，中美两国不能只看各自国家、民族的利益。可是近年来美国的一些举措引起了中国的疑虑，例如，美国“重回亚洲”就被认为是要控制亚洲。

斯考克罗夫特：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对于美国来说，在亚洲的联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我认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存在是在推动本地区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美国参与亚洲的事务是一种最好的安全保证，对中国方面的安全也是最好的一种安排方式。

鉴于中美的历史，两国之间可以有更多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和交流，很多场合都可以推动这样的双边外交互动。通过这样的互动，可以自由、深入地交换我们的意见。

所以，我也很高兴习主席邀请奥巴马总统访华。在我看来，这种非正式的会谈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理念：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如果相互间有了危机，要马上做出反应，以最好的方式解决问题。

马国川：亚洲地区越来越成为世界事务的重心，有许多热点问题需要中美密切合作。作为一位政治家，您认为两国应该如何加强合作?

斯考克罗夫特：面对亚洲的各种局势，中美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减少我们之间的分歧，加强合作，密切沟通。例如，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问题上，中美合作越来越重要。

当然，在如何应对朝鲜的问题上，中国也要做出一些艰难的抉择。中国一定要非常清楚，朝鲜下一步要做什么，未来和朝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显然，现在平壤确实发现自己比以往更加孤立无援。遏制朝鲜的核企图，是中美的共同政策。

我们要减少全球的核扩散，特别是伊朗在这方面所造成的风险和威胁。在我看来，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政策是非常危险的。让人高兴的是，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和联合国合作，这实际上意味着为解决伊朗核问题开启了一扇大门。我非常乐观，未来伊朗政府将会回到谈判桌前，讨论解决去核化问题。我相信，肯定会由中美各国官员一起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中美需要合作但是还没有开始讨论的，就是南亚问题。为什么在那里的合作非常重要？就是为了避免南亚可能会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南亚，我们两国都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都一定要成为保护中美利益的国家。

马国川：目前亚洲的一个热点就是叙利亚问题，迄今没有解决的迹象，中美之间的分歧也很大。

斯考克罗夫特：显然，对于世界来说，叙利亚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另外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在短期内成功结束这个国家的冲突。对于如何解决叙利亚问题，中美之间的分歧确实存在。

但是我们可以回头看，在利比亚问题上，2011年3月联合国通过了1973号决议，允许国际社会使用武力来保护利比亚的平民。中国和俄

罗斯并没有反对，而是弃权了。后来，根据联合国决议，美国和北约使用了武力，而且把卡扎菲推翻了。

我想，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中国的传统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在中国看来，在利比亚问题上可能犯了一次错误，不应该在叙利亚犯第二次了。

坦率地讲，这种方式需要认真思考，在双方交往中需要以不同方法看待这些问题。叙利亚战乱每年有数万人死亡，这种局面无论如何是不应该持续的。在叙利亚最近的冲突中，俄罗斯和美国减少了合作。我希望，中国、美国、俄罗斯都加强合作，来停止这样的暴力冲突。

我们当然不能把所有的基本问题都解决掉，那些令人棘手的问题可能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来解决。我认为，我们目前可以做的最大努力，就是考虑如何让叙利亚尽快停火。

中国面临严峻挑战

马国川：2013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升温，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们注意到，一些美国人士认为这将影响中美的关系。您怎么看待中俄关系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斯考克罗夫特：我基本上是乐观的。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看到，中俄一直没有什么太友好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实。而美国和俄罗斯也不是那么容易打交道。

但是我认为，如果中、美、俄能够认真地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且认真对待相互关系，那么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三角关系。无

论如何，重要的还是需要合作的精神，要发展相互合作，来共同解决相关问题。

马国川：您曾经担任福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是见证历史的人。美国和苏联的历史已经证明，不同制度国家的沟通是非常艰难的。有人悲观地预言，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将来也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

斯考克罗夫特：苏联的主要战略目的是想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它的影响力，使更多国家和地区模仿苏联的政治方式。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有信心的，但是它并没有任何的意识要影响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并以此扩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这是中国和当年苏联的最本质的区别。因此，美国的态度也会是不同的，这是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的根本不同。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中美合作的空间非常大。例如，在能源方面，中美双方都有很多地方可以提供给对方，特别是在清洁能源和环保方面。对于世界来说，中美是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我们完全可以更深入地相互合作，包括石油、天然气、页岩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各方面，都可以根据各自的需求进行合作。

中美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心来共同探索、研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我们也希望借此来帮助改善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这都是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

马国川：您多次来中国访问交流，关注中国发展。在您看来，当今中国国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斯考克罗夫特：我不是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没有很好的研究。不过，我注意到，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水、土壤的污染问题一定是非常严峻的挑战。还有农村和

城市之间的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财富的重新分配等问题，这些都是对中国最大的挑战。而且目前中国社会处于快速变化的阶段，因此这些挑战就显得更加严峻。

马国川：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应该怎么应对？您对中国改革有什么建议？

斯考克罗夫特：我不太清楚中国应该做什么，我自己感觉中国的经济发展远快于它的政治变革的速度。怎么改变这种不平衡，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遗憾的是，我不是很清楚中国改革具体的步骤。

我曾经见到过习近平主席，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非常放松的人。他也让我想到朱镕基总理，朱镕基也是非常有信心的、非常重要的领导人，邓小平也一样。他们都是有决定性的重要领导人，忠诚、敬业。中国正在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中国也在继续实行着邓小平30多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政策。

中美共识在增加

马国川：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经济学家预言，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您看来，这个预言能否成为现实？作为一位政治家，您认为，中美冲突是否可以避免？

斯考克罗夫特：中国和美国经济体量距离的缩短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缩短，而且我相信会比较快。

但是，中国和美国对世界的观点是否有如此大的不同，以至于要发生冲突？中国和美国可以用相似的方法看待这个世界，因为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这个世界是足够大的，双方可以有一定的共识。事实上，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困难问题，都需要中国和美国的合作。解决任何问题，两个国家共同参与都比没有两个国家参与要好得多。

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到过去几年的欧债危机，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差别在加速缩小，而且这种加速所带来的结果，并不是中国和美国或者中国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失去了在重大问题上的共识。相反，正因为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及重要地区在很多问题上有自我利益，使得它们之间解决问题的共识比以前更多了。

马国川：因为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现在包括中国有很多人对于美国有深刻的怀疑，认为两个国家不可能坐在一起谈论关键问题。您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否有信心?

斯考克罗夫特：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在更多的领域之间，中国和美国确实出现了更多不同的考虑、不同的利益和一定的矛盾，这是无可讳言的。这也是因为中国的体量和经济成长以后，它的影响力开始扩大到更大范围，从而与美国产生了某种“摩擦”和“碰撞”。

不过，在朝鲜问题、伊朗问题、全球变暖问题，包括核武器扩散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的基本利益和立场并不是那么不同。当然，我们确实需要花更多精力加强相互了解。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加利福尼亚的会谈非常重要，是因为这些会谈可以使双方领导人更多地理解双方之间的不同。

随着中国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进一步介入那些与中国国家利益不直接相关，但是对全球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务，中美两国合作的基础将更加广阔和深入。随着两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而不仅仅

是在双边关系上的共同关切越来越多，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比过去更加顺利。

马国川： 基辛格博士在《论中国》一书里讲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大国，因为不断地相互怀疑，即使本来没有想要冲突，但最后走向了冲突的悲剧结局。中美之间有无这种可能呢？中国崛起之后，在未来的世界格局里，美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今天有什么不同？

斯考克罗夫特： 有可能，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对话和交往非常重要。

在未来，中国和美国可以相互扮演合作的角色。大家应该坐在一起谈一谈，绸缪未来。例如，朝鲜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出现问题的严重性。这样的交流有助于增加双方的互信，形成更加全面的合作关系。

我有幸与奥巴马总统、习近平主席交谈过，他们非常有智慧。我也有这样一个感觉，他们可以一起合作。现在他们都在致力于改善和提高双边关系，这样对中美双方都有利。当然，任何国家关系都不会一帆风顺，尽管中美关系充满曲折，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两国人民能够继续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推动和平、繁荣、安全，我们一定会成功。

非常令人兴奋的是，在全球文化中，我们的后代并没有因为新技术或者是语言障碍而失去信心，这点我也看到了。我四岁的小孙女也看中国的卡通片《你好，凯兰》。

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会有创新。他们将有新的思维方式，探讨新的想法，看到新的世界。在政策上以及态度方面都会有新的东西。对

他们来说，语言的差别不是问题，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能限制他们实现的能力。

面对未来，中美必须以开放的态度来思考如何共同经营我们的事业。

---

1. 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M].胡发贵，胡传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 钱其琛. 外交十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1940年生，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的创始人，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我来自孟加拉，一个距离中国并不遥远的国家。”在寒冷的夜空下，74岁的穆罕默德·尤努斯站在徐州市陆口村的小广场上，微笑着向村民们介绍自己。村庄里最多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每个人脸上都写满惊奇和兴奋。

那是2014年的冬天，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中国的首个项目点落户在苏北地区这个偏僻的村庄。本来是到北京访问的尤努斯，执意要到真正的中国农村看一看。我作为一名记者，跟随他由北京乘坐高铁，然后又换乘大巴车，花费了近五个小时才抵达骆马湖畔的乡村。当天晚上，他就住宿在村庄里，反而是我们一众记者住进了附近邳州市的豪华酒店。

第二天我们赶到陆口村，又跟随尤努斯访问小额贷款的农户。他毫无倦容，有说有笑，神采奕奕，就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他几乎和每一位农民都打招呼，还抱起农民的孩子合影。我能够感受到尤努斯对于乡村的真诚热爱。

其实，尤努斯出身于上层社会，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大商人。尤努斯在美国留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曾在美国大学任教。1971年孟加拉独立后，他回到祖国，担任吉大港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1974年，孟加拉发生严重的饥荒，尤努斯开始寻找解决饥饿与贫困的对策。就像他在自传里所说的那样，“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仅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它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虽然你意识不到，

一旦拉开距离，事物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我选择‘蚯蚓’的视角。我相信，如果我贴近贫困去研究，我会更深切地理解它。”(注)

1976年，在一次乡村调查中，他把27美元贷给附近农村最贫困的42名妇女，使她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尤努斯由此开创了独特的小额贷款模式，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底层民众。1983年，尤努斯创办了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意为“乡村银行”）。迄今为止，格莱珉银行已成为孟加拉最大的农村银行，是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

格莱珉银行不但让数以百万计的孟加拉妇女摆脱了贫困，而且被世界许多国家学习和推广。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2006年尤努斯与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颁奖词高度评价尤努斯的贡献：“尤努斯通过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向孟加拉国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提供小额银行贷款，使这些在通常金融制度下无法得到信贷的人有了发展的起步资本。小额信贷为社会最贫困阶层提供了发展经济和人权的前提，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和有权过上体面的生活。尤努斯的乡村银行已证实，哪怕是最穷的穷人也可以为自身的发展作出努力。这适用于任何文化和文明。”

诺贝尔和平奖经常引起争议，但是尤努斯获奖却得到国际社会一致认可。中国政府也非常赞赏格莱珉模式，希望借助它消除贫困。虽然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近2亿贫困人口。即使按照中国的标准，也有8000万贫困人口。事实说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完全消除贫困，而且极度贫困也会制约经济发展。单纯靠过去那种政府扶持的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注)。

在考察农户的路上和行驶的客车上，我对尤努斯先生进行了专访。他说，“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所以最重要

的还是要鼓励和激发民众自己的力量。”

他坚信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是完全可能的，“我的理想，就是看到这个世界摆脱贫困。”这位满头华发的老人不像一位闻名世界的银行家，而是更像一个充满悲悯情怀的哲人。

尤努斯：争取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采访时间：2014年12月16—17日

采访地点：江苏省徐州市陆口村

政府一定要创立一个自由空间

马国川：您创立的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影响很大，许多在农村进行的小额贷款项目都把格莱珉模式作为榜样。格莱珉银行致力于帮助穷人摆脱贫困，那么在帮助穷人方面，政府应该做什么？

尤努斯：我不相信自由放任的政策。在消除贫困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它可以改变很多机制。比如说，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改变金融体系，从而改变资源的分配。政府也以可以支持社会企业，创立小微银行，包括穷人银行。

政府可以创造一种环境，让所有人都获得良好的、高品质的教育。政府也可以建立更有效的市场体系，给底层人群巧妙的激励机制，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总之，政府可以制订许多积极的政策。

马国川：看来，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尤努斯：最重要的是，要允许公民自己能有改变和消除贫困的动力。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鼓励和激发民众自己的力量。政府一定要创立一个自由空间，鼓励公民自由发展、自由参与，政府不随意干预。政府可以创立一些规则，但是要确保这些规则支持公民自由，使人们释放出潜力，不会把社会活力“绞杀”。

马国川：中国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慈善事业，长此以往，贫困也可能最终被消除。

尤努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在想帮助穷人的时候，通常向他们提供慈善援助。但是慈善并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它只是平息我们的良知，使我们得以继续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为穷人的生活担忧。真正的问题是为所有人创立一个平等的竞技场，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机会。穷人一旦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权，他们就会成为最坚定的战士，为解决人口问题、消除文盲，过更健康美好的生活而斗争。

马国川：格莱珉模式也被推广到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推行格莱珉模式的过程中，您是否遇到过困惑？毕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不同，在推广格莱珉模式的时候，是否碰到了一些困难或阻力？

尤努斯：在文化、气候与发展水平迥异的几十个国家里，格莱珉模式都运转得很好。在不同国家遇到不同的困难，这是很自然的，包括法律体系不同、观念差异，不过都是一些事务性的障碍，没有阻碍我们做下去。

我没有困惑。我一生致力于做一件事，就是帮助穷人脱离贫困和饥饿，所以我只有快乐和幸福。我的理想，就是看到这个世界摆脱贫困。这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会被描述为穷人，没有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到那时，“贫穷”这个词将不再具有实用的意义，它将只被用来理解过去。

马国川：经历多年的奋斗以后，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人类真的能够争取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吗？

尤努斯：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是完全可能的。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确立了到2015年将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也许有些国家完不成目标，但是很多国家都会如期完成这个目标。孟加拉已经提前两年半完成了这个目标。到2030年，孟加拉应该会完全地消除贫困。就是说，到那时孟加拉将没有一个人处于联合国定义的贫困之中。

联合国马上会宣布下一个15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一条就是，到2030年全球消除贫困。所以说，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并不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目标，而是高度可实现的目标，而且很快就会成为事实。

马国川：穷人生活困苦，缺少维持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足够的食物。从中国的经验看，反贫困面临着许多困难。

尤努斯：在与贫困做斗争的世界上，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很多人口脱离了贫困，其速度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贫困是一个绝对指标，而不是一个相对指标。联合国有一个绝对贫困的标准。只要你相信消除贫困是可能的，为此采取相应的政策，设计消除贫困的机制，那么结果就会按机制发生。贫困是完全不必要的，贫困不应该属于人类。

马国川：穷人之所以成为穷人，是否和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权利贫困是产生穷人的主要原因吗？

尤努斯：我完全同意，很多地方的贫困是和民众权利缺失有关系，实际上是权利贫困导致了生活贫困。贫困并不是穷人创造出来的，它是由社会的结构和社会采用的政策创造出来的。一旦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改变了，你就会看到，穷人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主张金融权利是一个基本人权。很多时候是因为剥夺了穷人获得金融的权利，穷人才成为贫困群体。所以我反复讲，借贷是人权，是穷人也应该拥有的权利。而为穷人提供小额信贷，是消除世界性贫困的最有力的武器。格莱珉的经验表明，如果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无论它是多么微小，穷人都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贫困是由于人类的一些失误造成的，是强加给人类的一个非必要的悲剧。如果把导致贫困的障碍消除了，贫困就不存在了。

市场经济不一定是“嗜血”的赛场

马国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空前繁荣起来。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当经济总体繁荣时，贫穷和饥饿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以国际公认的赤贫线每天1.25美元统计，到目前为止，全球70亿人口中还有11亿生活在赤贫线以下。这是为什么呢？

尤努斯：从分配意义上说，现在的市场经济是这么一种机制：上层会汲取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而下层则处于弱势状态，不能获得足够的资源。这种不平衡状态不一定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快速地发生改变，所以很多贫困还是持续存在。这是一个现实。因此，需要通过创建一些新机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把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往上提

升，即使是社会的贫困阶层，也可以相对不再贫困。贫困最后应该进入博物馆。当然，分配的不平等会持续下去，甚至会越来越大。

马国川：就是说，不平等会继续存在，但是贫困会消失？

尤努斯：对，绝对意义的贫困会消失。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财富分配的差异，肯定是会存在，甚至会更大。因为底层向上移动一英寸的时候，上层可能向上移动了一英里，这种差异一直会持续存在。但是对底层来说，一英寸可能就会让他（她）脱离了贫困。一般认为，经济发展就是意味着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不断提高。我不同意这种对于发展的定义，我认为它遗失了发展的精髓。因为在国家经济好转、GDP不断增大的同时，穷人的状况不一定就能够得到改善。对我来说，处于总人口底层的50%的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变才是发展的精髓。甚至更为精准地说，发展的定义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人口底层的25%的人们的生活质量之上。

马国川：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作者提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如果是的话，怎么才能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

尤努斯：我还没读过这本书，但是听到一些相关的讨论。我同意皮凯蒂的预测，假如不做出努力去改变，未来世界的贫富分化会恶化。因为现有的机制设计有问题，它错误理解人类的本性。现有的经济理论的假设是，人类是利润追逐者，利润是唯一的动力，每一个人只想自利，而不顾忌其他所有人。

这种对人类本性的错误假设，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身会成为事实的预言。因为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理论，相信人类是利益追逐者，然后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信念去追逐利润。结果，我们的行为就和信念一致

了，我们追逐金钱，追逐利润，把金钱当成上帝。我们变成了制造金钱的机器。

人类其实不是动物，更不是机器，而是一个更大的存在。这种自利机制的经济学理论，把人的含义给缩小了，缩小了人类的价值，矮化了人类的存在。经济学必须展示出，市场经济不一定必须是“嗜血”的资本家的赛场，它可以是所有想把这个世界向正确方向引领的好人的竞争场地。

马国川：那么在您的观念里，人类不是自利的吗?

尤努斯：人类是自利的，但同时也是无私的，二者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当我们承认人类自利的时候，就创设了商业机制，来满足自利的本能。当我们承认人类无私的时候，就需要创设一种新机制，来满足无私的本能。社会企业就是满足人类无私本能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当承认人类自利和无私两种本性同时存在的时候，就会演化出两种相应的模式。一种是基于自利基础上的商业企业，一种是基于无私基础上的社会企业。这两种机制应该同时存在，让人们去做选择。对年轻人应该进行相应的培训，然后让他们自由地做选择，是去做商业企业，还是去做社会企业，或者同时都做。如果两种选择同时存在的话，整个世界会变得很不同。

马国川：在您看来，社会企业与传统企业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尤努斯：传统的商业企业是上层从下层汲取资源，社会企业则是把资源从上层往下层输送。社会企业是为社会良知所驱动的企业，它可以成为基于贪婪的商业企业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我设想，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种类的人构成的。一个极端是寻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全无社会考虑，只要企业产生一种最大化的利润就行了；另一个极端是那些被社会良知有力驱动的活动家。他们受到

吸引，在社会回报最大化的事业上投资，只要那些企业在经济上能够生存下去即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大多数企业家以一种使他们得到最大程度自我实现的方法，将利润与社会综合在一起，通过社会承认与奖赏等各种各样的手段，社会可以越来越多地对企业家产生影响，使他们朝着为社会良知驱动的投资方向前进。

可能很快又有一场新的危机

马国川：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您和很多经济学家的观念、信念都非常不同，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经济学家认同您的观点？

尤努斯：有多少人认同？我不知道，反正我挑战很多经济学的理论。我认为，没有了人性的一面，经济学就像石头一样又干又硬。

马国川：看来，您对市场经济是有一定怀疑的。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受到了人们的批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怎么评价市场的作用？

尤努斯：我并非一个资本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相信自由市场的威力和资本的力量。不过，在我看来，现有的这个市场体系是有缺陷的，问题经常会阶段性地浮现。2008年的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叫醒服务”，它提醒人们，市场经济体制是有问题的。

其实，这种“叫醒服务”很早就存在，而且反复不断地告诉商业社会的领导者，不要回到过去，不要回到原来的市场体系，这是一个错误的路径。很多人被叫醒了，感知到了危险。但是折腾一下又睡着了，没有捕捉到“叫醒服务”背后的信号。因为人们忙于解决不断出现

的这些问题，没有充分地去思考，没有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机制是内生于市场的。

我认为，整个世界收到“叫醒服务”后，应该认真思考信号的含义，创建一套新机制，重新设计整个市场体系，这样才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遗憾的是，2008年的“叫醒服务”没有被有效地利用，现在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大家很开心。最终结果是，可能很快又有一场新的危机，一场比2008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

马国川：那么，如何才能够避免新的危机呢?

尤努斯：对目前的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体制，需要重新调整，使得上层不再继续获取额外的资源，而是要让下层在分配体系当中获得更多的额度。社会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创办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社会良知的驱动下投资社会企业，这是避免危机的一个有效办法。社会良知能够像贪婪的欲望那样激励人，甚至更为激励人。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市场上发挥作用，去解决社会的问题呢？这样的人并不稀少，我们越寻找，越会发现他们，也越容易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马国川：您对人类的未来似乎非常乐观，这种乐观主义的思想是不是受到了南亚哲学的影响？比如说，甘地、特蕾莎修女这样的哲人是否对您有影响?

尤努斯：南亚文化当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不过不同国家也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我和甘地、特蕾莎修女有共同，也有不同。这种同与异并不一定局限于南亚的历史文化情境里面，而是全球的现象。

甘地是一位政治家，所以做了很多政治家的事情。甘地相信乡村的力量，在乡村进行动员，从来没有做过企业。而我是一个企业家，相信所有人，相信所有人的力量。

特蕾莎修女一生致力于为穷人服务，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她主要是从慈善的角度来帮助那些贫困的、弱势的底层民众。她不是商人，也不做社会企业。她是一个修女，她的行为基于她的宗教理念。

我没有特蕾莎修女那么强烈的宗教信仰。我是一个银行家和企业家，旗下有很多产业，帮助穷人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我的信念。我没办法证实这些信念，但是我认为有些事情应该这么去做，然后就根据自己的信念，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去做。

马国川：在您年轻的时候，曾经为争取孟加拉独立而奋斗，并且有机会成为一个政治家，为什么后来投入到帮助穷人的事业中去?

尤努斯：因为有些政治家只会说，不会做，而我想为人民尤其是那些处于最底层的人民做些实际的、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就选择了帮助穷人的事业。

马国川：许多杰出人士都深受某些历史人物的影响。那么，对您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是谁呢?

尤努斯：没有一个特定的人物对我有特别强烈的、长期的影响，我并不是基于这种影响去做的。我在现实社会里看到一些问题，然后我就去解决，这就是我的方式。换句话说，我的行为并不是基于某个理论去做的，而是对现实情境的回应。

我首先是行动，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就有很多人来问我为什么做。这时我才想到，把自己的作为转化为一套理论化的叙述（笑）。理论来得比较晚，行动来得早。

---

1. 穆罕默德·尤努斯. 穷人的银行家[M]. 吴士宏，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 约翰·麦克米兰.市场演进的故事[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彼德·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1953年生，英国政治家、外交家，与布莱尔、布朗一起被称为工党“三剑客”，曾任欧盟贸易委员会贸易专员、英国副首相。

对中国来说，彼得·曼德尔森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2008年9月底，震惊世界的“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不久，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我在凤凰卫视看到曼德尔森先生喝了一杯中国的牛奶，以表示他对中国产品的信任，我心里非常感动。”

当时曼德尔森还是欧盟贸易专员，此举虽然得到部分人的认可，也有人说他是“政客作秀”。可是，仅仅一周之后，刚刚被任命为英国商务大臣的曼德尔森就因肾结石而被紧急送往医院。这则新闻被人们以各种方式调侃，曼德尔森的名字也广为人知。

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曼德尔森就经常出现在国际媒体上。作为当时英国工党中的年轻人，曼德尔森和他的朋友布莱尔、布朗一起被誉为工党“三剑客”。

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从1924年开始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致力于打造“福利国家”，颇受民众欢迎。但是在1980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迭遭惨败。曼德尔森在回顾原因时说，“工党当时忘记了人们的需要，脱离实际，过于自大，不关心人民，而是过于沉迷权力。所以，民众会以不给工党投票的方式给予惩罚，使得工党黯然下台。”注

曼德尔森被称为“工党的马基雅维利”。为重塑工党形象，他把红色旗帜换成红玫瑰，成为英国第一个同时也是饱受争议的政治化妆

师。他协助布莱尔、布朗两位政治新星，带领工党成功转型，重塑了工党在英国政治中的地位，开启了工党三连任的辉煌时代。另两位都曾出任英国首相，而曼德尔森则是他们内阁中的重要成员，曾出任不管部大臣、贸易工业大臣以及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等重要职务[注]。

2004—2008年，曼德尔森作为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参与并推动了许多国际贸易协议的谈判，取得了积极成果。他曾多次访华，坚持通过对话与合作处理欧中经贸关系，与许多中国官员结下友谊。国人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与其会谈。

2013年秋天，在朋友联络沟通下，来北京访问的曼德尔森接受了我的专访。他是一个身材高大、面目英俊的英国绅士，气质上和布莱尔有些相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脚上的三接头皮鞋漆黑锃亮。

显然，这位60岁的政治家对中国的发展非常关注，我也很希望听一听这位欧洲政治家对中国的看法——这些年，欧洲似乎越来越被国人所忽视——因此采访进行得很顺利，曼德尔森对每个问题都乐于回答。

在社会与政治结构经历巨大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能否维持其社会与政治稳定，是曼德尔森非常关心的问题。他建议，中国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国不应该重复苏联的失败，而是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更加稳定的、更加聪明的方式来适应社会的变化，进行改革。”

曼德尔森说，“中国和世界的利益休戚相关”。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就像是一艘巨型油轮，然而它正在驶过的却是一条条狭窄的海峡，而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些狭窄海峡的岸边。”这个生动的比喻，让我想起英国作家约翰·多恩的名言：“没有人是独自存在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注]

曼德尔森：中国与世界的利益休戚与共

采访时间：2013年9月16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二十一世纪饭店

政府绝不能取代企业的作用

英国工党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管理，以达到公平分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将此付诸实施。在20世纪60~70年代，工党曾先后组织了四届内阁，这是工党历史上执政最长的两次，不过进入20世纪80年代，工党在四次大选中连遭失败。

顺应时代发展，曼德尔森和布莱尔、布朗一起带领工党成功转型，实现了工党的复兴，开启了工党三连任的辉煌时代。曼德尔森说："对于一个现代的政党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真正面对自己，在政策上反思自己。"

马国川：在1990年，面对英国社会的变迁，工党是如何成功实现转型，击败保守党，从而重新执政的？在您看来，其中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曼德尔森：工党在四次大选中连遭失败，原因在于工党当时忘记了人们的需要，脱离实际，过于自大，不关心人民，而是过于沉迷权力，所以民众以不给工党投票的方式给予惩罚，使得工党黯然下台。

对于一个现代的政党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真正面对自己，在政策上反思自己。当时工党有两种选择：要么我行我素、依然故我，要么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对自己进行“清洗”。工党选择了后者，通过改变自己的政策，重新赢得国民的信任。

在20世纪80、90年代，工党直面英国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一次比较彻底的转型，放弃了国有化、国家控制等与时代不相符的政策，成功转型为“新工党”，并最终击败撒切尔及其继任者领导的保守党，重新执政。

马国川：1997年工党重新执政。英国工党的领袖布莱尔先生被视为体现“第三条道路”理念的表率者，“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给英国带来什么变化?

曼德尔森：“第三条道路”主要给英国社会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

第一，我们达到了最初指定的目标：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效率的提高。这些目标必须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得以实现，当然政府要很好地完成公共职能，但是政府绝不能取代企业的作用。

第二，政府有责任为社会提供教育、医疗、健康服务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从而提高人民总体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但是，政府也应该想到一些新的方式来实现这些职能，不断地使这些公共服务能够现代化。比如说，怎样去筹集资金，使政府的这些公共服务能够更贴近百姓的需要。

第三，一个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通常不是通过一个国家就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和其他国家合作，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于其他国家而存在，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和挑战，经常可以在另一个国家中找到问题根源和解决方案，所以应该跟其他国家积极合作。

马国川：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爆发了欧债危机。在您看来，为什么会爆发欧债危机？目前欧洲经济是否已经复苏，欧洲经济的前景如何？

曼德尔森：现在欧洲的经济确实是在复苏当中，但是欧债危机也在警醒着欧洲必须进行经济改革，以确保自身在21世纪，尤其是在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仍然能够繁荣。

回顾欧债危机，有几个教训需要总结：首先，银行应该采取更加谨慎的管制措施。尽管银行有权对外借款去资助企业的财政危机，但是银行不应该承担太大的风险，不能向市场释放太大的信用，这样会导致危机。

其次，政府应该更加谨慎一些，不应该过分借贷和花费，否则金融市场会对政府本身失去信心，产生信任危机，这样也会导致危机。

再次，现在的欧盟是一个单一的货币体系，但是国家银行之间仍然受到各自国家的管制，不能采取统一协调的行动。所以，欧盟各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团结起来，更加紧密地结合，形成一个更好的平衡。

中国与世界的利益休戚与共

2004—2008年，曼德尔森作为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参与并推动了许多国际贸易协议的谈判，取得了积极成果。其间他多次访华，就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等事项与中方展开协商，终结了贸易摩擦。他坚持通过对话与合作处理欧中经贸关系，努力推动欧中关系进一步发展。

曼德尔森认为，中国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休戚与共。在未来的全球政治与经济新秩序中，中国将是其中主要的、富有建设性的参与者之一。但是，在建立这一新秩序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各种紧张的局面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国川： 一些欧洲人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作为一位著名的欧盟政治家，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发展？如何正确处理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曼德尔森： 从欧洲已经根深蒂固的关于全球经济应当如何治理的角度而言，中国的确是一种挑战。但是，我们不可能排斥中国，或是摆脱中国，因为中国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休戚与共、紧密相连。

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有些人武断地说，这种崛起是以牺牲西方的就业与繁荣为代价的。可是从中欧关系中选取的大多数经济证据表明，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在21世纪的前五年，欧盟的就业数量依旧处于净增长状态，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给欧洲工业带来竞争压力最剧烈的时候，这种就业净增长至少要部分归功于中国，而不能反过来归罪于中国。

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只会变得更加巨大，来自中国的竞争已经成为革故鼎新的主要激励来源。因此，并无理由认为一个全球层面的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绝无可能，而在这个新秩序中，中国将是其中主要的、富有建设性的参与者之一。但是，在建立这一新秩序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各种紧张的局面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全球经济治理的架构与规则都需要进行修正，以反映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的新平衡，这些大型经济体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重要的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

马国川： 在新的全球层面的政治与经济新秩序中，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此中国应该做什么？

曼德尔森：中国必须认识到，在面对一个拥有巨大经济能量的国家时，西方的焦虑是一种合理的反应。更何况，这个国家往往无法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在面对西方经济体耗费了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时究竟意欲何为。

中国的决策者们应该耐心倾听西方关于中国应该肩负起与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与体量相匹配的“责任”这一建议。忠言虽然逆耳，却是切中肯綮。中国已经不可能再次闭关锁国或是假装事不关己。中国做出的完全加入一个国际贸易与集体安全体系的决策将会决定这个体系究竟具有多大效力，甚至这个体系究竟能否继续存在下去。

中国的决策者们经常指出，巨大的内部变动以及丧失稳定的风险才是他们最优先的也是最主要的忧心之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他人也并非无聊的看客，正如伯特兰·拉塞尔在近一个世纪前所认识到的那样，这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环境，都将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中国就像是一艘巨型油轮，然而它正在驶过的却是一条条狭窄的海峡，而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些狭窄海峡的岸边。

中国需要深化改革

曼德尔森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现实颇有研究。在他的自传《拯救工党》中，这位英国的政治家特意辟出一章讨论“来自中国的挑战”。在曼德尔森看来，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是并没有充分实现邓小平的最初设计。

“在社会与政治结构经历巨大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能否维持其社会与政治稳定，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关心的”，曼德尔森说，“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么样去变革。如何保持稳

定、秩序，同时又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进行改革，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既要保持稳定，又要变革；既要保持秩序，又要改革，二者缺一不可。”

马国川：在撒切尔夫人进行私有化的同时，中国也开始进行市场化。在您看来，过去30多年中国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您对中国改革有何评价？

曼德尔森：经济改革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上亿人口脱离了贫穷，农村地区也开始城市化，使得人民能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也得到更好的服务。另一个改变就是改革刺激了创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再加上低工资，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一直高速发展。

但是，我认为中国改革并没有充分实现邓小平的最初设计。邓小平希望中国的私营企业能够蓬勃发展，可是在改革进行的途中，有一些本应该投放在私营企业当中的资源被转移到国企当中，致使经济运行的效率不尽如人意。在个别情况下，这种做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导致生产力的浪费，导致环境和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马国川：您对中国的观察非常准确，目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和环境的承受能力都面临巨大压力。

曼德尔森：中国经济是否还将继续保持连续的增长，这个问题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具有经济上和环境上的深远影响。这些问题需要继续得到解决，中国需要深化改革，否则中国会在这种恶性的循环中越走越远。

马国川：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表示担心。在您看来，中国经济是否还会保持连续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阻碍是

什么?

曼德尔森：国际社会不应该担心中国的崛起，但是中国也应该注意到国内经济中发出的一些危险的信号。

在西方，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过分地释放流动性，这些钱流动到一些生产力较低下的领域，产生了很大的资产泡沫。再加上发放了过多的贷款，包括一些不良贷款，导致银行系统非常脆弱，这些都是欧债危机的原因。

中国现在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庆幸的是，中国的决策者应该注意到了这些风险并且正在采取措施，应该能够避免危机，使得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的发展。

马国川：目前中国社会在急剧转型，面临许多压力。您对于中国改革有何建议?

曼德尔森：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这两个方面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办法断然分开。

在经济方面，应该允许私营经济充分增长，而不被国有企业逼到角落去。私营企业的竞争和发展非常重要，它能够增强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提高生产力。

在政治方面，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怎样才能够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同时能够保持秩序，不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中国应该对政治体系进行一定的改革，使人民能够有一定的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同时又不至于造成混乱。

互联网现在已经成为改变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如此，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了解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互联网能够使人民看到另一些人都在干些什么，政府是

不是在为人民服务，同时互联网也能够使人民在政治上施加更大的影响力。所以，如何善用互联网，使它为社会造福，同时又不至于引起混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证明我的观点，就是苏联的解体。当时苏联共产党已经完全脱离现实，也脱离了群众，而且失去了对民众的控制，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消亡。苏联的解体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长期混乱，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够恢复，中国不应该重复苏联的失败，而是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更加稳定的、更加聪明的方式来适应社会的变化，进行改革。

马国川：在您看来，苏联的解体是一个悲剧?

曼德尔森：不，我本人并不认为苏联的解体本身是一个悲剧。但是它本身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经历，不但导致了社会混乱，也造成经济滑坡，很多人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和社会保障，处于贫穷之中。当年苏联的解体直接为少数人带来了好处，他们获得了机会和自由，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糟糕。

这种动荡直到现在也并没有结束。直到今天，俄罗斯的政治体系还有很多的问题，经济体系、社会系统也有问题。我希望俄罗斯能够变得更好，并且我认为一定会变得更好。

在社会与政治结构经历巨大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能否维持其社会与政治稳定，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关心的。我经常和朋友讨论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么样去变革。如何保持稳定、秩序，同时又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去进行改革，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既要保持稳定，又要变革；既要保持秩序，又要改革。二者缺一不可。

我注意到，中国的决策者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抱以信心与骄傲，另一方面又对巨大的社会与环境变迁保持清醒的认识。他们将这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十分正确的。

---

1. 彼得·曼德尔森.拯救工党[M].张浩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 托尼·布莱尔.旅程：布莱尔回忆录[M].董宇虹，江洁，李永学，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
3. 约翰·多恩.丧钟为谁而鸣：生死边缘的沉思录[M].林和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傅高义，1930年生，美国社会学家，哈佛大学博士，曾任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撰有《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等著作。

傅高义形貌古奇：身躯高而瘦，鼻子大而直，三道深刻的皱纹横亘在宽宽的额头，稀疏的头发大部分都已斑白。但是他走进会议室时，步伐大而快，腰板挺直，一点儿也不像84岁高龄的老人。尤其是当他说话时，一口流利的汉语更令人暗暗称奇——他比许多中国人更“中国”。

采访傅高义是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的，它位于北京后海附近一条名叫“旌勇里”的巷子里。巷子很平常，路西侧有一个破败待修的大院落，红漆斑驳的大铁门紧闭。斜对面则是一个极气派的古式大门，悬挂着“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大牌子。门内数栋灰色的大楼庄重严肃，庭院雅静。

据说，傅高义来中国经常下榻此处。许多中国学者也批评说，他的思想受到了这个研究所的太多影响，尤其是在《邓小平时代》里。

自从《邓小平时代》的中译本在三联书店出版后，傅高义就成为中国的热门人物，被称为“中国通”。其实，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最早是以“日本通”成名的。1979年，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当时正值日本经济崛起之际，因此这本书风行世界，声名大震的傅高义成为美国的日本研究首席专家。

傅高义曾出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他还担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情报官。期间他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中国，撰写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等著作。由于他对中国有多年扎实的研究，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不过他仍然希望“做一些能有所贡献并能延续的事”。在一位美国记者的启示下，傅高义决心写一本邓小平的传记，因为“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是邓小平”，“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注

傅高义尽十余年之功，终于完成了近60万字的《邓小平时代》，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在中国更是成为畅销书。人们从中了解邓小平的一生，也了解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因为傅高义以邓小平为中心完成了对中国改革的深度扫描。虽然这段历史就在身边，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显得神秘。

从写作《红星照耀中国》（里面有毛泽东的口述史）的埃德加·斯诺，到撰写《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库恩，再到傅高义，美国人似乎更容易写作中国领导人的传记，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位第三方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傅高义对中国的认识确实有许多新颖之处。我在采访过程中，就发现他对中国现存问题的分析很有眼光，远超过国内的许多所谓“国情专家”，更非那些专以吹捧中国为能事、捞取物质利益的某些“汉学家”所能比。

傅高义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老头儿。在回答问题时，他有时会开心地笑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笑容天真可爱。

傅高义：向邓小平学习什么

采访时间：2014年8月20日上午

采访地点：北京西城区当代中国研究所

邓小平是什么样的人

马国川：您多年研究邓小平，出版的《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影响巨大。从您个人的角度来看，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傅高义：邓小平很能干，判断比较准确，虽然个子稍矮，但是很有自信，性格直率。他不爱说话，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需要。

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积极配合毛泽东，所以两个人关系比较好。虽然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已经知道“大跃进”的错误有很多，而且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不过他不想反对毛泽东，因为他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1957年，邓小平去苏联，看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评得太厉害，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权威。

“文革”中，许多当权者都垮了，但是邓小平却幸存下来。尤其是1969—1973年在江西的几年里，邓小平思考了很多问题，这些思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总之，邓小平是思想比较清晰的一个人。

邓小平的家庭关系很融洽，大家可以讨论问题，孩子也可以看电视。但是在外面，他遵守党的纪律，服从领导。他当领导的时候，别人也要服从他。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他承担起全面的责任，大事要拍板，但是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他让别人做总书记。这是比较好的维护权威的做法。

另外，邓小平和外国领导人关系也很好。不像周恩来那样长于外交辞令，邓小平讲话直接，坦率又幽默，有时还爱和外国人开玩笑。

马国川：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而且走到了舞台的中心位置，此后近20年里他一直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在您看来，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傅高义：众所周知，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开始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任务不是搞革命和斗争，而是领导国家富起来。这并非邓小平一个人的观点，许多老干部包括华国锋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不过，领导改革的是邓小平。

中国这么大，这么穷，问题这么多，竟然顺利地改变了。现在看起来似乎比较简单，当年启动改革开放绝非易事。在改革方面，逐渐推行土地承包制、乡镇企业、私人企业等，将市场经济引入了计划经济体制。后来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含义就是市场经济。在开放方面，邓小平派大量学生、干部到外国去学习，也不怕他们带着新看法影响国内，甚至不回来也无所谓。相比东欧和苏联，邓小平更有胆识，在开放方面走得更远。

马国川：您认为最主要的是改革和开放改变了中国？

傅高义：这是中国的说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思想解放。在过渡时期，需要领导人有判断力，敢于去做，因为事先没人知道很多做法的效果是好是坏。邓小平拍板，很多具体事务都是胡耀邦等人做的。当时全国有很多有胆识、开明的领导人，包括广东的任仲夷，都很有勇气。

马国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群体，邓小平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傅高义：他是代表，我不太喜欢"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邓小平没有蓝图，方向他大概知道了，至于怎么做，很多事情开始时也不太清楚，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是邓小平有明确

的目标和方向。在“文革”刚结束的混乱时代，能清楚而且坚持改革开放，这就是邓小平的贡献。

马国川：您认为邓小平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

傅高义：很简单，就是国强民富。这也是19世纪以来中国很多领导人的方向和目标。

当然，邓小平也是为了共产党，但是一百年后中国人怎么看这段历史，恐怕人们首先会肯定邓小平是中国人。一百年后共产党会不会有一些改变邓小平没有说，我看共产党领导的做法、方式可能会改变，但是邓小平为了中国富强这个目标没有变。

邓小平的“遗产”

马国川：人们一般认为，中国从1840年开始进入现代化转型的轨道上来。邓小平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贡献是什么？

傅高义：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以苏联为榜样，但是并不成功。如果1958年我在中国，我也不一定说“大跃进”不对，因为要试试看。结果1959年就已经证明不成功。

邓小平大胆地改变了毛泽东的老路，通过改革开放，把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就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

马国川：1997年邓小平去世，您认为他给中国留下的主要“遗产”是什么？

傅高义：由于开放，中国的影响不再仅限于东亚，而是成为影响世界的一个国家。古代中国和全球基本没有关系，直到清朝仍然是主

要影响东亚的一个国家，虽然从19世纪中期以后和全世界有了一些联系，但仍然闭关锁国。

从邓小平时代起，中国才逐渐承认和服从一些全球规则，后来加入了联合国等世界组织，由此变成了一个真正影响全球的国家。当然，中国和世界的接轨并不是一帆风顺，而且恐怕还得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不知道中国现在喜欢不喜欢和世界“接轨”的说法，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中国是应该和世界接轨的。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富裕起来，当然还有一些很穷的人，但是如此庞大的人口脱离贫困，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马国川：但是也有人说，邓小平时代留下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不公平，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傅高义：很多人是这么说的。邓小平也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中国这么大，不可能让全国的人一起富起来。中国过去几百年里很多人没饭吃，现在问题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有饭吃了，也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平。现在的问题是社会收入差距太大，社会不平衡。和日本比较的话，日本公司管理者和普通工人的差距不是这么大。

不能否认，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尽管收入差距问题存在，不过低收入者还是有希望的。

马国川：和邓小平时代比起来，现在中国面临的这个问题很明显已经不一样了。我的问题是，在您看来，现在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什么?

傅高义：我认为目前中国主要有五个问题。

第一，腐败问题非常严重。现在习近平主席大胆地想办法惩治腐败，这是对的，对中国有好处。腐败指的是什么？外国和中国不太一

样。美国、欧洲有成熟的法律制度，腐败的意思就是犯法，但是中国法律还没有成熟，很多事情规定得不是那么清楚。

第二，中国应该有完整的法律制度。很多领导人虽然说要按照法律做事，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人治，不是法治。中国还处于过渡时期，应该增加法律规则。现在中国发展模式的好处是，如果一个领导人想做得好，效果很快显现，比重视法律的欧美国家效率高。不过，虽然欧美国家因为法律规则的制约而效率可能比较低，但是能够给公民比较稳定的、满意的社会预期。一个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实行法治。

马国川：不要人治要法治，也是邓小平强调过的。

傅高义：但是邓小平还没有做好，他的思想有时比行动发展更快一些。

第三，媒体的自由。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能再按照老办法来治理国家。当然有些人担心，放得太宽，会有动乱，所以就倾向于加强控制。我认为，这种做法终究会失败。不管什么国家，都应该让老百姓能说话。应该想办法慢慢地放开，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让公民享有言论的自由。

第四，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毛泽东时代只有简单的社会福利制度，而且城市乡村完全不同。现在全国的福利制度正在逐渐建立，虽然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是必须加快速度。

第五，环境保护。现在中国的空气、水、土壤都存在污染问题，必须加强治理。

向邓小平学习什么

马国川：邓小平的智慧对于解决中国今天面对的挑战有什么启示?

傅高义：时代不同了，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的看法和现在不会完全一致。当然，他会支持不断地改革开放。

作为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面临一些新挑战。在邓小平时代，人们服从领导，可以按照党的组织纪律行事。这些恐怕在现在是不够的，因为尽管今天中国仍然处于过渡时期，需要权威，但是更要考虑制度建设。

马国川：我理解，您的意思是，现在领导人更主要的是建立一套制度，而不能像邓小平时代那样主要靠权威?

傅高义：对。在过渡时期需要政治权威，因为要保证社会的基本秩序。不过这种权威本身也是过渡性的，它的方向应该是指向建立一套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换句话说，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应该转向制度建设。

马国川：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人把它称作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可能主要就是着眼于制度的建设。

傅高义：有人是这样说的。邓小平也知道制度很重要，一个领导人的权力应该是有限制的，不过要做到很不容易。因为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掌权者还想说了算，这不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全世界都是如此，关键是建立约束权力的制度。

马国川：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就说过，中国是一个东亚的国家，不是一个世界的国家。您在《邓小平时代》里说，中国正在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傅高义：古代中国和全球基本没有关系，欧洲和全球的关系也不如现在这么密切。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改变了。欧洲比中国改变得快，大概两三百年以前欧洲就成为世界的中心。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必然会走向世界大国。

马国川：由于中国变得强大，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改变韬光养晦的策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假如邓小平还活着，您认为他的回答可能会是什么，为什么？

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还是会选择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对邓小平来说，韬光养晦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策略，而是一种理念，永远不会改变。为了长期的利益，中国还是应该韬光养晦。

现在一些人觉得，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GDP可能很快会超过美国，过去中国是一个受害国家，现在我们有实力了，应该如何如何。比如对于东海里的那个小岛(注)，中国的“鹰派”强硬地要夺回。邓小平如果活着的话，就会说，那个小岛有什么意思，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中国要和平崛起，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这都是非常好的说法，但是看那些“鹰派”的言论，很难不让外国人产生怀疑，害怕以后会有很多冲突。假如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就会产生很多矛盾，甚至和外国发生冲突，这反过来会有害于中国的发展。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考虑了中国发展的大局，因为和大国搞好关系，远比一个小岛的事情更重要。现在的领导人不应该为了表示自己的勇气而不再妥协，也不应该为部分激进舆论所左右。邓小平的做法还是对的，应该对中国的前途、对中国人民负责。

马国川：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看，对中国负责，实际上也是对世界负责？

傅高义：是的。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世界负责，也是对中国负责。因为和外国搞好关系对中国也有利，也是为中国好。爱国主义当然还是需要的，美国、日本都有爱国主义，但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还是很危险的，应该更广泛地考虑问题。邓小平那种能考虑全球事务的眼光和胸怀，现在仍然没有过时。

马国川：从世界角度来看，在整个20世纪世界政治家的队伍里面，邓小平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傅高义：和同时代的政治家比起来，比如里根、撒切尔等，邓小平看得更远，当然里根、撒切尔等人是有任期的，而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可以制订长远的计划。但是邓小平要改变基本的组织，这项工作是更难做的，但是他基本成功了，很不简单。

另外，邓小平虽然很少使用外交辞令，说话直截了当，但是外国人能接受。虽然大家的立场不完全一致，但是可以交换看法和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很难得。中国需要这样善于和世界打交道的领导人。

---

1.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 编者注：指钓鱼岛。

第二篇
言中国改革建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1910—2013年），英国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计划公有制从法权上铲除了私产，主流意识形态几十年一贯地坚持“斗私”。可是，恰恰就在这样硬的约束条件下，产权改革还是在中国发生了，私产还是得以重建。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改革开放初期，这个问题曾困扰中国许多学者。仅仅从人性为私的假设来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他们不知道，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就创立了产权理论，可以轻松地解释这个问题。

经济学家周其仁回忆说，1986年他通过阅读张五常的著作，知道了科斯提出的问题与基本概念。尤其是对“产权”的界定，“从看到的第一眼起就受到很大的思想冲击，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把多年来我自己观察和感受到的中国农村经验讲清楚了。为什么‘自留地’？为什么‘包产到户’？无非都是产权界定的中国称谓，内容是一致的，就是通过产权约束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注]

就这样，借助张五常著作（最初还是私自影印的）的介绍，从20世纪80年代起，科斯的产权理论就影响了一代年轻的经济学家。之后30年，产权理论是被谈论最多的经济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罗纳德·哈里·科斯是卓越的经济学家之一。1937年，年仅27岁的科斯完成论文《公司的性质》，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创立了产权理论。但直到40余年后，自由放任思潮在1980年的西方日渐高

涨，科斯的理论才受到广泛关注，并最终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虽然科斯本人从来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是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影响深远。张五常特意把他的一本总结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书《中国经济制度》献给科斯，“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注]

出生于1910年的科斯幼年时读到马可·波罗的游记，从此就对中国梦萦魂牵。他一直关注着太平洋西岸的东方大国所发生的一切，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

2008年，科斯慷慨地独自出资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一场主题论坛，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中复杂且日益重要的各项议题，成为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最为认真的一次讨论。2010年7月，科斯再次资助了一场“生产的工业结构”学术研讨会。众多中国经济学家云集芝加哥大学，在中国经济的语境下，对生产的工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

就在2010年的研讨会前夕，我通过科斯教授的助手王宁先生，给他发了一份采访提纲。时年整整100岁的老人认真地答复了每一个问题，而且都非常有见地，尤其是他提出的“思想市场”的概念，很快成为中国知识界流行的词汇[注]。

两年后，科斯的新著《变革中国》在中国出版，受到了读者的推崇，因为这本书里有许多精彩的见解，一些论述就像警句一样。例如他说，“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自身实力的压力，这是国有企业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如果要讨论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大转型中的作用，那它最大的贡献应该是逐步从经济活动中撤离，而不是它无处不在的政治领导，这是中国市场化转型成功的根本原因。”[注]

不幸的是，2013年9月3日，科斯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2岁。他没能等到中国“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的那一天。但愿，我们这一代人将有机会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科斯：自由的“思想市场”至关重要

采访时间：2010年7月上旬

采访地点：北京——芝加哥（书面采访）

中国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

马国川：中国国内的媒体曾经报道，您说“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个奇迹。”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奇迹，其奥秘是什么？

科斯：我不记得我说过中国经济是一场奇迹。我所说的是，中国发生的一切，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在我看来，奇迹带有某种神力的寓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如果我们知道某个事情的原因，那它就不是奇迹。

我可以说，我没有预料到中国经济会快速增长。在中国开放之后，我鼓励张五常回香港去研究中国，当时香港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席位正空缺。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中国的经济革新，连张五常都没有。当时他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接受资本主义，但他没有预料到这个过程的惊人速度和规模。而在当时的经济学家中，他还是对中国经济未来最为乐观的，连他也没想到。

我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有很多原因，这些原因是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例如，我们当时应该思考我们后来在书中所说的“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但我们没有。在我们当时看来，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在可能性的边界之外的。

马国川：这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学家把边界搞错了？或者是因为当时拥有的经济学理论让经济学家们得出了一条错误的可能性边界，或者是因为他们所知的有关中国的事实是错误或不完整的?

科斯：我们当时显然是把边界搞错了。我当时对中国一无所知。

马国川：中国经济一直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长，您认为应该怎样看待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是否可以持续?

科斯：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所知不多。我只能说中国经济确实增长得很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的开拓创业精神很强。一旦中国人得到致富的机会，也能很快富裕起来，尽管还必须跨越许多政治障碍。

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来说，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如果这个政策不改，中国就无法维持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现在的人口生育率低于正常的人口换代速度，老年人正在迅速增多。这项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否则中国最终会消亡。

马国川：您是否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如果存在，如何评价?

科斯：我不知道“中国模式”是什么意思。所有国家都是不同的。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有独一无二的历史。虽然许多早期文明都衰落和消亡了，但中国这个古老文明正在经历一场复兴。据我所

知，这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我青少年时阅读《马可·波罗游记》，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和别人交流不多，所以观念也不大受别人影响。我的父母都是在只有12岁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了，受过一些教育，但不是很多。在很多方面，我是自学成才的。至少在12岁之前，我的双脚力量不足，不得不带着金属护板，并在一家由当地市委会为有身体缺陷的儿童开办的学校上学。

多年来马可·波罗的著述一直让我沉思不已。他的著述曾让我豁然开朗，让我明白，当欧洲国家还处在很低的文明程度的时候，就已经有中国这个高度文明化的国家了。当欧洲还只有许多人群在森林里游荡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复杂完备的文明。当然，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也是人类早期的文明，但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更先进。

马国川：如您所说，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也是伟大的文明，但这些文明都衰落消亡了。在您看来，中国文明为何不同呢?

科斯：我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思考过。中国就是不同凡响的。在那个时期，中国要比我们（指欧美）好太多了。当时的中国文明比马克·波罗所描绘的还要更优秀。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

马国川：这听起来有些不理性。您当时只不过从马可·波罗那里觅得了些许信息，仅基于此，您怎么就能对中国的未来怀有如此强烈的信心呢?

科斯：人类本来就是非理性的。我们往往对其他民族所知甚少，但依然对他们抱有各种看法。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独有的

马国川：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制度变迁，但是今天中国仍然有许多产权界定没有完成，如土地制度等，因此交易费用仍然很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科斯：首先，产权不可能彻底完备，交易费用也不可能彻底消失。并不是说只有所有产权都得到了彻底清晰的界定，交易费用降为零，才算真正建成了市场经济。要按那种标准的话，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了。但另一方面，如果产权没有得到界定，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通过改革来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显然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独有的。但要为中国提建议，就必须先深入了解中国。我希望中国经济学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

马国川：计划组织（如企业）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但是怎么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呢?

科斯：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划清的。许多企业都在管理中运用价格机制。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二者以及许多其他的机制相结合。例如，在企业之间达成的任何商业契约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价格信息。但我们也会找到其他信息。契约总是不完整的。除了契约之外，企业也会依靠其他机制，例如人际关系。

马国川：市场与国家相对的两分法观点现在十分流行，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和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彼此分离。但在您看来，这却是个大错特错的观点。那么，应该怎么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次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科斯：自由市场经济不需要政府，这种传统观点是错误的。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一些重要的功能。我来举一个例子。经济学家经常认定，市场是凭借自身的力量而存在的。一个由农夫组成的市场，也许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但在现代经济体

中，许多市场是非常复杂的，其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是需要由政府制定的，而不是可以轻易地自发产生的。

我们应该将市场经济视为一种类似人体的有机体系，有不同的组成部分。但所有这些部分都是以复杂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学家应该把经济当成一种系统来研究。至少这是我的想法。我们已经研究了经济中的不同部分，但要理解整个系统的运行机制，我们需要把不同部分整合在一起。但这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经济体中有极多的企业。就算是那种最大的、拥有15万员工的企业，相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也是沧海一粟。这些企业如何合作，每天生产出数不胜数的产品，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我们也必须考虑其他因素，例如政府、法律体系、教育体系、家族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要把生产的结构研究清楚，可能需要一两百年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开始这项工作，或者也让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行动起来。

马国川：为什么单独挑出中国经济学家呢?

科斯：从2008年的研讨会来看，他们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欧美的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由理论推动的学科。我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实证化，探索出自己的道路，为经济学做出他们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果我们能劝说他们中的很小一部分加入我们，我们就能拥有一支大军。如果他们研究中国经济，并解释中国的产业生产结构是如何运行的，他们将能促进经济学的进步。

我对金融系统了解不多。但正如我们从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认识到的，人们确实将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视为一个完整体系中的一部分。而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之下的一个次体系。作为专家，我们在专业研究上有特长，往往关注某个特定因素，忽视所有其他因素。但在现实

经济中，所有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忽视的因素也许远比我们关注的因素重要。

自由的“思想市场”至关重要

马国川：中国市场变革中出现了新挑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尤其是利用公权力腐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中国经验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在您看来，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

科斯：我不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也不认为中国目前的腐败是市场化改革的副产品。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有腐败了。腐败的根源是一种不良的社会体系，使一些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得到了以腐败来牟利的机会。

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就像邓小平说的，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不可能是所有地区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要是要求所有人同时富裕，就没法发展了。

人们不会对挣几百万美元的篮球运动员感到不满。但在美国，商人若无法向公众表明自己是正直可敬的人，就会招来怨愤。像奥普拉（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比尔·盖茨这样的人，虽然赚钱无数，但没有人会抱怨。

我年轻的时候，并不对富人感到怨恨。这就是世界的固有特征：有不同的阶层，有富人，也有我们这样的穷人。如果我们的父母是别人，我们也许就富了，如果不是，我们还是这么穷。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在任何职业中，最好的人都要比一般的人好很多。例如在网球、国际象棋中，顶级选手都要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人。商业也是如此。天赋的差距是自然的、巨大的、无处不在的。

但权力滥用是另一回事。如果体制不好，那么干什么事都必然涉及腐败，要达成自己的心愿，比如开办企业、领取执照等，你都得去行贿。人们还可以用腐败的手段来打压竞争者。权力滥用很容易引发愤怒，这是政治领域的常事。

马国川：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您认为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应该着力解决什么问题？您希望中国的未来发展成什么样子？

科斯：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至少是我不能回答的。不过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是利用“思想市场”（Market of Ideas）。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需要做，都是由政府认定的。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学家不能这么做，不能就如何发展经济制定蓝图。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参与“思想市场”，都能为此做出贡献。当人们提出并讨论不同的理念时，更好的理念就会脱颖而出。人们可以进行新一轮的讨论，又能产生出更好的理念。然后把这些理念付诸实施，我们就能鉴别其效果。这些经验和实验能为我们的讨论和辩论提供正确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至关重要。

---

1. 周其仁.中国做对了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张五常.中国经济制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3. 2011年12月14日，科斯在《财经》年会上做了视频致辞，对中国提出的忠告发人深省：“回顾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

的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并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将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见财经网 http://www.caijing.com.cn/2011-12-15/111524268.html.

4. 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M]. 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1928年生，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匈牙利科学院计算中心部主任、世界计量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对中国改革来说，若要问哪一位外国经济学家最值得铭记，那无疑非雅诺什·科尔奈莫属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为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所做的序言里这样写道。[注]

雅诺什·科尔奈出身于犹太家庭，他的许多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丧生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他本人是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因为有这样的经历，苏联红军解放匈牙利之后，年轻的科尔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进入党报工作。但是在目睹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后，他的思想发生急剧改变，开始反思计划经济的弊端。1968年，匈牙利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进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整个改革的思想受到了科尔奈的影响。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匈牙利并没有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那样顺利运转，经济短缺的现象完全没有改善。

1980年，科尔奈出版了力作《短缺经济学》，由此奠定了他的经济学学术地位。《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一问世，就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掀起了“科尔奈热”。1985年，科尔奈来华参加了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和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路径提出建议，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影响巨大。[注]此后，他多次访问中国，不仅向中国介绍改革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而且对中国改革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诚如吴敬琏所说，“科尔奈的所有著作和言论都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改革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分。”[注]

科尔奈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所有主要领域都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解读，进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轨提出了卓有见识的改革理论。如果不是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解体，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科尔奈，一定会走进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大厅。

21世纪以来，年事已高的科尔奈很少踏足中国，但是他仍然对中国发挥着间接的影响力——他的弟子钱颖一、许成钢、李稻葵等经济学家都是中国改革的推动者。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通过海量投资的方式维持了8%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了国内外的一片赞美之声。鼓吹“中国模式”的人们甚至认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已经很成功了，无须进一步改革。由此，改革进程被搁置，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多年积累的经济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社会面临破裂溃散的危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我想到了中国改革谏言者科尔奈先生。2010年初，我通过香港大学的许成钢教授，向定居于布达佩斯的科尔奈先生发出了一份采访提纲。82岁的科尔奈先生很快回复说，愿意接受采访，但是要花费一段时间研究中国问题，然后才能给予答复。多么严谨的一位学者！经过了两个月的认真思考后，科尔奈发回了一份详尽的回答，对中国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建议。

这篇采访刊登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因为科尔奈对中国问题的剖析冷静客观，所提出的建议非常具有针对性。例如他说，“民族主义的傲慢自大、对于成就的自吹自擂是要不得的。事实表明，只有那些明确表示愿意从别国的政治经济经验中学习的国家，那些通过自身行动吸收这些经验，并将其与本国环境相适应的国家，才能得到外部世界的更多同情。”包围在各种各样赞美声里的中国，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提醒吗?

遗憾的是，我迄今没有见过科尔奈先生。我期望将来有一天飞越万里，到布达佩斯去看望这位可敬的学者，向他献上诚挚的敬意！

科尔奈：中国改革再建言

采访时间：2010年3—5月

采访地点：北京——布达佩斯（书面采访）

根本没有“中国模式”

马国川：您曾经说过，转轨过程中的制度改革由很多部分组成。有的部分成本低，有的部分成本高。中国改革选择的是从成本低的部分入手，所以比较顺利。在您看来，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路径是否可以说是成功的？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如果存在，如何评价？

科尔奈：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回答，我想尽我所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为了尽量准确，我就必须把你的总问题分割为几个小问题，而且我还要努力澄清一些含混的概念。

在你的语汇里，“模式”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据经济学家通常的理解，“模式”是一种理论性构架，这种构架能够描摹现实经济中的一些特定的关系。从你的行文判断，你用这个词显然是另一个意思，你指的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所组成的一个真实过程，而这一过程是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方式或范例的。但是，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是根本无法模仿的！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所以根据我的理解，根本没有“中国模式”。

既然如此，那我还不如来分析一下近几十年来中国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包括这些特征本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尝试着判定一下这些特征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如果是有利的，它们是不是唯有在中国才能出现，或者说其他国家能不能同样地实现并具备这些特征。

在你的问题里还有两个词，我觉得比较含糊，从而需要解释，给以清晰的界定。一个模糊不清的表述是“顺利”。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词的？你的“顺利”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经济产量在毛泽东去世后持续增长，至多只有时快时慢之分，而从未有过绝对的下降吗？这是中国的发展所具备的一个令人着迷的特征，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和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1990年的政治变动之后变成了民主国家，并接着进行了经济转型，但这伴随着与转型有关的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此期间的一些年份里，经济产量甚至没有达到转变之前的水平。

至于那些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它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经历了严重的、痛苦的衰退，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无法断定这些国家的经济是否已重新开始增长。那么，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在你的问题里，“成本低”一语又是什么意思呢？低价格是谁支付的呢？如果美欧的消费者购买了比较廉价的中国产品，他们当然就享受了“低成本”。但中国的产品为何能以低价在富国的市场上销售呢？这就有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汇率，但我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工人的低薪酬。劳工成本不仅包含雇佣者给予受雇者的金钱，还包括与工资有关的、与工资成比例的税和社会支出，包括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北美和欧洲的劳工成本升高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建立了福利国家，向劳工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福利。这样的做法损害了许多与中国产品竞争的产业的竞争力。

由此而论，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些基本的伦理问题。中国的经济以闪电般的速度增长，而这样的增长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却是在中国的GDP中，投资所占的比例过高，消费所占比例较低。当前的一代正在为未来的一代做出巨大的牺牲。如果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不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解决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资源划分问题，那是可行的，在历史上也是有人采用过的，但我想提醒你们的是，其他的路径也是可行的。以几百年为单位，思考一下世界经济史的进程吧，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澳大利亚等国走过的道路。在它们的历史上，经济的增长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么快过，但它们都达到了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顶峰。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消费与经济产量是同步增长的。

“低成本”是当今中国话语里广泛出现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此语也许会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忽视中国面临的那些真正关键性的战略困境。

马国川：中国经济一直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长，您认为应该怎样看待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是否可以持续？

科尔奈：从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储蓄与投资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在世界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至于这么高的比例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强迫储蓄，我们难以判定，甚至也许可以说无法判定。

看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历史吧。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这些国家的GDP年平均增速比中国现在的GDP增速低得多。但就在这一百年里，瑞典的社会民主派不断地赢得议会选举，不断地支持工会和社会大多数，不断地为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好的

医疗条件以及足以保障体面的晚年生活的养老金体系，并且获得了成功。

再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在美国，创业精神是极其旺盛的。过去60~80年时间里世界性的伟大创新与科技进步大多是由美国企业家创造的。在以法治作为国家的基础方面，在发展不同的方式来让不同的政治势力竞争方面，在拟订《宪法》方面，美国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再看看印度。印度的人口仅次于中国。像中国一样，它在不久前也是一个贫穷的、停滞不前的国家。但在那些阻碍发展的官僚性障碍被消除之后，在政府允许自由企业家式的资本主义无拘无束地成长之后，印度的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而且，在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印度的议会民主政体一直屹立不倒。

“可持续性”的意思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也许就算从狭义的、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标准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受到的一些限制，例如大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又如工业与机械化交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到广义的政治条件。当前的这种政治体制确保了当前的宏观经济情势、当前的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但这样的政治体制能维持多久而不被改变或改革呢？我想这些问题最好由研究政治学与当代史的人来解决。

我想，在我们的提问和回答进行到现在时，我必须提醒读者特别注意，我并不建议中国遵循“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北美模式”“印度模式”，就像我并不建议瑞典、美国或印度遵循“中国模式”一样。在勾勒了历史上的这些国家走过的不同路径之后，我想提出以下想法：

我们根本无法通过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计算出一种数学上最优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快乐与痛苦、获取与牺牲是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区及不同代人之间分配的。并不只是物质上的福利能进行这样的分配，与个人自由相关的快乐、因自由权利受

限而产生的痛苦，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分配。在这里我无意提供一种能解决所有这些潜在分配问题的药方，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困境。

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带入制度改革

马国川：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如何正确区分市场的功能和政府的功能，如何解决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并存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难题。结合匈牙利的具体实践，您有什么建议?

科尔奈：你问到了匈牙利的经验教训，但事实上在匈牙利人们对此并没有共识。你问到的这个问题在民主体制下的各种政治论坛上、在传媒中、在知识分子的研讨中得到了激烈的辩论。而且，这显然是全世界都在讨论的课题，而不只限于匈牙利。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几乎同样的时点被提到了世界各地的历史议程之上。在所有那些1989—1990年之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地方，即那些政府拥有社会主义特有的极端主宰地位的地方，人们已经进行了不断的努力来弱化政府的角色。但是，近来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场金融与经济危机也警醒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有时更有效的政府监管也是必需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最具吸引力的、最具示范意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试验性。包括匈牙利在内的许多国家，头脑发热的改革者都曾希望他们设计的理念能立马见效，并对全国各地都适用。我发现中国通常的行事方法是不一样的。任何重大的改变通常都是先以地方性的创见出现的。之后这些创见会得到较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如果觉得它们真的行之有效，还会作为范例向全国各地推广。因此，那些可行的创见会向其他地方扩展，扩展的速度甚至会不断加快。

政府官员进行的经济调节和市场调节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比例，这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例如3:7、5:5、7:3之类。例如在银行、教育、医疗、公安等不同的领域，合理的比例是各自不同的。在一些领域政府必须发挥主要作用，另一些领域则必须由市场主导。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劳动分工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精明地设定相关的比例和形式。市场不是一部永不出错的神奇机器，但它也不是一个密不可穿的丛林或弱肉强食的杀戮场。政府不是一部由清廉无私的公务员操作的、运转起来丝毫不差、永远客观公正的机器，但它也并不是一部完全受贪权的腐败官员掌控的机器。市场和政府这两种机制都是远不够完美的，甚至即使是这二者的作用结合起来，也不一定能消除它们各自的缺陷。事实上也许是相反的情况：这两种机制的结合也许反而会破坏它们独自运转时可能具有的一些优点。

我们不需要那种空洞的、大而无当的口号，例如“我们需要更强大的政府来遏制市场的种种放纵！”或“官僚干预滚到一边去——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相反，我们应该针对具体的问题领域进行负责任的、冷静公正的、不带偏见的分析，并精心地计算在这些领域里，政府影响应该达到多大的规模与限度。

马国川：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它会把我们自动带入制度改革。如何评价这种观点？制度改革会不会随经济增长出现？

科尔奈：如果我们对许多国家几十年间的历史进行一番研究，就会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体制之间并没有自动的、决定性的联系，至于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和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之间，就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了。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苏联经济产量增长最

快的时期，但事实上当时苏联却发生了令人震骇的政治压迫与恐怖大潮。当希特勒和纳粹党上台时，德国是最富的、发展水平最高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在那之后德国经济增长率也迅速加快。而且回头来看，宪政国家和议会民主制是在一些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起来的，当时它们的发展水平远不如今天。

私人所有制、自由企业和市场调节的扩展，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这并不能自动保障政治改革的成功。

要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

马国川：1986年您来中国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会议上您提出经济改革的四种目标模式，主张采取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0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改革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市场体系的培育、企业产权的明晰、政企功能的分开、行政性垄断的消除等各个方面离市场经济的目标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而政府有形之手主导的宏观调控却日益加强。您认为，中国应该做哪些努力以实现改革目标?

科尔奈：从万里之外的布达佩斯向中国提供经济政策建议，我不敢贸然为之。贵国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条件及经济社会形势有透彻的了解。他们远比我有资格提供建议。我至多只能谈一下我在几个问题上的认识。

第一，我的印象是中国的银行部门存在着一些大问题。虽然现在许多欧美银行的处境不易甚至艰难，而中国的银行看上去十分稳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井然有序。对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贷款结构尤其是不良贷款的处理，中国专家应当加强分析。

第二，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一个危险，即经济体中可能出现种种失衡和潜在的“赤字”，并在未来造成大问题。4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突进还是和谐增长》，当时也被翻译成中文，不过恐怕早已在书店里买不到了。我在该书中总结了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表示要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苏联和东欧那些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家为了推动GDP尽可能快的增长，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发展任务，例如住房、环保、城市交通等。我在书中还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这种不协调：那就像是一个人穿了件时髦的新夹克，但下身却是破破烂烂、仅足以蔽体的裤子，脚上连鞋都没穿。也许这本书应该在今天的中国再版。

第三，我看到的数字显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明显扩大。这不仅对经济是不利的，而且直接违背了民众的公平感，迟早会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紧张局面。

第四，中国必须接受出口市场必将缩小这个事实。中国国内的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越是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工资成本差距就会越小。目前为止中国奉行的是一种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政策。

第五，要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法治政府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步骤来促进司法体系的现代化，但我认为要保护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保障各种合同得到遵守，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列出来的这些问题、忧虑与任务远没有涵盖全部。我真诚希望中国的经济决策者能找到合理的方法，解决这些难题。

马国川： 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成本在上升。您认为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东欧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科尔奈：我觉得最好不要试图从东欧转型中得出某种普适性的结论。这个地区由许多中小型国家组成，总人口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多，但它们的经历却是千差万别的！在任何时间里，都有一些国家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些国家则问题丛生，但所有的国家总是时起时落，成功与失败并不持久。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从东欧国家那些不怎么成功的措施中吸取经验教训，才是尤为重要的。

第一，从长期来看，民粹主义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公众最终会要求政府履行那些迎合大众情绪的、不负责任的承诺，把那些主张顺其自然的经济政策的人抛在一边。

第二，将某些改革措施强加给公众，是不会有效果的。事实证明，只有事先经过深入辩论并取得广泛支持的改革措施，才能有持久的效果。

第三，打压那些批评政府政策的反对派是不明智的。一些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这么做过，包括镇压抗议，恐吓那些提出独立见解的人。这种打压政策只能带来一时的平静，政府迟早还是要为观点争鸣与言论自由创造空间。

第四，民族主义的傲慢自大、对于成就的自吹自擂是要不得的。事实表明，只有那些明确表示愿意从别国的政治经济经验中学习的国家，那些通过自身行动吸收这些经验、并将其与本国环境相适应的国家，才能得到外部世界的更多同情。

在苏联和东欧出现的那些新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五花八门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正在得到检验。我想建议中国朋友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仔细地考察这个巨大的实验室内正在发生的一切，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好好利用他们的成功经验。

---

1. 雅诺什·科尔奈. 思想的力量[M]. 安佳，张涵，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 科尔奈把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分为行政控制和市场协调两个大类，前者又分为直接的行政控制和间接的行政控制两个子类；后者可以分为完全自由的市场协调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巴山轮会议”上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中国经济学家都认同科尔奈的分析和选择，把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看作中国经济改革的首选目标。参见：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3. 雅诺什·科尔奈. 思想的力量[M]. 安佳，张涵，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1938—2015年），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原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

330米高的国贸大厦果然不负“北京之巅”的美名。站在顶层的玻璃窗前，一个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尽收眼底。海浪般起伏的高楼大厦，游龙般奔走的汽车，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生机。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就像乘坐了一部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北京正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30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改革吸取了国际智慧。从波兰的布鲁斯、匈牙利的科尔奈，到美国的麦金农和斯宾塞，多位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当代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青木昌彦就是其中备受尊重的一位。

对青木昌彦先生的采访就在“北京之巅”进行。那是2014年底的一天下午，当天上午他还在一个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年76岁的老人满脸真诚的笑容，彬彬有礼，既有日本人的谦逊恭敬，又有欧美人的绅士风度。他走路急促，那一头狂放不羁的银发似乎要飘起来，俨然一位意气风发的艺术家。

50年前，青木昌彦是日本学生运动的领袖，曾为日本“全学联”情报宣传部长，蹲过班房。后来告别激进的左翼革命活动，转向研究现代经济学，终成拥有世界声誉的经济学家。他曾说，“虽然算不上‘百折不挠’，但也正是一种不惧失败的重复，即‘朝着新目标而努力+获得相应的成就感或者因挫折而引起失落+重新奋起’，构成了我的人生和学术生涯。”[注]

1976年3月，青木昌彦就曾访问“封闭的中国”。改革开放后，他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考察，与吴敬琏等中国经济学家共同切磋中国经济的走向并结下友谊。作为比较制度理论的大家，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有卓越贡献，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注)概念就是由他提出的。他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学术建议，是一位难得的中国改革建言者。

在采访中，青木先生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他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他还特别提到，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依法治国”，并且详细地分析了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区别。

采访之后，我注意到青木昌彦先生又来中国参加了几次学术活动。尤其是2015年4月，青木昌彦和福山、德地立人三位日裔学者和中国领导人座谈时，特别提到了“依法治国”问题。可见萦绕于这位学者心中的，都是关系到中国改革前途和方向的大问题。

万万没有想到，2015年7月16日突然传来青木昌彦因肺疾去世的噩耗。我匆忙地写下一篇短文，向这位可贵的中国改革建言者告别。在文章的结尾我这样写道：“30多年来，中国改革不断遇到新的挑战。在紧要关头，如果没有一批勇于担当的改革家，没有一批直言不讳的改革建言者，就不可能正确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走上歧途。”“经济学家普遍长寿，青木先生以75岁遽然离世，实在令人惋惜。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还会有像他这样真诚地关注和研究中国改革的建言者吗？中国还会倾听他们的声音吗？”

青木昌彦：中国经济“新阶段”

采访时间：2014年12月19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国贸大厦云酷咖啡厅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阶段”

马国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马国川：您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现在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New Normal)，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New Phase）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

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即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

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

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马国川：那么，在统一增长理论看来，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

第一个因素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日本从1950—1970年、韩国从1970—1980年、中国从1980年一直到现在经济的高速增长，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

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1970年，韩国在1980年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马国川：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

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大跃进”以后，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

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马国川：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 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马国川：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放弃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

马国川：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在中国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重要的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着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马国川：“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您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落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马国川：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您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那些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马国川：在您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该加强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

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马国川：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下降过程中，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其次，现在很多40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马国川：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而日本在1990年就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1970年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

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进入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马国川：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马国川：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的人口。皮凯蒂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是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马国川：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

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马国川：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您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您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即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马国川：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20世纪50~70年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将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马国川：您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得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您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

青木昌彦：中国尽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时间，而且改革要克服许多挑战。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改革。

作为外国人和旁观者，我在谈到制度设计的时候，也讨论到“依法治国”这个概念。“依法治国”有两个英文表述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rule by law可能更像中国历史上法家的概念，就是政府来统治人民，来设计法律；rule of law意味着，政府不但是法律的制定者，而且它自己也要受到法律的管制。这也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法治改革，也就是法律系统的改革，应该排在政治改革之前，特别是考虑到现在中国的地方法官，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指派的，政府权力在司法体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司法改革中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马国川：分权还是集权，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青木昌彦：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当时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改革。当时朱镕基总理提出，严格禁止人民银行的地方银行给地方政府贷款。虽然这是一个集权化的处理方式，但是确实有效避免了通货膨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集权也不一定都是坏事。

当然，改革应该集权还是分权，还是要具体分析。

---

1. 青木昌彦.我的履历书：人生中的“越境博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2. 内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是指现代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控制权）相分离的前提下形成的，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由此导致了经营者控制公司，即“内部人控制”的现象。筹资权、投资权、人事权等都掌握在公司的经营者手中即内部人手中，股东很难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由于权利过分集中于“内部人”，因此股东

及其他利益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参见：青木昌彦，钱颖一. 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1944年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是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虽然中国政府通过海量投资的方式保住了8%的增长速度，甚至在此后两年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国奇迹”被大肆宣扬，一些人认为，高投入、高积累的增长模式是中国成功的秘密，只要坚持下去，中国将很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回落，刺激政策的拉升作用微不足道，而且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仍然有一些国内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投资拉动的方式是中国成功的秘密，还是要继续坚持这种方式。只要发展起来，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而更多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原有的那种高投入、高积累、高消耗的粗放发展模式已接近极限，中国再也承受不起其高昂的代价，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迫在眉睫[注]。

我感兴趣的是，国际上的学者怎么看待中国发展模式转变问题？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发展模式转变的路径有何见解？

2012年6月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微观计量经济学开创者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到中国人民大学做学术报告。报告很有趣。赫克曼说，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人的技能是一个不断动态发展的过程，好的技能会促进其他技能的提高。人的早期技能的培养对其以后社会能力的提高及其成功与否都至关重要。他的研究发现：人从出生到五岁期间的培养和发展将极大地影响其成年后的社会状态，同时，相比在成年后

再对其进行培训和提高，人力资本的早期投资也是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

赫克曼1944年生于美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芝加哥大学有句名言，“明辨之路是争论而非顺从”，在这所“智力密集”的学术圣地，可以经常看到一群人在很严肃地讨论某个问题。学者之间无处不在的相互启发和相互促进，让这里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集中之地。截至2013年，该校有87位教师和校友曾获诺贝尔奖，位居美国大学之首。

2000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和丹尼尔·麦克法登，以奖励他们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两位获奖者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了已被广泛用来对个人和家庭行为进行统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赫克曼的贡献是在他30多岁时完成的。

更令人钦佩的是，赫克曼教授并没有止步。在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将研究的重点转向美国人力资本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一样，赫克曼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早在2003年，赫克曼就提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偏低”的观点[注]。之后，他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及教育改革领域。他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能否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要素，人力资本也是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

报告结束后，我就在报告厅的一角采访了这位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建议中国改革教育市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开放竞争；开放劳动力市场，使私人的激励发挥作用，“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使他们能够使用21世纪的新科技，中国的潜力就能实现。”

赫克曼：开放教育和劳动力市场

采访时间：2012年6月27日上午

采访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

马国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物质投资维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您看来，现在这种增长方式是否已经接近极限?

赫克曼：尽管近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放缓的争议，但是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原因很多，不仅仅是靠投资，还有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科技发展。

我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接近极限。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比如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等。但是，我认为中国教育结构需要做一些调整，提高教学质量和职业教育，以使劳动者的技能与科技发展相适应。因为当中国在发展更复杂精密的科学技术时，必然需要更多的专业技能，而中国所需的这些技能的概念还有待扩展。

马国川：提高教学质量和职业教育，也就意味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与发达国家有哪些差距?

赫克曼：在过去，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教育政策引起国家投资组合的扭曲，更多的面向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中国在

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很明显的。例如，在1990年，中国各级政府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3%，而在实物上的投资却大约占到GDP的30%。在美国这些指标分别是5.4%和17%，在韩国分别是3.7%和30%。到2002年，中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3%，但实物投资占GDP的比重更上升到45%。

十年过去了，情况逐渐好转，某些方面的差距已经得到改善。比如中国削减了中小学学费，大幅扩大教育产业，大力提高科学技术。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绝对量在上升，教育领域大量投资的回报也是巨大的。

马国川：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中国现任政府宣布要将教育支出提高到GDP的4%，这个比重是否适应经济增长要求？应该根据什么样的客观标准来判断教育投资是否充足？

赫克曼：我会用投资回报率作为判断标准。公司或教育投资的收益计算方式就是投资回报率。在中国很少有人这么做。不过如果有人计算过，就能看到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这应该是衡量任何政府支出的指导标准。你如果想衡量对于一个活动的投资是否高于另一个，你应该总是考虑到社会效率，以使投资回报最大化。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有适当的比例，正如低成本的劳动力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员配比一样，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优化经济生产。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需要平衡，过分强调其中的一方都会损失效率。如果过分强调物质资本投资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将使中国不但不能最优化生产，也不能享受经济增长中高增值的部分。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重视人的发展问题，这样才能给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受到教育。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显

然，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很低，且只靠这些技术水平很低的人不停地生产，肯定会产生问题。

马国川：在您看来，中国在人力资本领域还存在哪些问题?

赫克曼：中国在人力资本领域并不缺乏投资，但是中国还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和职业教育，可以考虑改进中等教育，培训具有中等技能的学生，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发展侧重就业岗位的职业培训，以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促进学生就业。同时，中国也应该对以智商测验为主的考试体系等做出改进。

中国对技能的定义可以扩展一点，可以思考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早期童年的角色是什么，童年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农村地区的贫困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加对农民工子弟的教育投入。社会不平等在中国是一个严重问题，提高弱势群体的劳动技能则是改变这一情况的办法之一。

中国应该改革教育市场

马国川：您曾撰文指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回报率可能会达到30%~40%，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现在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回报率是否在降低?

赫克曼：我是在十年前写下这段话的。在这十年中，中国在学校教育的投入是巨大的，现在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是十年前的六倍。600万的大学毕业生相比十年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为市场回报不断提高，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结果。

中国是个处于转型期的大国，整体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所以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接受新技术、帮助整个社会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换句话说，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总回报仍然很高。现在的教育结构已经开始优化，但中国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

马国川：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现象，大学生和农民工的起薪差距在逐渐缩小。在某些地区大学生的工资甚至不如一个农民工的工资高。因此有人主张，既然大学毕业生得不到预期的回报，那就应该减少投资。

赫克曼：这是个错误观点。对人力资本投入将会有巨大回报，这不应受短期波动的影响，应该从长计议。为此，政府必须为这些潜在的回报变成真正的回报创造条件。关键的问题是，放开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障碍，让教育的高回报真正体现出来，让人们愿意投资教育。

马国川：提高教育投资，既可以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激励私人部门的教育融资的办法。您认为哪种方式更适合，为什么？

赫克曼：在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占到了整个社会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但是，政府绝不是支持教育资源的唯一途径。虽然刺激教育投资的一个可能的方法是补贴，但是政府资源有限，而且有大量其他问题需要解决，大量补贴肯定无法持续。

中国应该改革教育市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开放竞争，创造融资的条件，让人们不但愿意而且可以投资教育。不管是商业领域或者其他经济生活的领域，垄断行为只能导致人们要付很多钱接受服务或者机会，这样会导致不平等的情况出现。所以为了消除这种垄断，降低不平等，也应该鼓励私营部门进行投资，建立更多的私营性的教育机构，这样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教育机会，也使教育成本进一步降低。

中国已经有一些资金投资于教育领域，也有一批私营学校，但这些都需要大大加速。只要政府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种种限制，多种形式的教育投资将会涌入这个高回报的领域。依靠私人部门的融资将很大程度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的未来收益，而又不需要增加税收负担。换言之，不同的教育机构的公平竞争，可以帮助政府进一步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和效率。

教育的各个领域，包括大学都可以引入各种形式的资金进行竞争，从而促进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发展教育融资市场，使得人们不至于由于流动性约束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马国川： 中国现在有“上学贵”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由“教育产业化”造成的。他们认为教育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加大直接投资。在您看来，私人部门投资教育是否必然导致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

赫克曼： 我在中国看到，初中、高中的学费确实非常高。这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是主要的制约因素。这个现象也许是应该得到改善的。我认为省级或中央政府应该进行干预，以提高弱势群体儿童的教育水平，降低学费。中国也许可以采用公众征税的办法，利用经济增长的盈余来补贴学费。爱尔兰的学费在40年前相当高。爱尔兰政府减少了学费，使大量高中生升入大学，爱尔兰从中得到极大收益。总之，中国不应减少人力资本投入，特别是早期教育投入。

市场越开放越好

马国川： 有人认为，开放劳动力市场可能在短期增加收入的不平等，因为年轻、有能力的人受益更大。这种担心似乎并不是多余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赫克曼：我认为市场越开放越好。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市场，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寻找机会，将会促进经济发展。放开劳动力市场将会使私人的激励发挥作用，让个人得到他们技能所带来的好处将促进人们获取技能而不需要任何政府成本。允许私人激励起作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通过释放私人激励来创造人力资本，中国将创造财富，受教育的人的储蓄将为物质资本提供资金支持，这将提高政府税收。

确实，开放市场会扩大收入差距，但这种差距可能是一件好事，它可以释放出一个信号——获得越高技能的人能得到更高回报，因此收入差别在激励人们提高技能上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放开人力资本市场将会给每个人创造机会，人们技能提高对社会发展并没有害处。一个受过越来越多教育的劳动力能够产生更多的资本回报，从而生产更多的国民财富。在长期内，随着人口技能水平的整体提高，不平等程度将会下降。实际上，大量证据显示，即使在短期内，开放劳动力市场和物质资本市场也能够减少不公平，而且能促进政治的稳定。

不平等不是静态的观念，而是动态的。有些不平等是好的，它告诉人们大学毕业生可以得到高工资，小孩子会知道上大学会挣更多钱。当然，有些不平等是不好的，比如无望的状态，一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父母没受过什么教育，自己没希望上大学，甚至不能高中毕业。所以，他的生活是早期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不是好事。

马国川：您所说的这种现象，恰恰是中国教育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有调查显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起不断下降，“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的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

赫克曼：确实，在中国不同地区资源约束对个人接受教育的影响是不同的，特别是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生地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接受教育、获取技能的机会，从而导致严重的地区差异。因

此，应该进行教育改革，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管哪个国家都应该提高教育的平等性，因为进行教育投资的终极目标就是使各个社会层级的人们都能够接受教育。

首先，教育政策要体现公平的原则，不能因为其出生在农村或者不发达地区而降低其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例如，目前中国是按照省份来进行大学录取的，这就存在着不公平性。教育资源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分配。

其次，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一个更加平衡的教育投资会促进经济发展，并会减少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马国川：您对中国教育改革有何建议?

赫克曼：我建议中国更重视学前教育，减少以考试检验学校教育成果的做法，更强调人力资本的丰富概念，既重视认知技能，也重视非认知技能。

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比如中国可能会因为独生子女政策面临一些问题，老人的赡养对年轻一代会构成巨大挑战，因为孩子的数量减少了而面临人口失衡。像日本等发达国家一样，老年人口过多，靠较少的年轻人口赡养。无论如何，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的基本要素之一，人力资本也是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如果中国能够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使他们能够使用21世纪的新科技，中国的潜力就能实现。

全球都认识到，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中国的发展机遇很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我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通过有效的方式，来实现经济持续的发展和社会的平等性。

---

1.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

2.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31204/1437547675.shtml.

格泽高滋·W. 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生于1958年，波兰经济学家，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高级顾问，现为波兰科兹明斯基大学教授。

2011年冬，欧洲大陆的政治舞台上角色变幻。先是希腊总理换人，后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黯然下台。然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变换并没有扫除欧洲上空的经济阴霾。2009年以来爆发的欧债危机前景仍不明朗，欧洲央行经济学家甚至警告，欧盟面临“失去的十年”的风险。

对波兰经济学家格泽高滋·科勒德克的采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当时这位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的教授正在北京参加学术活动。采访开始，他先送我一本新出版的书《真相、谬误与谎言》。封面就是他的大头像：表情严肃，目光凝重，脑门宽大而明亮，乍看和普京有些相像。

科勒德克是波兰的知名人士，1989年参加了历史性的圆桌谈判，此次谈判带来了波兰的转型。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科勒德克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1997年他出任波兰副总理和财政部长，2002—2003年，科勒德克再次出任同样职务。他的书中介绍说，他是“波兰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

其实，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很容易误导不了解波兰的中国读者。波兰国内及国际上公认的“波兰经济改革的设计师”是巴尔采罗维奇，波兰政治转型后，这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全权负责经济体制改革，制定并实施了一个对波兰经济进行彻底改造的纲领[注]。在科勒德克第一次出任波兰副总理和财政部长之前的1992年，波兰就已经度过了“休克疗法”最艰难的时刻，开始出现增长，成为最先恢复经济增

长的转轨国家。不过，科勒德克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是“祸害半个世界”的罪魁祸首，认为波兰当年实行“休克疗法”是“不辨是非地搞新自由主义，其实不符合当时波兰的国情。”注

在采访中，科勒德克不苟言笑，每回答完一个问题，就等着下一个问题，绝不多说一句话。很难想像，这个严肃得像一个革命家的学者还是马拉松运动员和环球旅游者，已环游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同时他也是音乐爱好者和摄影师。

科勒德克不是一位主流的经济学家。他经常严厉地批评美国，认为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30年前本来可以避免，但是“在美英等国的带领下，世界因为自己过度的贪婪和普遍的短视，踏上了另一条路”，也就是新自由主义道路。在他看来，“全球经济危机产生于美国，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像某些“新左派”一样反对全球化，而是认为全球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非政府组织在经济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公民社会变得更加进步，从而使跨区域性的合作与交流更加通畅，减少了文明的冲突，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

科勒德克是中国的常客，曾多次到访中国，在中国先后推出了四本中文著作，还是一家中国媒体的专栏作家。他看好中国，认为“下一个十年，中国的崛起将成为主要特征。”他非常赞赏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不过作为一个冷静的学者，他提醒说：“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发展速度将会放慢。”

科勒德克说：“要实现完全发育的市场经济，没有健全的民主体制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对于这点一定要非常谨慎”，“从经济角度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非常成功，但从长远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政治改革。”

这位经济学家毕竟经历了波兰转型，在对比中国与波兰两国的转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发人深省。

科勒德克：未来取决于政府自我改革

采访时间：2011年11月12日上午

采访地点：北京国贸大厦

现在欧洲有两条路

马国川：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赞您是“世界经济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认为欧债危机是怎么形成的?

科勒德克：这是一个系统性经济危机。危机来自于美国的金融产业，由于一些决策者的短见和贪婪，缺少责任心，过度使用一些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被投机炒作者代替了，大量有毒资产被注入经济当中，并由金融产业传导到生产环节。所以，问题起源于金融领域，然后传导到实体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像美国这样十分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会有10%的失业率。为了挽救金融领域，政府不得不注入大量资金，这样就把债务从私有银行领域转到了公众领域。

危机随着全球化被传导到欧洲，首先是西欧。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和贬值，政府就需要提供大量的资金来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实际上，这种政策还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否则就会在实体经济中造成更大影响。

但财政赤字急剧增加，公共债务也节节攀升。当然，各国政府可以去借新债来还旧债，但是债务会越来越多，直至逼近破产地步。希腊危机就是这样，意大利也快形成类似的危机了。

个人不可能永远靠借债来生活，政府也不可能靠借债实现经济的真正复苏。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减少消费来减少借贷。政府有多种选择：提高通货膨胀，减少收入，减少社会福利，提高利率等。这将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因为人们很难接受这样的解决方式，而且各国的政治领导人很难达成共识。

马国川：发生在欧洲某些国家的骚乱表明，利益冲突非常剧烈。因此一些人对于未来表示悲观，甚至预言欧洲面临“失去的十年”的风险。在您看来，欧洲经济会不会陷入长期衰退?

科勒德克：危机确实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而且欧洲某些国家经济已经在放缓了，比如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即使像英国、德国这样经济仍在增长的国家，增长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所以，长期衰退确实也是可能的。如果欧元崩溃，将会造成非常大的混乱。不过，长期衰退不是必然会出现的，危机还是可控的。如果有更加和谐的政策来挽救，欧洲就能够避免衰退。我的预测是，欧元会被拯救，不但可以生存下去，而且经历改革后欧元区还会扩张。这就需要非常严格的安全措施，还需要制度化、结构性的改革，来改变游戏规则。

马国川：具体来说，如何进行改革，怎样才能改变游戏规则?

科勒德克：回到起点，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按原则办事。

现在欧洲有两条路：一条是控制危机；另一条是消除危机的制度性根源，把欧元的缺点消除。

欧元区有欧洲中央银行，可以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欧洲货币政策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27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财政政策，这是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经济学的艺术就在于，能够把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微观经济手段融合起来。我们不仅需要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来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也需要各国政府制定统一的财政政策，在税收、财政预算等各个方面都要协同起来。欧盟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制定统一的政策。在前不久的G20戛纳峰会上，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同还是不够的。由于危机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而是全世界的，所以需要国际社会协作来解决这次危机。现在必须采取一些相应的、非常严厉的财政政策。另外，政府要加强对金融的监管，采取比较果敢的措施。

政府的作用须与市场一致

马国川：世界金融危机尚未结束，欧债危机又起波澜，有些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出了问题。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您是一个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者，您认为应该怎么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科勒德克：现在的危机并不只是一个市场经济危机，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加强金融监管。市场应该由“看不见的手”去运行，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现在还需要政府的监控和管理。

我们需要的是经济自由和一个强大的政府，这点在功能性和公共经济效用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一个国家制度很糟糕，就像许多非洲国家那样，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会比一般情况糟糕得多。尼日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政府必须拥有足够强大、效率足够高的机构，这样才能建设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在反映社会偏好和制订发展目标方面，政府的作用不可取代。政府在促进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社会共识正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

马国川：但是，政府并不总能促进发展，官僚主义也会干预、扰乱，甚至扭曲市场机制。

科勒德克：市场必须纠正政府的过分行为，反过来也一样。在实现高效经济和高效平衡增长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但是，政府的作用必须与市场保持一致。政府作为一个超级机构，应该维持市场原则。

今天，一部分政府职能需要限制，另外一部分职能需要加强。需要限制的职能包括研发职能等。在很大程度上，以赢利为目标的商业部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研发职能。需要加强的职能包括环境保护，因为营利机构无法处理好环境问题。

在最富裕的国家，政府可以相对减少医疗开支，因为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已经购买了私人保险，很多医疗开支都可以通过私人保险报销。同时，国际恐怖主义十分猖獗，这就要求政府在保护公民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府职责是为公民提供必需的有质量保证的公共产品，只有提供了这些产品国家才能正常运转和发展。当然，政府职能发展过快对竞争性长期发展能力会造成不利影响，这点在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和管理制度很差的社会市场国家尤为明显。有些关于政府的理念是不可抛弃的，包括应该不断施加压力以遏制官僚主义和减少公款浪费现象，重点是要严厉打击腐败等。

马国川：经济转型的国家必然要求政府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往往由此导致“权力搅买卖”的现象，公权力在市场上下其手，牟取私利，从而导致腐败蔓延，甚至出现某种“权贵资本主义”。如何在转型过程中避免出现“权贵资本主义”?

科勒德克：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三种因素同时作用。

首先，价值观。这并不是从无到有马上就能产生的，而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文化、教育过程才能转变。知识阶层和文化阶层是使市场有效运作以及迅速发展所必需的，缺少知识阶层和文化阶层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其次，规则的作用。比如法律，人的行为需要法律来规范。有了规则，才能够避免腐败和行贿受贿。

最后，政策。政府领导必须以身作则来控制、对抗腐败。

马国川：但是，要求政府领导人以身作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转型国家里，一些出身于平民的领导人在上台之初清正廉洁，后来也容易腐化堕落。

科勒德克：那只有通过民主的程序才可以对领导人形成制约，比如自由的选举、独立的媒体。假如没有这两者就很难控制领导人的行为。

民主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可以相互协调

马国川：在您看来，民主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是什么关系？

科勒德克：一些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发展水平之间有很高的关联度。换言之，有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民主程度也很高，反之亦然。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尤其是从长期来看更是如此。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可以发现，一些国家收入水平很高，但是民主程度很低，例如白俄罗斯、伊朗；而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

高，但民主程度却相对较高。经济成功实际上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不只是民主，还有社会、文化、科技、政治、环境等因素。

我始终坚信，如果改革措施能得到合理设计，民主化改革与市场化改革是可以相互协调的。民主政治在长期是支持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因为民主政治可以有效地纠正和制止错误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效果不好，制定该政策的政治家就很可能在下次选举中落选或通过其他机制被更换掉。

但波兰这20年改革历程表明，在短期内，民主政治可能会给经济改革包括经济政策的制定造成许多困难。

马国川：既然民主政治在很多时候并不会形成最好的政策，假如您可以重新设计波兰的改革，您是否会选择保持政治制度基本不变，而仅仅改革经济制度?

科勒德克：我还是会选择同时进行市场化改革与民主化改革。首先，民主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当然民主政治也是有很多问题的，短期来看它可能会出错，譬如民主选举并不保证一定选出最合适的人，言论自由也意味着有说谎的自由，公众舆论有时也可能出错，政策的制定往往要经过反复的讨论、辩论，最后形成的政策往往是各方政治力量的妥协。

但是从长远来说，民主还是会帮助市场转型，民主政治能够制止和纠正错误的政策。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是相互促进的。

我认为，市场化改革迟早会导向民主化。非民主国家无法保证领导者不腐败、不贪婪、不反复出错，又没有一个机制可以摆脱这样的领导。世界上非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好的例子是极其少数的，大量的是非民主国家失败的例子。

民主政治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美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了200多年，波兰转型也已经20年了，也许还不够长，还要继续学习。

马国川：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曾经学习波兰的改革经验，不过后来两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改革路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波兰改革与中国改革有何不同？

科勒德克：以1989年为清晰的分界点，波兰开始了政治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与政治制度转轨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改革，前者是保持基本制度不变而进行的经济改革，政治制度转轨则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向一个新制度转变。

换句话说，波兰与中国的不同在于，波兰许多经济改革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1989年后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改革并举。西方国家对制度转轨的支持与推动，对波兰改革推进是有积极意义的。

波兰改革很清楚“从哪里来”和“要往哪里去”，正如从成都到北京，我们到达目的地，转轨就结束了。而中国改革只是知道“从哪里来”，但不确定“要往哪里去”，再加上外部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不知道20年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会是怎样的，中国改革的最终结果还是一个问题。

相比而言，波兰更有把握知道20年后波兰的市场经济会是怎样，我们的制度转轨总体来说是朝着与欧盟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向迈进的。

市场经济还需政治改革

马国川：尽管波兰与中国的改革路径不同，但是二者都很成功。波兰转型20年来，GDP年均增长都比较高，被公认为是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在您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秘是什么?

科勒德克：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真相、谬误与谎言》，对中国成功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第一，全球化。当代中国没有错过全球化的列车，而是利用全球化为国民经济、中国企业和公民谋取了福利。

第二，市场化改革。中国进行了循序渐进的市场改革，从长远来看，唯有遵循市场中正确的制度才能取得经济上的进步。

第三，中国制定了长期发展战略而非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的魔力，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撒手不管。

第四，中国政府是开明的，这种开明建立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基础之上。

马国川：未来二三十年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否仍然能够保持?

科勒德克：如果增长速度指的是GDP的增速，那么就不应该幻想过去的平均增长速度能够延续到未来50~100年。事实上，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正在逐渐放慢。

中国同样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的警告一直不断，但是这个时刻还没有出现。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发展速度必将减慢。然而，如果中国继续通过一种系统的、渐进的方式分散政府权力，同时使政治体

系更加民主化，那么在未来一二十年里，这个国家将继续以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增长水平发展。中国的增长对于世界的现在和将来都非常重要。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在于它对世界实体经济的贡献。只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影响力在最近几年才显现出来。但是它在世界经济体中扮演的角色还是不够重要，未来中国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

从长远来说，我并不认为中国能够控制乃至主宰世界。未来的世界政治秩序、经济秩序还是多元的。

马国川：近年来，您经常到中国来，而且和中国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您曾经说过，“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政府能否自我改革”。那么，政府如何才能实现自我改革？您对中国改革有何建议？

科勒德克：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从文化角度来说，中国会有很多的变化。虽然出现新的变化是很困难的，但是我相信，公民社会发展得会越来越好，也会有民主的机构逐步出现。这种变化过程是渐进的，先从地方政府开始，然后到区域性的，一直到中央政府。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可能实行美国或西欧式的民主制度。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中国的体制可能会更加像人们所熟悉的日本和印尼。但是，要形成完全发育的市场经济，没有健全的民主体制是不能够长久的。中国对于这点一定要非常谨慎，从经济角度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非常成功。但是从长远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政治改革。建立健全民主体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有人问，中国会不会像中东那样出现革命？我认为，如果中国经济稳定，就不会出现政治动荡。但是，中国不可能永远都以10%的速度发展，所以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1. 耶日·卢克瓦斯基，赫伯特·扎瓦德斯基.波兰史[M]. 常程，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2. 格泽高滋·W. 科勒德克. 真相、谬误与谎言 [M].张淑芳，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

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 rowicz），1947年生，波兰经济学家，曾两次出任波兰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央行行长，被公认为“波兰经济改革的设计师”。现为波兰华沙经济学院教授。

2013年5月的一天，华沙笼罩在时急时缓的春雨中。我打着伞，来到华沙经济学院（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据说，这是欧盟顶尖级的经济类公立大学，但是大门毫不起眼，主楼顶部倒是很奇特，仿佛金字塔。波兰的传奇人物、著名经济学家巴尔采罗维奇就在这所大学任教。

1989年9月，波兰民主政府上台执政，年仅42岁的青年学者巴尔采罗维奇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全权负责经济改革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在他的主持下，波兰1990年1月1日实行了“一步越入市场经济”的激进的“休克疗法”，包括放开了90%商品的价格、解除了进口数量限制、实行统一关税、取消了大部分出口数量限制等激进措施。一些学者对这种“休克疗法”大加鞭挞，波兰的经济也出现了衰退[注]。但是波兰很快就度过了难关，1992年摆脱衰退，实现增长，成为最先恢复经济增长的转轨国家。

在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当时66岁的巴尔采罗维奇先生。这位两次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学者已经重返学界，担任华沙经济学院的教授。巴尔采罗维奇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他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手势丰富，表情生动。中间两次有事出去，都是一路小跑，精力充沛。望着这位国际上公认的“波兰经济改革设计师”，我想，当年推动经济改革时巴尔采罗维奇一定意气风发，满怀豪情。

在闲谈中我得知，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巴尔采罗维奇就领导一个青年经济学家小组，着手起草过一个经济改革纲领。当时波兰的计划经济体制流弊尽显，财政危机，罢工潮迭起。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建议进行工业结构改革，推进经济市场化，结果被当局视为过于激进的改革方案，遭到拒绝。虽然研究报告不得不“交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却在经济学界反响很大，巴尔采罗维奇被称为“波兰经济学家中的一颗新星”。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只是选择的路径不同。中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而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采取的是“激进式改革”——“休克疗法”。一些人士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由于采取“休克疗法”而损失惨重，而“渐进式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注]。

但是，在巴尔采罗维奇看来，“大量的数据证明，‘激进式改革’是比较好的转轨办法。”他多年来一直在跟踪研究经济转型国家，并且拿出一堆图表向我解释。

“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优劣之争恐怕将持续下去，不过在对比中自我审视，终究是有益的。就以“渐进式改革”而言，由于着力在边缘进行突破，因此在改革初期进展顺利，可是有些基本矛盾是回避不了的。而且由于妥协退让，产生了特殊既得利益集团，使得进一步改革困难重重，乃至于“改革自己绊倒了自己，陷在半途，离群众越来越远”[注]，背离了最初的改革目标。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还属于“半市场、半统制”，要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需要第二次转型。因为既要打破依旧存在的体制性障碍，还要破除业已形成的特殊既得利益，所以这次转型的艰难程度并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体制转型。在这种情况下，认真审视过

去的转型道路，借鉴其他转型路径的经验，显然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来说，巴尔采罗维奇的一些观点何尝不是“逆耳忠言”呢?

巴尔采罗维奇：为“激进改革”正名

采访时间：2013年5月27日

采访地点：波兰华沙经济学院

激进改革是比较好的转轨办法

1989年10月，波兰政府通过了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主持制订的经济纲领，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到三年，波兰便实现了2.6%的经济增长，成为中东欧地区最早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1994年，波兰成为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转型前水平的转型国家。同样采取“休克疗法”的捷克、波罗的海三国的经济表现都很优秀。而采取“渐进式改革”的白俄罗斯“直到今天还没有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表现乏善可陈”。

马国川：1989年9月，在您的建议下，波兰新政府对经济采取“休克疗法”。当时，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巴尔采罗维奇：其实我从来没有用过“休克疗法”这个说法，这是媒体喜欢使用的、有伤害性的名词。我认为，“激进式改革”一词更准确。所谓“激进式改革”，就是在很宽广的领域，用很快的速度去改

变经济的很多方面。“激进式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自由市场，为此就要建立宏观经济部门、独立的中央银行等。

为了建立自由市场，“激进式改革”当然不是唯一的方法，但另外的方法没有这么好的结果。比如说，白俄罗斯、乌克兰的“渐进式改革”，因为改革推进很慢，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建立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表现乏善可陈。而波兰经过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经济转型，1992年经济开始增长。

马国川：在您看来，进行“激进式改革”的转型国家，比不用这个方法的国家的结果要好。那么，在东欧国家里，为什么波兰能够采用“激进式改革”?

巴尔采罗维奇：因为我们早就有准备。例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博士，仅是我的个人爱好而已，没有办法执行，更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波兰的转型。后来，我们逐渐形成一个专业的团队，其中许多人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专业教育。到了1989年，这个团体的一部分成为政府官员，开始实施“激进式改革”。

当时波兰没有了所谓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束缚，打破了政治障碍，我们可以往前走了。虽然波兰在经济方面表现很不好，没有经济实力，又有金融危机，但还可以改革，发达国家也支持这些改革措施。

改革时我们经常雇佣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我们这个团队非常年轻，有活力，所以做得比较快。在两年半时间里，完成了许多重大改革，解决了财政赤字、外债高筑及通胀加速的恶性循环等问题。

转型之初一位中东欧事务观察家指出，经济改革的成果只有在六年后才可以显现，可是波兰用了不到3年时间，经济就开始恢复为正增

长，增长率甚至一度超过6%。2007年波兰人均GDP已经高达16600美元，完全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2008年爆发了世界金融危机，波兰也是欧洲国家中经济表现最好的。

马国川：在俄罗斯主持“激进式改革”的同样是年轻人，如盖达尔总理年仅36岁。可是，在那里“激进式改革”的效果并不好，此后很长时间俄罗斯经济下滑。许多批评“激进式改革”的人士往往以俄罗斯为反面典型。

巴尔采罗维奇：确实，俄罗斯也有一个年轻的改革团队，他们还到波兰来学习我们如何执行改革措施。所以，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可惜他们的时间比我们短，盖达尔总理执政只有一年半时间。他们的障碍主要来自议会。当时俄罗斯议会还在原共产党人的掌握中，他们阻挠改革。另外，俄罗斯面临的历史问题、国际问题太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经济问题。所以，俄罗斯的GDP减少了，生活水平也一度下降。可是，一个人生病了，如果不做什么治疗的话，肯定会更差。

捷克1991年开始实施“激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经济严重衰退，但是不到三年时间经济开始好转，1994年捷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2006年捷克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到2010年，捷克人均GDP 18288美元，世界排名第38名。

实施“激进式改革”的波罗的海三国的经济转轨也都很成功，3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认，波罗的海三国由于进行了成功的改革，才得以摆脱危机，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势头。

总之，就苏东地区各国而言，“激进式改革”的国家在中长时段上付出的总代价一般要小于“渐进式改革”的国家，转轨后的新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条件，那些一直“渐进”的国家则纠缠于新旧问题，发展缓慢。

我们一直对转型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跟踪研究。20多年积累的大量数据证明，“激进式改革”可以迅速改变经济体制，在新的体制下经济可以迅速恢复增长，所以“激进式改革”是比较好的转轨办法。

政府要减少干预，让经济自由发展

巴尔采罗维奇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很快，不是因为政府拯救企业，而是放弃了救企业的老方法，让市场发挥作用。“中国本来还可以发展得更快，由于政府对于国有企业仍然采取某些支持政策，使得市场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中国还要继续发展，就要改革旧有的经济制度。一句话，政府要减少干预，让经济自由发展。”

马国川：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波兰实行“激进式改革”，中国却实行“渐进式改革”。您如何评价这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

巴尔采罗维奇：中国和波兰等东欧国家情况不同。

在30多年以前，中国进步得很慢，但是和波兰等东欧国家相比，中国改革之初的基础条件要好得多：因为中国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通过农村改革，很快就改变了经济面貌。俄罗斯和东欧的农民很少，很难做什么改变，而且这些国家科技水平比较高，所以是完全不同的改革起点。

另外，中国在改革初期也没有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波兰和苏联都有很高的通胀率。有很多有钱的海外中国人可以给中国大陆带来大量的投资。波兰也有许多海外波兰人，但是没有海外中国有钱人那么多。至于其他东欧国家更没有这样的条件，俄罗斯的资本只有外流，缺乏投资。因为情况不同，所以必然采取不同的转型方式。

马国川：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有人称之为“中国奇迹”。您如何评价“中国奇迹”？

巴尔采罗维奇：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以前的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一样，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只是因为中国体量很大，是一只庞大的“亚洲龙”，谁都感到惊讶。欧洲没办法有中国这么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因为我们是从比较高的阶段开始的。我们没有中国这么好的发展背景，中国储蓄率比较高，而且可以用这些储蓄投资企业。

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是因为有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我来说，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政府对企业采取拯救企业的办法。

如果一个国家很穷，而且保护国有企业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很大，那也没有办法发展了。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很快，不是因为政府拯救企业，而是放弃了救企业的老方法，让市场发挥作用。

中国本来还可以发展得更快，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仍然采取某些支持政策，使得市场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中国还要继续发展，就要改革旧有的经济制度。一句话，政府要减少干预，让经济自由发展。

马国川：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是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改革？如果需要，中国的做法有何不妥呢？

巴尔采罗维奇：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因为在转轨经济中，国家资源比已建立的市场经济更为有限，国家选择适当的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时间相当有限，国家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行政体系及专业的公务员队伍。同时，国

家税收下降与支出大幅度上升，影响了政府实施经济权力、对经济进行调控的能力。

其次，在转轨经济中，制度重建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家不得不集中精力制定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界定与保护产权、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市场经济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如独立的中央银行、股票交易所等。

显然，这些任务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取代市场的作用，而是要为自由市场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旦这些任务完成以后，政府就要严守边界，不能干预市场的自由运转，否则就会扰乱市场信号，甚至引发经济危机。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新的教训。

马国川：对于金融危机的起因，有许多互相矛盾的解释。在您看来，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巴尔采罗维奇：金融危机之所以在全球蔓延深化，根本原因在于其爆发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造成危机的主要因素是政府管理存在缺陷，可以说都是政府的问题，而不是市场经济有问题。例如，西班牙的银行监管很有问题，银行听命于政府，政府决定谁应该得到贷款，结果银行去做了很多没有效益的项目，引发了欧债危机。

市场经济会不时发生波动，这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应该关注如何减少经济波动，但是不能妄图以政府的行政干预来避免经济波动。事实上，要解决本轮经济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增加政府干预，只会使市场更加紊乱。

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

马国川：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表现很好，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现在有些经济学家预测，20年以后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巴尔采罗维奇：中国之所以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是因为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会越来越缓慢，而且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优势很快就会丧失，与美国的差别会越来越大。

马国川：就是说，在您看来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

巴尔采罗维奇：也可能。不过，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考察。300年前，中国的经济是世界第一。但是此后中国开始走下坡路，可是直到100多年前，中国GDP总量仍然是世界第一。这说明，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要更加长久地观察，而不是遽然下结论。

马国川：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正是因为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才能够发展这么快。

巴尔采罗维奇：如果中国不是接受了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对于我来说，社会主义就是由国家控制经济、控制企业，但中国已经不是这样了，虽然中国仍然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波兰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因为企业家不会害怕警察和搞政治的人。看企业家害怕什么，就能知道是哪一种政治系统。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制的市场国家里，企业家唯一害怕的就是法律。有些改革必须有完全正确的政治系统才能执行。

波兰除了经济改革，也有政治改革。在政治上，波兰改变了宪法、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实行司法独立、自由选举，所以，在我们波兰没有“裙带资本主义”现象。

据我所知，中国现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尤其是利用公权力腐败很严重。那些握有权力的人不但自己可以牟取经济好处，他们的儿子、孙子也都很有钱。所以中国经济尽管发展很快，但是政治腐败值得重视。经济、政治对人民来说都很重要。

马国川：对于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各界也有共识。

巴尔采罗维奇：中国改革以后，公民可以自由地做生意人，很多人从事经营，已经有好几千万人从穷人变成了比较富有的人，也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经济的自由。但在政治方面，中国仍然受旧体制的影响，而且这些旧体制和经济自由存在冲突。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这些冲突一直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其实历史上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没有政治改革，但是实行了司法独立，同样获得了快速发展。韩国在实行民主改革之前，司法就获得很强的独立性，中国台湾也是如此。中国香港的司法独立也做得很好，有经济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有司法的保障，所以香港的经济发展很快。

---

1. 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M].刘晓勇，应春子，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2. 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
3. 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M].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胡永泰（Wing Thye Woo），1954年生，马来西亚经济学家，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经济问题、国际金融构建、经济增长和汇率经济。

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682美元，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不过，世行的一份报告提出，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跻身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475美元以上），许多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在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面临调整。于是，中国会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成为国内关注的热门话题。

2012年初夏，我在河南开封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2年年会，意外地见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系教授胡永泰，于是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

最早是读经济学家杨小凯的文章，才知道了胡永泰先生。2004年4月，杨小凯和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合作发表《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首次提出了“后发劣势”观点，并得出结论说，“在执政党的政治垄断下，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该文引起国内外政治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先后被国内外数家杂志转载，并被国内几家著名网站隆重推介。当年年底，杨小凯在北京做“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引发国内经济学界广泛讨论[注]。此前中国作为后发国

家，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后发劣势”让人们思考中国发展的另一种图景。

胡永泰先生小杨小凯6岁，1954年生于马来西亚华裔家庭，198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而后在美国的大学任教。胡永泰曾为许多国家的政府提供宏观经济、外汇管理、国有企业重组、贸易问题和金融部门发展方面的建议。20世纪90年代，他受聘为中国财政部顾问小组成员，帮助设计了1994年1月实施的税收和汇率改革。1997—1998年，胡永泰担任美国财政部特殊顾问，随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访华及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香港的年会。2002—2005年，他是联合国千年项目东亚经济特殊顾问。2005年7月，他被任命为马来西亚首相国际顾问小组成员。显然，这位经济学家并非坐守学斋的学究，而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因此，加利福尼亚大学2004年授予胡永泰“杰出学者公共服务奖”。

胡永泰的汉语讲得并不好，因此总是辅以大幅度的手势和丰富的面部表情。但是在采访中我发现，他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确实有深入研究，而且能够从国际视野看待中国发展[注]。1994—1996年，胡永泰曾领导一个国际小组专门研究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经验，中国自然也在研究之列。

胡永泰风趣地把中国比喻为“一辆疾驰的火车”。在他看来，有三种可能性导致这列火车在行驶中发生事故：一是政府经济政策失误；二是社会矛盾激化；三是“动力供给”被切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环境恶化甚至崩溃，另一个就是外部世界把中国隔绝开来。他坦率地说，“我最担心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具备融入世界的能力。内部的问题也许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但是在外部世界，你必须要与别人合作。”

3年过去了，中国这辆“火车”正在减速，“后发劣势”渐次显现。它会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最终抵达人们期待的目的地吗？

胡永泰：中国的最大挑战来自外部世界

采访时间：2012年6月24日下午

采访地点：河南省开封市开元名都大酒店

中国存在“硬着陆”的可能性

马国川： 目前中国经济速度很明显是在往下走，许多人士担心中国经济有可能“硬着陆”。2011年您的同事鲁宾尼也曾经说，中国可能会因为过度投资而在2013年发生“硬着陆”。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在您看来，中国有没有“硬着陆”的可能？

胡永泰： 坦率地说，“硬着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如果不幸发生，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很多项目都是国家控股的企业或者地方政府来投资的，如果发生问题，投资最后都会成为银行的坏账，导致财政困难。如果政府愿意改革，坏事可以成为好事。可行的办法就是出售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例如，可以将政府控股的四大银行私有化，国外银行一定很愿意购买，这样就既可以解决那些坏账，也可以打破垄断。

马国川： 其实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在2003年、2004年进行的银行改革，就是引入战略投资者，从而化解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

胡永泰：是的，只是没有做到位，四大银行仍然是国有控股的，仅仅是让渡了一部分垄断利益而已。银行的董事长还要由政府任命，对他们来说，钱重要，前途更重要，听话才能提升。换句话说，那场银行改革是一场半途而废的改革。

马国川：如果被动地进行改革，代价显然会很大。

胡永泰：其实不需要完全卖给外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企业家也可以过来搏一把，中国现在有一些私人企业也有能力来买一部分。一旦将银行业的垄断打破，中小银行就会发现它们多半都是借钱给中小企业的，这样中小企业就活跃起来了。

马国川：我理解胡教授的意思，您是说：第一，中国经济是有可能出现“硬着陆”的；第二，出现这种可能也不用特别害怕，因为它有可能成为改革的契机。

胡永泰：除非什么都不要改，那就没有办法了。

马国川：经济学家楼继伟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改革的经验就是“危机倒逼改革”，也就是您所谓的“坏事变成好事”。可是，假如坏事就是坏事呢，那么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停滞不前。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在2007年就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中国各界关心的是，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胡永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统计角度来定义的，另一种则是动态定义。前者是指达到一定收入程度（比如人均GDP 4000美元）之后，就会面临“陷阱”，从而无法继续增长，所以它是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后者所说的“陷阱”是指不能以快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因此永远不可能赶上这些发达国家。

我们知道，要想赶超发达国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增长率就必须超过它们，否则是追不上来的。

这两种解释，如果用第一种，那么这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但如果用动态定义，那么这就是实实在在、可以看到的问题。比如拉丁美洲，它们的GDP还在不断增长，但是它们仍旧追赶不上美国，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增长速度没法超过美国，所以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不会发生变化，这就叫“中等收入陷阱”。相反，我们来看韩国，它就在不断靠近美国。

通俗来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你没有能力靠近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如果你的增长曲线更加陡峭，那么你就可能追上它；如果你的增长曲线和它一样或者比它更平缓，那么你就永远也追赶不上，尽管这时你的收入也在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进步。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说你的生活水平有没有进步，而是说你的生活水平有没有追赶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GDP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能保持比最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就会陷入动态定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吗

马国川：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

胡永泰：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总是重复同样的政策。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会有不同的挑战，如果总是用同样的政策来应对不同的挑战，这个国家就会在原地不动，增长就会停止。

很多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没有及时改变经济政策，反而倾向于在经济发展停滞的时候更多地重复之前的行为，而问题在于挑战已

经不同于以往了，大量地重复之前（的经济政策）不能解决问题。

最好的例子是苏联。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射卫星的国家，第一个送人进入太空的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拥有了核力量。

苏联失败在于没有实行经济开放政策，这也正是中国做到了的。计划经济使得苏联经济从底层发展至中层，但是同样的方法不会让它的经济持续增长。基本上来讲，这就会有经济停滞，而经济停滞常导致社会不稳定性。还有个很好的例子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GDP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是美国的28%左右，直到今天，它的GDP还是美国的30%。

世界历史上只有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大规模经济发展逃脱了“中等收入陷阱”，它们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是三个特例。

马国川：为什么只有东亚的这三个国家和地区能够逃脱“中等收入陷阱”呢?

胡永泰: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会采取新的经济政策应对新的挑战。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劳动密集型工厂被采用，受教育程度不受重视。当利用廉价劳动力使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需要创造更多的价值时，它们开始建立大学，吸引出国深造工作的学生回国，让他们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如果没能完成这样的转换，没有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 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完全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中段的时候，必须要停一下，做出经济政策上的改变。

至于中国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人均GDP也是增长的，也有进步，但是增长的速度非常慢，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处在“低等收入陷阱”中。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把国家带出了“低等收入陷阱”:

改革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经济制度，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对劳动者进行正面激励；开放意味着人们视野被打开，学习模仿先进技术，新技术很容易就流进来了。

马国川：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4628美元，开始达到4000美元这一国际公认的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标准。中国能不能像韩国那样，脱离“低等收入陷阱”以后，还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该怎样防止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呢？

胡永泰：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是在需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改革，就好像开车到了一个转弯点，必须要转向。

现在的中国就像是“一辆疾驰的火车”，如果在行驶过程中出事，会有三种可能性：第一是硬件问题，这是指政府的货币政策控制不好，出现了严重了通货膨胀，或者是银行体系崩溃、出现债务危机等。第二是软件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时主要关注的是“硬件”，但是现在“软件”问题好像比较突出。第三是“动力供给”问题。对于高速行驶的火车来说，如果“动力供给”被切断，将会是致命的。有人认为腐败是中国最主要的威胁，但我认为，行驶中的“动力供给”问题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马国川：在许多人看来，腐败才是中国的最大挑战。人们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特征，也包括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其中腐败是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大病症。

胡永泰：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大等问题，究竟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关键就是看这些问题的程度。我们可不可以说美国贪污腐败的程度比非洲更严重呢？当然，最好的情况是这些问题都不发生，都是零，但是从0~100还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所以，这些问题基本上会持续存在，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说，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要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社会，就可以限制这些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最大挑战来自外部世界

马国川：您所谓的“动力供给”具体是指什么？

胡永泰：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环境恶化甚至崩溃，另一个就是外部世界把中国隔绝开来，比如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现在最可靠的增长动力是什么？出口。如果美国和欧盟有一天借口说中国在环境变化问题上没有出台令他们满意的政策，因此限制中国的碳排放，减少甚至停止中国的出口，中国短期之内怎样办？所以中国不仅是要建设和谐社会，还要帮助建设和谐世界，展现出“大国”的风范，而不是凭以前的惯性行事。

马国川：是不是说，您认为中国的最大挑战来自外部世界？

胡永泰：是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具备融入世界的能力。内部的问题也许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但是外部世界里，你必须要别人来与你合作。

当务之急，中国必须向世界展示和解释自己的“理念”，而不仅仅是展示自己“有钱”——有钱可以买到东西，但买不到尊重。很多西方国家现在跟中国交好并不是因为尊重。

从近代历史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相处得比较糟糕。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就把自己封闭了，那也是中国落后的开始，封闭的

原因就是无法与世界相处。这也是我认为存在“动力供给”枯竭危险的原因。

中国是否有明确而长远的与西方、邻国以及中东非洲交往的战略呢？大国常常出现的一个毛病，就是迷失在自己的问题里。美国也是如此。我认为外部世界才是中国真正的挑战。

马国川：但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也很多很复杂，一些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胡永泰：中国需要哪些方面的改革目前已经非常清晰，而且人民群众也有强烈的改革意愿。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国人早已看过了世界，知道自己没有理由比别人过得差。人们会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香港一样富足？眼界打开之后，脑子也打开了，想封闭也是很难的，在这点上我很乐观。

不过，中国还是要增强“动力供给”，包括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很多的中东国家永远不会富有，因为它们不允许女性接受教育，如果一个国家歧视一半的人口的话，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半大脑，这个国家也不能充分发挥竞争力。马来西亚歧视华人，所以马来西亚也不能够有效的竞争。

中国目前还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对农村居民的歧视实际上使得中国不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农村，即使他有成为爱因斯坦的潜能，最终也不会成为爱因斯坦，因为他上大学的机会少得多。所以最后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在“包容性增长”之外，“包容性教育”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不管是谁，只要有能力就都有机会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受到最好的教育。

马国川：“包容性教育”其实就是公平教育，年轻人不会因为家庭出身而不能接受公平的教育。

胡永泰：中国不缺聪明人，你可以说中国有最多的笨人，也有最多的聪明人，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但是一个企业只需要一个聪明的老板如乔布斯，就可以创立“苹果公司”。“包容性教育”将为中国提供持久有效的“动力供给”。

通过经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可能只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实际上投资依然应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关键是在哪里投资，中国不应该仅仅投资出口行业，而应该投资于城市化进程，因为中国依然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很多人应该被城市化。一旦实现城市化，“包容性教育”也就会逐渐实现，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供给”。

此外，为了增强“动力供给”，中国不能歧视私有企业家。私有企业无法获得跟国有企业一样的待遇，我想这也会伤害中国经济发展。

---

1. 张五常，等.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2. 胡永泰，陆铭，杰弗里·萨克斯，陈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M].广州：格致出版社，2012.

萨多夫斯基（Andrzej Sadowski），1960年生，波兰经济学家，波兰亚当·斯密研究中心副主席。

经济学家凯恩斯讲过这样一段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实际上都要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有力。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精英统治的。那些相信自己在智力上不受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狂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注)

如果把这段话中的“实干家”换成某个国家，也是成立的，比如说波兰。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波兰经济转型中，两百年前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思想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群大学生就自发组建了亚当·斯密中心。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亚当·斯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又注重道德情操，这些年轻人希望能继承斯密的精神，推动波兰的变革。在强硬的计划经济统治下，他们已经在研究波兰如何进行经济自由化，实行市场经济。共产党政府也注意到这些研究成果，而且开始实施他们的部分设想。1988年，波兰通过了一部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经济法》。虽然这部法律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但是在一年以后开始的波兰转型中，这家民间智库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曾经两次造访波兰这个最知名的思想库，第一次是2011年秋天，第二次是2013年夏天。它位于首都华沙市的一个幽静的老街上，大门上镶嵌的标志就是亚当·斯密的头像。这位追求完美、去世前将手稿全数销毁的经济学创始人，一生从未履足波兰，只是在《国富论》里提到过“波兰小麦的价格与品质同样优良的法国小麦同样低廉”。(注)当时的波兰是一个农业国家。亚当·斯密不会想到，他的自由市场的思

想在19世纪末期遭到了严峻挑战，甚至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都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一种迥异于市场经济的体制。然后，世界历史又开始“倒车”，曾经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重建市场经济。

波兰是这些转型国家中的一个典范。经过15年的转轨，波兰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2004年5月1日，波兰正式加入欧盟，成为国际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波兰由一个“欧洲病夫”转变为展翅飞翔的“中欧之鹰”，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也是欧盟里唯一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称赞波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巨变，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是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奇迹。”

波兰不仅开启了东欧经济转轨的先河，而且对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波兰转型的经验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启示意义。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萨多夫斯基是亚当·斯密研究中心的副主席。我曾两次见到他，并与其进行深入交谈。见面地点都是在亚当·斯密研究中心的会议室。会议室里飘着淡淡的咖啡香，坐在舒适的沙发里可以看到窗外的石块铺砌的街道和悠然走过的行人。

这位学者具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对转型国家深有研究。他对中国也颇多关注，曾数次到访中国。他深信亚当·斯密的学说，认为“自由市场是最好的，自由越多，腐败越少”。在他看来，如果波兰能推行更彻底的自由化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有望达到中国的速度，关键在于领导层和民众有没有变革的魄力。尽管在很多外部人看来，波兰转型已经完成，国家也运转得很好，但这位“顽固”的学者，仍不改一贯的批判态度。

我想，有不同的观点，并且能够自由表达，才能促进一个国家不断发展和进步。

萨多夫斯基：自由越多，腐败越少

采访时间：2011年9月13日、2013年5月20日

采访地点：波兰华沙亚当·斯密研究中心

现在的波兰有“两个世界”

马国川：据您介绍，在转型之前波兰就已经有了经济自由化度最高的一部《经济法》。但在20世纪80年代波兰共产党进行过军事管制，在此期间怎么能够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呢?

萨多夫斯基：波兰转型并不是从1989年开始的，而是在波兰共产党执政期间就开始了。1981年波兰共产党实行军事管制，停止一切工会活动，禁止罢工，实行宵禁，对200多家大企业实行军管，派军官小组分赴各省实施军管。后来军事管制失败了，波兰经济遇到危机，人们买不到鞋子，更买不到酒，几乎所有商品都要凭票购买。于是，执政党意识到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当时共产党面对巨大的经济危机，完全无法控制经济，于是就把经济领域放开了。从1985年开始，波兰允许外国企业进入，本地企业也允许有更大的业务范围。与此同时，波兰也开始了政治自由化。

马国川：既然自由化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乃至于波兰共产党最终还是下台了?

萨多夫斯基：因为时间已经太晚了，1988年12月波兰共产党通过新法律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没有人相信它确实在转型。波兰人民认为，若想获得自由与尊严，必须对国家体制进行一番

根本性的改变。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波兰共产党不可能以经济成就来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

应该承认，波兰共产党的改革措施虽然最后夭折，但这奠定了国内的经济自由化氛围，同时也有了较为有意地尝试，更激发了波兰民族身上的独立性。我个人认为，如果1982年，也就是在实行军事管制的第二年波兰共产党就通过经济自由化法律，那么它有可能现在还是执政党。

马国川：真的有这种可能吗?

萨多夫斯基：有可能。有一段时期人民没有饭吃，也没有自由，波兰共产党还可以靠强制力推行激进的经济政策。但是超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就没办法了，因为到这时它甚至无法保证党员的基本需要，从而无法执行自己的政策。例如，国家安全机构里的许多警察都提前退休了，因为国家财政没有更多的钱养活他们。

马国川：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转型国家都实行了“休克疗法”。为什么“休克疗法”在波兰获得较大的成功，而在俄罗斯却遭遇失败呢?

萨多夫斯基：波兰“休克疗法”的主要措施包括：改变所有制结构，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国家财务制度；改革银行体制；开辟资金市场；建立劳动力市场，贸易自由化等。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类似发达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

其他国家也采取了大体相同的改革措施，波兰之所以比较成功，有两个原因：第一，实行“休克疗法”的其他国家改革的范围比波兰还要小得多。第二，波兰人特别喜欢、也善于进行经济活动，而且比较勇敢，而其他国家相对保守。例如，在很多国有企业倒闭之后，波兰人马上寻找新的工作岗位。波兰转型之初，个体户一度达到600万。

可以说，现在的波兰有两个世界：一个是200万自由企业组成的“自由经济区”；另一个是国家控制的经济领域。德国的私有化过程用了十年，而波兰在转型二十年之后，经济私有化还没有完成。

马国川：我们以为，波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已经完全实行了经济私有化。

萨多夫斯基：最初在进行市场私有化时，波兰共产党仍然对一些经济行业保持完全控制。例如，波兰共产党仍然保持着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波兰有些行业直到现在还没有私有化，例如煤矿、钢铁等行业现在还有很多国有企业。

马国川：是不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才导致私有化的过程很不顺利?

萨多夫斯基：不，最重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是政治家离开政治舞台后的好去处，他们可以在这些企业拿工资，享受福利。换言之，政治家们为了保护个人私利而反对私有化。

政府自己不会创造财富

马国川：为了个人私利，政治家既可能拒绝私有化，也有可能积极推动私有化。

萨多夫斯基：是的。在波兰，人们经常谈到的“私有化”并不是真正的私有化，而是政府把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卖给一个公司，导致垄断。现在，在欧盟的压力下，波兰政府不得不进行真正的私有化。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所进行的私有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波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来自底层的、民间的经济活

动。政府每次进行私有化都会取消一些工作岗位，形成失业。私人企业不一样，它们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目前，波兰国有企业占有的份额越来越低，因为私有经济在不断地增长。波兰GDP的70%来自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全部都是私营的。

马国川：自转型以来，波兰GDP增长每年大概是多少？

萨多夫斯基：20世纪90年代增长速度是7%，如果加上灰色经济，可能超过10%。经济转轨无疑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指望不付任何社会成本轻而易举获得转轨的社会收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值得庆幸的是，波兰经济转型衰退期最短，仅仅持续了不到三年，1992年便实现了2.6%经济增长，成为中东欧地区最早实现经济恢复增长的国家。1994年，波兰成为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转型前水平的转型国家。波兰被称为“欧洲正在升起的明星”和“欧洲腾飞之鹰”。

进入2000年以后，波兰经济增长下滑。原因是劳动力的成本比90年代上升了两倍，另外政府开始限制经济自由化活动。因为政治家发现“设租”可以提高腐败收益，于是开始对不同的企业实行许可证制度，限制别人进入。

不过，虽然过去十年两次遭遇严重经济下行，但波兰经济始终保持正增长。在金融危机期间，波兰经济增长仍然达到4%，是欧盟国家里表现最好的。

马国川：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波兰经济继续增长的奥秘是什么？

萨多夫斯基：第一，波兰还没有加入欧元区，不使用欧元反而成为一个“防火墙”。第二，波兰的中小型企业比较强、比较多，它们现在已经进入欧盟市场。虽然波兰没有西门子之类的大型企业，但是

中小型企业很有竞争力，而且富有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从而帮助波兰平静地渡过了金融危机。

马国川：和波兰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同，中国政府出资四万亿进行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美国则由政府出资“拯救”银行。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您怎么评价这些“救市”的做法？

萨多夫斯基：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非常喜欢花老百姓的钱，因为政府自己不会创造财富，政府的钱都来自纳税人。不客气地说，是从纳税人那里“偷”来的。

无论是美洲国家的政府、欧洲国家的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如果它们以后和现在一样浪费老百姓的钱，那么它们不会增加任何财富。

我们已经看到，历史上任何没有节制地浪费纳税人金钱的政府，最后只有唯一的选择——下台。当然，我并不认为现在美国或中国政府面临下台的危险，但是这种做法肯定将影响老百姓的富有度。

自由越多，腐败越少

马国川：在您看来，波兰的转型是否已经完成？未来波兰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萨多夫斯基：波兰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转型，建立了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但这并不是说，波兰不再面临其他挑战了。总体的目标是维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使波兰可以继续追赶进程，最终使波兰与那些富裕的西欧邻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大大缩小。我们还应当对控制本国国内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投以很大的关注。

马国川：波兰的转型比较平稳，没有发生什么暴力事件，与一些其他中东欧国家相比，例如罗马尼亚，就有明显不同。原因是什么?

萨多夫斯基：不论在政府方面还是反对派方面，双方的精英都感觉到，如果波兰的体制运行不是那么良好的话，就必须做出改变。1989年，他们召开了所谓的“圆桌会谈”，所以波兰的转型方式其实是旧势力和新势力之间达成一致的结果。我认为，对于波兰而言，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马国川：您前面提到，如果波兰在1982年就实行经济自由化，那么共产党执政可能会延续到今天。从中国的经验看，这种假设似乎并非没有可能。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非常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很稳固，甚至有人把它总结为“中国模式”。您对这种“中国模式”有什么看法?

萨多夫斯基：如果共产党允许经济自由化，允许每一个人都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而发财，不需要经过共产党的许可就能够完全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那么共产党政府的执政地位也是可持续的。因为一个集权政府和一个自由化市场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马国川：可以结合吗?

萨多夫斯基：完全可以，但条件是这种集权政府不干涉经济领域。

马国川：但是事实证明，一个集权政府很难不干涉经济活动。相反，它在腐败利益的驱动下往往有干涉经济的冲动。从世界来看，腐败蔓延是集权国家的普遍现象。因此有经济学家说，在政治不民主的情况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能维持的，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萨多夫斯基：如果集权政府不腐败的话，即使政治不民主也没问题。腐败必然限制经济自由，反过来说，没有经济自由马上就会产生腐败。

马国川：历史证明，集权体制下腐败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萨多夫斯基：每个国家都有希望。一个不民主但是保证经济自由的政府，也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公民进行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那就将产生腐败。有一位经济学家说，腐败是改革的开始，改革又是革命的开始。腐败引起改革，改革引起革命。

马国川：那么改革和革命的区别是什么？

萨多夫斯基：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对改革的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如果失去控制就会爆发革命，执政者下台。东欧转型就是一场革命。

马国川：如果放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来看，中国是一个特例，它的改革没有引起崩溃。这是不是证明，“中国模式”是可以持续的，不会引起革命？

萨多夫斯基：我曾经访问过中国，和一些官员有过接触和交流。我觉得，中国引起变革的可能不是腐败，而是一些富裕地区寻求独立的倾向。

波兰的腐败情况现在比较严重，甚至有些非洲国家比我们好，特别是那些非洲国家进行改革之后，成功控制住了腐败。所以我觉得，如果非洲能够做得到，中国也可以做得到。

马国川：在您看来，只要放开限制，就会减少腐败。那在波兰的转型中，腐败情况有多么严重？是不是现在要比原来公平得多？

萨多夫斯基：确实，自由市场是最好的“防腐剂”。自由越多，腐败越少。

根据国际组织的调查，20世纪90年代腐败程度最低的是中国香港，波兰排第几十位。后来，波兰完善市场经济，学习其他国家成功防止腐败的手段与方法，现在的腐败比以前少多了。例如，波兰学习美国制定了《信息透明法》，靠这部法律，所有波兰公民随时可以知道政府怎么用钱，用于什么样的项目，这对于防治腐败特别有效。所以每次新政府都努力想要取消这一条法律，但都失败了。

亚当·斯密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告诉政府：必须保证经济自由。如果公民的富有来源于努力工作，社会可以接受；如果公民的财富是通过个人和政府的好关系得来的，就会形成社会不公，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

---

1. 保罗·A.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M].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 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第三篇
历史终结了吗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 yama），1952年生，日裔美籍学者，著名政治思想家。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等。

2012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进美国领事馆，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停职，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独子发生车祸身亡，这一系列事件引发极大的政治震荡，也让本已存在的社会思想交锋趋于激烈——几乎在每一次领导层换届之前，各种思想都会寻求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只不过在中共十八大前夕所发生的思想交锋空前激烈。

当时的社会思潮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中国要重启改革议程，全面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走向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现代国家；另一种认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枝独秀，以政府强力控制经济和社会为特征的“中国模式”非常成功，不需要再改革了，反而应该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中国模式论”拉来各种人士为自己辩护，其中就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国内一些媒体宣扬说，福山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同“中国模式”。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抓住福山来北京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的机会，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

2012年10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的大堂荡漾着轻柔的音乐，咖啡厅里散坐着稀疏的客人。窗外天高云淡，正是一年中北京最美好的季节。身为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的福山先生细细讲述自己的观点，偶尔品味一下手中的咖啡。

福山身材不高，头发稀疏，穿着随意。这位日裔美籍学者的眼睛很锐利，就像要洞穿未来一样。他早年师从美国当代政治学大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博士学位。

1989年夏天，正在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小组工作的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宣称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自由民主的主要替代方案自我耗弱”，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标志着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终结，并且成为人类政府的终极形式(注)。几个月后柏林墙轰然倒塌，似乎印证了福山的论断。37岁的福山由此声誉鹊起，成为当代最重要、也是备受争议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撰写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一书，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曾连续登上各类畅销书排行榜,被先后译为20余国文字发行。

2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福山仍然坚信原来的观点，“任何现代化的国家都需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这仍然是唯一的、能够带来稳定的、良好的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制度”，“如果说我的观点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我更清晰地了解到，创造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过程有多么艰难”。

不过，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福山并没有停止对政治制度的思考。他继承导师亨廷顿的问题意识，撰写了厚达600页的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探究政治制度的演变。他梳理了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提出良好的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标志：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民主）(注)。福山以这三个标志衡量中国，认为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是中国的优势，但是法治、负责制政府（民主）付之阙如，却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大缺失。

福山显然对中国有深入研究，他说：“如果有‘坏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很容易导致灾难。这仍是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仅此一句

话，就足以说明他确实是一位有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

福山：历史终结了吗

采访时间：2012年10月16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

我仍然坚信原来的观点

马国川：1989年您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发达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2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的观点是否发生了改变?

福山：“历史的终结论”说的是历史具有某种方向，指的是现代化的路径。我在1989年的简单观察是，自由民主制度才是历史的终结。

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任何现代化的国家都需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这仍然是唯一的、能够带来稳定的、良好的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仍然坚信原来的观点。

马国川：“冷战”结束后，您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取得胜利。但是也有许多人士一直在争论说，历史还有其他的选择。

福山：我看不出历史有其他的选择。柏林墙倒塌后，自由民主制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政府形式，获得快速的蔓延。时至今日，这仍是事实。2010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值得关注，它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

事件，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意走向。以前，普遍的看法是阿拉伯人对政治冷漠。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阿拉伯人民限制威权政府权力的意志。

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话说，“在世界舆论的大气候中，民主制已获得被视作基本正确的地位。”没有一家重要的国际机构，将民主制以外的任何东西认作是公平合理的统治形式。现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威望，以致今日的威权政客，为了合法也必须上演选举，宁可躲在幕后操纵媒体。事实上，不但极权主义从地球上消失，连威权政治家也往往称颂民主制。

马国川：可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数人希望其政府既负责又有效，民众需要的服务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但没几个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两点，因为很多国家的制度衰弱、腐败、缺乏能力，甚至几乎不存在。因此有些人对民主传播的失败感到失望，认为民主遭到了失败。

福山：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说是在执行中。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不管是南非和韩国的，还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政权更替”，使威权政府蜕变成民主制。可是如果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制度，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例如，“阿拉伯之春”的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独裁者被推翻了，可是真正的民主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党、法治和对军队的控制都没有完全建立好。没有制度，社会便无从治理，而建造制度又必然需要令人厌烦的妥协。

马国川：在您看来，自由民主制度仍然是唯一的道路。20多年后的今天，您的观点难道没有任何改变吗?

福山： 没有改变。但必须明白，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模式。从斯堪的纳维亚到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

如果说我的观点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我更清晰地了解到，创造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过程有多么艰难。事实上，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过于薄弱，甚至最终失败。

现代政治制度的三大组成部分

马国川： 当今世界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仍然面临着如何构建一个稳定、良好的政治秩序的问题。

福山： 其实，我的恩师塞缪尔·亨廷顿的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面对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推动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该书成书于1968年，时间距离非殖民浪潮席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仅10年左右，很多结论反映了那一时期政变和内战所带来的极端不稳定。

自该书出版以来已发生很多重大变化，像东亚的经济奇迹、全球共产主义的衰退、全球化的加速，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阿拉伯之春”，等等。现代政治秩序在不少发展中地区取得成功，在另外很多地方尚未到位。

马国川： 良好的现代政治秩序需要哪些条件？或者说，一个国家怎样才能避免陷于混乱？

福山： 这就是我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现代政治制度由三大部分组成：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首先，一个有着良好运作

的社会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国家一定要像一个国家，它需要利用其权力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安全，维持和平与正常的社会秩序，并向国民提供服务。其次，这种权力需要在一定限度之内使用，国家要通过法律来治理，法律要高于统治者，高于权力，用法律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这就是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最后，政府是一个负责的政府，要承担治理社会的责任。

马国川：负责制政府就是民主制度吗?

福山：在历史上，负责制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例如道德负责制在威权社会仍有现实意义。不过，一个现代责任政府就是民主制度，政府愿意屈服于限制其随心所欲的机制。宪法规定的程序允许国家的公民通过选举，将渎职、无能或滥权的政府更换掉。今天，负责制的主要形式是选举，其中最好的是成人普选的多党选举。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拥有全部三条的西方社会，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能取得这种平衡，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外，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

马国川：问题在于，这三种制度如何才能产生?

福山：这些制度的首次出现是因为民众发现，可借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自利，如何与人合作?都取决于使政治取得合法性的思想。因此自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斗争过程既漫长又痛苦。那些异常贫穷和混乱的国家，可以指望在短期内建立起复杂制度吗?这显得有点不靠

谱，要知道，那些制度的进化花费了多长时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制度进化是偶然的，例如欧洲议会制度的产生。另外，政治退化也是有可能的，这意味着已经建立的政治制度会终止，从民主制度倒退到其他的制度。

马国川：很多人认为，一旦建立民主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为什么会发生政治退化呢？

福山：自由民主制不仅仅是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它由一套复杂制度所组成，通过法律和制衡制度来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行使。很多国家虽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却在系统性地取消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对法律发起系统性的侵蚀。还有一些国家，看似走出威权政府，却又陷入既非完全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的“灰色地带”，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因为这些国家的很多精英阶层无意建立削弱自身权力的民主制度。富裕和有权势的人通过政治体系保护他们自己，因此，他们的权势逐渐增加。当势力到达很大的程度之时，他们就会掌控政治制度，使政治体系不稳定，因为这个政治体系不再反映多数人口的真实情况，这种情况在君主制度或现代民主制度下都会发生。

金融危机不会威胁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

马国川：根据您的定义，从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三个维度来衡量，美国的政治制度运行绩效如何？

福山：美国制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集中的政治力量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构成了朝不虑夕的危险。因此，美国宪法设有广泛的相互制衡，使政府的某些部门得以防范其他部门的暴政。迄今为止，这个制度表现良好。因为在历史关键时刻，当强大政府不可或缺时，其政治领导最终能达成共识，取得胜利。但是，目前美国可能正面临其适应

能力的重大挑战。因为没有机制上的保障能够确保美国制度既防范暴政，又在必要时按照初衷来顺利行使国家权威。后者取决于在政治目的上达成社会共识，这恰是最近几年来美国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美国现在面对一系列巨大挑战，大部分与其长期财政困境有关。过去一代，美国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没有缴纳足够的税款。宽松的信贷以及家庭和政府的超支，无疑是雪上加霜。长期的财政亏空和对外负债，威胁到美国在世人眼中的国力根基。其他国家如中国的地位则获得相对拔高。

马国川：宽松的信贷导致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又诱发了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带来很大的冲击。有些人士据此认为，欧美的自由民主制受到了挑战。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福山：我不觉得世界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美国和英国发源的更为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我认为这种变迁和传播走得有些远了。例如，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放松，使得政府失去对银行的监管能力，金融业很不稳定。

从2008年开始，金融市场失去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因次贷危机而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使中产阶级找工作困难，收入降低。我们今天发现，金融业开始往回走，倾向于国家政权的监管。发生这样的周期性事情是很经常的：从过度放松的监管，到周期性的金融泡沫，再到泡沫的崩盘。这是市场经济的本性。总之，我认为，这次危机不会改变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的制度架构，也不会威胁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

马国川：金融危机还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它对于美国有何影响?

福山：“占领华尔街运动”影响非常小，是由一群不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左派”年轻人搞起来的事件。他们确实成功地引起人们关注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危害、痛苦和不平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他们并没有创建有力的大众运动，也没能改变大公司的行为。

自里根时代以来，美国就是以保守主义作为主流。由于金融危机和不平等的加剧，现在这种共识已经被打破了。美国左右各方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解决技术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另外，在美国，还没有问题已经严重到不能通过政策调整进行修复的程度。例如，预算赤字问题花上10年时间是能解决的，但这需要一种政治机制让各方都达成一致。遗憾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机制。奥巴马上台时，很多人对他抱有极大期望，希望他以务实的方法团结人民，提出可行有效的政策，但是人们所期望的没有发生。

换句话说，目前美国还处在一个困惑的阶段，不清楚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对于什么是最佳政策还有很多分立不同的看法。

民主不仅仅是西方创造的

马国川：如果说美国的国家能力建设有问题，那么中国的国家能力却很强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和政府的决策能力都很强。例如，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的出手就非常迅速，赢得了许多赞扬。

福山：从秦朝开始，中国人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发明了一套非人格化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中国人口比例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也远远超过罗马。

马国川：这是否表示中国优越于其他社会呢?

福山：不是。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由于它防止公民社会的产生，宗教组织、贵族、商人阶层等都没有对强大的国家政权形成挑战，所以强大的国家存在了两千多年。但这并不表示其优越于其他社会，因为在强大的国家制度之外没有法治体系，也没有明显的政府问责的体系，国家政权容易败坏。在不同王朝的间歇期间，内部的衰败往往导致政权崩溃。

在汉朝后期，中国就出现了长期的混乱，因为国家已经被强大的家族门阀所绑架，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运行了。中国历史中有许多这样的周期，开始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然后政权逐渐衰败，又建立一个强大政权，再次衰败，周而复始。

马国川：中国的王朝更替频繁，汉朝之后就很少有朝代超过300年了，短命的仅有几十年。

福山：所以，中国的历史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没有法治或负责制的情况下，良好统治能否长久？如果遇上坚强能干的皇帝，该制度卓有成效，雷厉风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不幸碰上变化无常或庸碌无能的君主，他们大权独揽，经常破坏行政制度的效率。武则天清洗官僚机构，安插不合格的追随者；明太祖废除丞相制，让继任者束缚于这一困境；明神宗完全不理政事，导致政府瘫痪。这就是中国的“坏皇帝”问题。

马国川：诚如您所说，中国王朝的重大“遗产”是高品质的威权政府。过去的30多年中，在强大政府的主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是否说明，威权主义政府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福山：民主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特别的联系。19世纪的德国并不是民主国家，但经济增长很快，日本同样如此。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在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经济增长也很快。事实上，由威权政府来统治也有一些优势，因为他们不需要理会工会，也不必直接面对反对资本化的内部反对派，所以可以压低工人工资、吸引外资。真正的问题是，社会变得富裕了，民主是否成为必须的事情？民众富裕是否必然要求政治参与？

马国川：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是否必然逐步改变传统的政治制度？威权国家能否顺利过度到现代民主国家？

福山：实践中比较难，因为威权政体担心它所不能控制的政治权力。市场经济中，国家无法控制一切，社会中有许多私人和民间的利益。当然，一些威权政体也可能会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自由，不过总体来看，威权政府希望控制经济的意愿比民主政体强烈得多。

马国川：有些学者坚持认为，民主是西方的东西，并非普世的，在其他国家未必适用。

福山：历史上民主确实起源于西方。但是，民主在其他国家也存在过，因而不应该把民主看成西方特定的现象。民主满足了某种普世的向往。阿玛蒂亚·森把政治参与作为人类的一种手段之一。人类有自我治理的期望，希望政治上有能力参与。仅仅简单地接受其他人的权威，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完全的人类。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西方创造的，它适合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现代化的逻辑在其中，自我治理欲望增加让大众变得更加富有，从而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些民众对接受更有效率的威权政体也会变得更为不满。

“中国模式”能否长期持续下去

马国川：尽管中国面临一些挑战，可是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很稳定，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甚至有些人士总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您是否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如果存在，“中国模式”是否意味着已经出现了新的历史路径，可以成为东亚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替代性方案？

福山：肯定有一种被称为“中国模式”的概念。我个人感兴趣的是两点：第一，这种模式是否能出口（被他国复制）？第二，这种模式能否长期存在下去？我对此两方面均存疑虑。

首先，中国模式被他国复制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有悠久的官僚制度历史，而大多数其他社会没有这种传统，中国的官僚和教育传统其他国家也很难学到。在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的国家，它们会复制中国的一些制度，但是出了这个地域范围，就很难了。例如，印度没有官僚和中央集权的传统，非洲也没有这些传统。中国模式对他们的帮助不会太大。

其次，可持续性也很复杂。因为这一模式的成功基于中国的精英，基于他们如何继续现代化的进程。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很好的领导人，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制度保证这种“好领导人”的状况会延续下去。另外，中国现在的社会不平等在加剧，贫富差距比20年前大得多，我不认为中国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马国川：中国的法治与民主制度尽管还不完善，但是毕竟已经开始了。

福山：真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能够继续更新自己，保持现代社会的特性，同时又没有腐败丛生并被精英集团所控制。做到这点是困难的，因为挑战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内部挑战，精英必须重塑自身,不要被现有的政治力量所左右。

当代中国还有一个地方与传统中国不同，那就是由于资本和全球化经济所产生的社会流动，使中国产生了新的社会团体，例如商界精英、工厂工人、知识分子等，他们都有呼唤社会变革的强烈声音。这些团体在传统中国社会是缺乏的。这意味着国家政权之外出现了更多的力量。对中国来说，这是另一种挑战。

马国川：有经济学家预言，20年或3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这基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不会被重大的挑战所中断。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福山：挑战不少,其中经济挑战相当重要。中国正在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走向下一阶段的路途将会更为困难，因为这需要更大量的投资和教育投入。到目前为止，中国可以让更多的农民走进工厂成为农民工。但是，当代中国需要创新和制造更多的产业，这些都必须依靠高等教育。

领导人的机制化也非常重要。其中有许多的不稳定因素。由于缺乏宪法保障，领导人的交替经常会出现不稳定的因素。从长期来看，这将会是很不利的因素。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建立了许多规则，这些规则都是逐渐自下而上形成的。但是，当这些规则到了一定的层次，就不再有效，不再适用于更上层的行为。

有理由相信，政治负责制的社会将胜过没有政治负责制的社会，政治负责制为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和平途径。中国政治制度在王朝时期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坏皇帝”。英明领导下的威权制度，可能不时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为它可快速做出决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此制度取决于英明领袖的持续出现，一旦出现“坏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很容易导致灾难。这仍是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因为其负责制只朝上，不朝下。

附：求解“福山之问”

自从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在中国出版后，中国知识界自发组织了一些读书会，研讨福山的新著，“读福山，看中国”。2015年6月，我参加一个关于福山的读书会，写了这篇短文。

福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20多年前以“历史终结论”一举成名。

近年来，他关注中国发展，多次到访中国，与中国政界和学界广泛交流。前不久，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还专门与其交换观点。福山已经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国际学者之一，他对中国的评论受到了国内高度关注。在笔者看来，“福山之问”最值得思考。

2010年，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建立了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在福山看来，现代政治制度由三大构件组成：强大国家、法治、政治负责制。“强大国家”具有强大的行政能力，提供基本秩序；“法治”就是承认法律权威的至高无上，限制国家权力，保障民众权利；“政治负责制”就是统治者要对民众负责，民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福山认为，拥有强大国家、法治、政治负责制全部这三条的西方社会，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中国王朝的重大遗产是高品质的威权政府，然而法治和政治负责制付之阙如，至今依然如此。由此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最后一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境能否长久？没有法治或负责制，中国能否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

福山提出的问题，恰好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多年来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未来的各种预测，从“崩溃论”到“超越美国论”，都可以看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福山之问”。

面对“福山之问”，有两种答案，截然不同。

一种答案认为，只要有强大的国家（政府），中国就可以继续高速发展，法治和政治负责制都没有必要。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似乎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例证。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说，中国靠的就是“强势国家”的行政手段，强力干预和控制经济，才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他们据此总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鼓吹“中国模式”开辟了一条成功道路，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在他们看来，法治、政治负责制不足为道，甚至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曲解福山近年来发表的对中国的观点，声称福山也认同“中国模式”。然而，如果福山认同“中国模式”，就不会对中国未来发展提出疑问，也就不会有所谓的“福山之问”。事实上，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滑落，“中国模式论”已经日渐式微。

对“福山之问”的另一种回答则是，没有法治和政治负责制，中国很难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但是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尤其是2000年以来经济社会矛盾趋于激烈，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缺位。

由于法治缺位，行政权力肆无忌惮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寻租活动泛滥。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竞争优势。这种做法扭曲了市场经济规则，不但导致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不足，弱化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而且使得行政腐败日益严重，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现代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所以人们要求建立法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由于缺乏政治负责制，虽然一些官员把“为人民服务”和“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的地位上，以“国家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治下”的“百姓”做主。一些负责官员在一些关系大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还有一些不法官员不但不为选民和纳税人服务，还利用自己的权势恣意侵犯他们的利益。

对于建构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迫切性，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共识。实际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有两个重要命题，一个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另一个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就是要建立法治和政治负责制，塑造现代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显然，中国的领导层对中国的未来有清醒的认识，并没有沉迷于“中国模式论”的幻梦里。

福山不但关切中国的未来走向，对中国历史也有深刻的洞察。他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在王朝时期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坏皇帝’”，“英明领导下的威权制度，可能不时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为它可快速做出决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此制度取决于英明领袖的持续出现。如有‘坏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很容易导致灾难。这仍是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其负责制只朝上不朝下。”

这些话值得深思。东亚国家的实践证明，威权发展模式确实有效。不过，在当今世界，威权发展模式是特定国家在获得快速增长的关键历史时刻的工具，而不是最终的发展目标。作为权宜之计，它的价值只有几十年时间。就像宇宙飞船达到某个高度之后，会将第一级火箭推进器扔掉那样。

也就是说，威权发展模式本身就蕴含了转轨性质，就像日本经济学家渡边（Watanabe）所说：“威权体制如果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也

就埋下了自身解体的种子。”一旦经济完成起飞，威权发展模式就应该转向法治和政治负责制。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概无例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重塑合法性，才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奠定新的坚实基础注。

转型之路固然艰难，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中国坚定地推进法治和政治负责制，就能够在未来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最终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

1.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 吴敬琏，马国川. 重启改革议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1928年生，德国政治家，现任德国左翼党名誉主席。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位共产党总理，德国统一后曾担任德国国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

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一直感兴趣的是，那些亲身经历大转折的领导人是怎么看待那段历史的？2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心态是否已经平静下来，能够冷静地面对历史？

2012年9月中旬，汉斯·莫德罗来北京参加他的新书《我眼中的改革》中文版发布会。我两次见到了这位“东德”的最后一任总理。

第一次是在三联书店，一些中国学者与其座谈。我坐在莫德罗的斜对面，仔细打量这位84岁的老人。他面色红润，满头白发，目光柔和，认真地倾听学者们的发言，这与他在担任总理期间表情严肃、横眉立目的形象完全不同。

从纳粹冲锋队队员到苏联战俘，从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到最后一任总理，莫德罗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也正是动荡的20世纪的一个写照。尤其是在1989—1990年，他奔走在柏林和莫斯科之间，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东德”，但最终无力回天，无奈地在两德统一的协议上签字。

当代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在东欧）尽管表面屈从，却少有人真心信任这个体制，也无人对它保持忠诚，甚至连当政者也不例外。但是当最后群众终于不再被动，开始喊出他们不满的时候，当局显然大吃一惊……于是当出现民意难违的那一刹那，没有一个东欧政府下令开枪，各政权都自动悄然让出权力。”[注]

但是，在《我眼中的改革》一书里，莫德罗很少提到人民，对于强行修建柏林墙隔绝人民、动用一切手段窃听人民的无情做法也没有道歉。他认为是苏联抛弃了“东德”，才导致“东德”的消失。他对于两德统一的过程和统一后前“东德”地区的转轨过程批评甚多，他辩解说，“我和我的政府想要改造社会主义，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改变模样……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了，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取得胜利，而仅仅是保存下来。”注

在三联书店的座谈会上，莫德罗与中国学者之间似乎隔着一道鸿沟。中国学者历数中国改革面临的困难与挑战，莫德罗则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抱有极大期望，甚至认为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向衰亡。显然，他对中国的改革很羡慕。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东欧当年改革要实行的“市场社会主义”。

第二天晚上，我参加了中国朋友私人宴请莫德罗的活动，地点是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大院里的老故事餐厅。那是一家以怀旧为主题的餐厅，装修简朴，照片墙上都是以前拍的老电影，参加者大多数是白发老人，让人感觉恍若回到了过去。

当有人向他敬酒时，莫德罗就站起来，满面笑容。可是当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神情落寞，甚至有些忧伤。他是在追忆那些过去的岁月，还是在思考现实问题？他曾对记者说过，他怀念过去，“我们的回忆当然是在‘东德’的生活，要知道，这段记忆是没有办法抹掉的。”

莫德罗：亲历苏东剧变

采访时间：2012年9月20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美术馆东街三联书店

“东德”为何失败

马国川：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资深政治家，见证并参与了两德统一的全过程。但是，德国统一后留下来的只有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则不复存在。这是为什么呢?

莫德罗：1971年昂纳克取代了乌布利希，改变了原来发展经济的政策，把重点放在居民的消费上。结果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而福利增长过快的现象。当时外界认为，只消费，不积累，这会毁了国家的前途。如果说乌布利希年代的经济机制是积累，那么昂纳克时期就是消费。这样一来，不仅经济活动失去了自由，而且政治活动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开始盛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依靠西方几十亿的外债勉强维持国家的经济。这种状况不是阶级敌人（尽管阶级敌人一直在给我们的生存制造困难）造成的，而主要是一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治理念造成的。1985年戈尔巴乔夫登上政治舞台，便使我产生了也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改革的希望。但是昂纳克反对一切改革方案。他认为，“东德”的社会主义近乎完善。

到1989年形势已经非常严重，昂纳克下台，我当了四个多月的总理。当时，大多数先前主张对国家进行社会改造的人已经无能为力。1989年11月，13万人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90年1月，每天约有2000人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西方的压力以外，我们这些负责管理国家的人也有过错。我们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迫于形势，工作中的被动应付多于主动出击。由于局势混乱，我们在莫斯科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改革

问题的人。苏联和“东德”的经济合作降到了冰点，“东德”几乎得不到必需的原料，特别是原油。在我们民主社会主义党选举失利以后，新的政府完全按照西边的方案行事，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地全盘接受了联邦德国的统一方案。

马国川：您说“在莫斯科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改革问题的人”，在您看来，苏联要对“东德”的消失承担重要责任？或者按照某些人士的说法，是苏联出卖了“东德”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莫德罗：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被莫斯科叛变或者出卖的，虽然苏联确实没有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些国家，但是不能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咎于莫斯科。

确实，苏联使我们大家先天不足，天生得了“幼稚病”，后天又接受了军营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缺少民主文化、没有自由、无权自由地出国旅游和选择居住地、封建家长式作风、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这些不好的风气都是苏联传染给每一个所谓的盟友的。

但是，我们自身应负的责任就减轻了吗？我们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内没有起来抗争，也没有及时反躬自问：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都是一种进步吗？我们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自己服务？我们是在不懈追求1784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还是用党机关专政取代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我们还有资格自认为是社会解放的先锋战士吗？或者仅仅是社会的管理者？我们是为掌权而掌权，或是行使权力为所有人谋福利吗？

所有这些问题，也许我们都提出过，然而，仅在私下里、在小圈子里悄悄议论过，相反，在可能引起集体反思和集体行动的时刻，我们都噤若寒蝉，闭上了嘴。结果，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精力耗尽，走到了尽头，它撞上了它为自己设下的底线，它没有能力突破它，一旦当它试图突破这条底线时，便走向了沦亡。

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结果

马国川：在“东德”消亡后的第二年，苏联也解体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否应该以这种方式结束?

莫德罗：这也是我多年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斯大林时期持续了将近30年。一方面，斯大林歪曲社会主义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许多人死在社会主义大型建筑工地上，劳动营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又发展和继承了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天生的不足。例如，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却丧失了民主这个核心，导致管理上的独裁和专制主义，从而产生个人崇拜。

1918年罗莎·卢森堡就警告说，要防止党的机关变成未来的专政机关。这种担忧变成了现实。斯大林按照自己的模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不管这种专政是苏联模式，还是德国模式、波兰模式、捷克模式、匈牙利模式、罗马尼亚模式或者保加利亚模式，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社会主义如果真要做到名副其实，就应该按照另外的方式建立。

马国川：在一些人士看来，如果进行改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完善的。事实上，苏联历史上也不乏改革契机。

莫德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进行了批判，但半途而废、表面化，没有深究斯大林犯错误的政治根源，更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深刻根源，因此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党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

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是旧体制里产生的人物，他执掌党和国家权力时，苏联社会、苏联共产党、现存的组织机构和经济生活都陷入停

顿。一切社会决议（包括经济管理）由中央集权，生活完全官僚主义化，公民实际上像农奴一样受到监控，党和国家领导人像在封建社会一样受到顶礼膜拜。生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灰色经济到处泛滥，其后果是出现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党政领导中的特权阶层毫无顾忌地利用这种权势，侵吞人民的劳动成果，司法部门对此熟视无睹，或者参与掠夺国家的财富。

我们曾经确实希望1985年是改变航向的时候，认为对社会主义进行彻底变革的时刻终于到来。那一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面临二者择一的尴尬境地：要么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同西方进行较量，要么告别莫斯科的传统思维，摆脱教条主义和陈腐观念的束缚，倡导新的思维。他选择了后者，他的新思维就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危机做出的反应。但是戈尔巴乔夫不会管理国家，无法控制国内的政局。现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他开始采取过去惯用的手法，绕开矛盾走，实行妥协。结果，越往前走，越迷失方向。苏联出现的这种危机已经具有结构性的原因，它的根源在于自列宁以来，这种经济和社会的特点就是高度中央集权、军事化和自我孤立。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结果。

马国川：有人断言，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想断送社会主义，他是一个“叛徒”。

莫德罗：戈尔巴乔夫并非另有图谋，尽管后来他说了一些相反的话。那时他信奉列宁、“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理论。我认真阅读了1985年春季至1988年夏季改革早期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苏共中央的决议，我觉得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他的顾问班子，追求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更新，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和发展。

在我看来，谁要想坚持社会主义，谁就应该变革社会主义。如果你想使社会主义一成不变，那你就是在消灭社会主义。我们这些当时

的改革家们这样理解改革的内含：改革不仅要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正错误，而且还要进行根本的变革——让房间明亮起来，向世界敞开窗口。这是一场革命中的革命。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被证明不能使社会主义有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而戈尔巴乔夫则证明他自己没有能力来应对现实变革的巨大挑战。改革的失败直接打开了通向原始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一股脑儿把责任推给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是不公正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源是在1917年以前。列宁曾极有远见地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比较容易，因为它的敌人已经土崩瓦解，资产阶级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使事业持续下去，就需要百倍的谨慎小心和始终不渝。

应该反思什么

马国川：苏联消亡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在您看来，其中有哪些历史教训值得研究?

莫德罗：第一，苏联未能建立社会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新模式。苏联经济和财产关系的结构经历了许多阶段，最后把经济工作推向了极端：高度集中的计划和领导、官僚化、取消经济合同和只允许两种所有制存在——国家所有制和合作所有制。结果造成经济停滞，人民生活艰难，民怨沸腾。

第二，苏联的政治制度已经变形。党和国家高度官僚化、滥用权力、升官弄权、机会主义破坏了民主的基础和工作中的公正性。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许多错误，但是斯大林主义的根子未被拔除。

第三，苏联的崩溃使得人们对每一项政策都疑窦丛生，使世代相传的种种价值观化为乌有。社会主义思想威信扫地。

马国川：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1917年的俄国和世界都还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十月革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莫德罗：重新对历史问题展开辩论无可厚非，但这种观点纯粹是经院式的。当群众奋起反对暴君，反对不人道的制度时，他们并没有向历史求证：是不是已经到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了？他们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要使自己摆脱贫困。1917—1918年，俄国的工人、被剥夺权利的人、被流放的和受奴役的人正是这样做的。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只是向他们指出了斗争方向和表达不满的形式。

马国川：将近100年的历史说明，“十月革命”确实带来了诸多问题。站在今天的角度，您觉得应该反思什么?

莫德罗：我们这些出生较晚的革命追随者应当自责的是，我们不加分析地相信“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合法合理的，列宁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红色恐怖”只是用来回击“白色恐怖”，等等。

我们的世界观植根于一种信念：我们永远有理，真理和进步在我们这一边。这使得我们以傲慢和怀疑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想法的所谓的“对手”，将那些善于思考、往往不过是思路不同的人打入另册。我们不应把世界想象成一个橱柜，把别的国家、政党和个人分门别类放进不同的抽屉里。

苏共二十大清算斯大林的错误，这对我来说犹如当头一棒。然而，当时我认为，斯大林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蜕化物，而非社会主义本身，斯大林本人攫取并滥用了权力，但他是独行其是的个别人物，并无普遍性。我们不曾问过，是不是每一个总书记都不会重蹈斯

大林的覆辙？我们也不曾问过，哪儿有对独裁者实施监督和管理的民主机制？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

我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信仰

马国川：在经历了历史的巨变以后，您是否仍然信仰社会主义？

莫德罗：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没有表明是历史的终结，我也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谁也不想再搞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面对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我坚信，如果人类想有未来，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唯一的前途。

马国川：您至今仍然是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名誉主席，这个党的宗旨是什么？

莫德罗：我们党的党章写道："民主社会主义党是德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它从事政治活动的目标和行动。"党纲规定："民主社会主义党作为社会主义的政党，向人民中间这样一些力量敞开大门，这些力量主张建立一个社会公正和人们亲密无间的社会。它特别重视工人和所有其他劳动者。它不追求垄断权力。它同精神上的排斥异己、妄自尊大、传教士式的布道宣传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格格不入。我们反对垄断真理。"这些主张今天仍然有效。

马国川：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曾经总结道，苏联消亡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的三个垄断：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利益和垄断真理。

莫德罗：垄断必然导致腐败和滥权，所以我们反对垄断，尤其反对垄断思想。罗莎·卢森堡认为，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也应享有自由。而卡尔·马克思认为，个人自由是社会自由的前提。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观是自由、正义和团结。

追求公正和社会主义社会是我们始终不渝的目标。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取得胜利，而仅仅是保存下来。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的紧张程度日益加剧，局部战争接连不断，大自然和人受到无情的掠夺和剥削，社会和国家间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还有核战争的威胁和自我毁灭。被认为是“左派”的政治力量已被唤醒，这种力量不仅批评现状，而且正在为未来探寻可行的方案，正在争取社会上和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支持。狂妄的资本主义正统治全球——作为例外，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古巴和朝鲜正在为生存而斗争，我们有理由和他们保持团结。

马国川：苏联解体20多年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很活跃，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有些左翼政党甚至成为执政党。这是否说明，欧洲又开始向左转呢?

莫德罗：如果说在今天的国家杜马或者别国的议会中形成了一些左翼党团，这只是表明议会中出现了新的气象，但是，要据此恢复已被废掉的体制，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新思维今天成为拉美国家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无论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还是其他一些拉美国家，情况都是如此。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机，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替代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随着苏联的垮台而失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回答不了这个问题。20世纪那样的革命，也不会重新出现。但是，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内外发生的变化，已被提到日程上来。

当今世界的变化，昨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要求人们进行独立思考。要把民主和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与此同时，还要开始重新评判财产问题、生产方式方法问题、生活方式方法问题，以及贫富之间的对立等问题，并为社会发展进程寻找新的途径。

莫德罗的思想历程

汉斯·莫德罗颇感吃惊，在苏共中央的大厦里，苏共中央书记瓦连京·法林竟然以讥讽的口吻议论党的总书记说："戈尔巴乔夫选择干部十次有九次出错，而且这第十次能选对一次就是好的。"

更让莫德罗意外的是，一个小时之后，党中央大厦就被关闭了。就在双方谈话的这一天，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建议解散该党。这是苏共中央大厦最后一次接待一位外国客人。

"事先我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次会见和谈话。事情就是这么偶然——一个德国同志竟然在苏共灭亡前一个小时到了苏共党中央大厦"，多年以后，莫德罗回忆起在苏共中央大厦的一幕时，仍然感慨万千。

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84岁的莫德罗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场面，也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再也不要法西斯，再也不要战争"

莫德罗1928年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的战斗，被俘后在苏联的战俘营度过了四年劳役生活。

回到德国后，莫德罗在亨尼希斯多夫市一家工厂当钳工，并加入德国共产党——统一社会党。莫德罗回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那一代人有两个主要目标：再也不要法西斯，再也不要战争。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

1949年10月7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四个月后，苏联在占领的德国东部领土上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从此正式分裂为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959年10月，已经是民主德国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莫德罗第一次访问中国，认识了担任中国共青团总书记的胡耀邦，“中国是非常远的国度，但是对我们的心来说很近。”

两年后一个沉闷的夏夜，柏林市区突然出现了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从此“东德”公民再也不能轻松到“西德”旅行或移民，许多家庭被拆散，其中包括莫德罗，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生活在“西德”。

莫德罗担任了柏林市克佩尼克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来升任柏林地区党委书记，其间他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20世纪60年代，“东德”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是瓦尔特·乌布利希，“后斯大林主义”的一位著名代表人物。莫德罗称赞乌布利希“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他政治家不同，他更加懂得这种辩证法，曾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乌布利希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经济改革，以促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世界经济保持联系，而不要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1971年，乌布利希被撵下台，建造柏林围墙的决策和组织者昂纳克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从此开始了长达18年的统治。这背后是苏联在指使。诚如莫德罗所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与苏联的事态发展密不可分。从一定程度上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东方领导集团的养子。”

43岁的莫德罗被提拔为统一社会党中央联络部部长，两年后又被委以重任，担任了德累斯顿区委第一书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前，德累斯顿就已经是德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在“东德”时期，它仍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业中心。

在昂纳克时代，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开始盛行。“领袖的画像，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都像圣像画一样被到处张贴和悬挂。共产党员的希望、追求和理想都寄托在党的领导人身上，特别是寄托在领袖的个人身上。宣传机器花大量时间和篇幅在宣扬领袖”，莫德罗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党的主席或者总书记成了党的集体智慧的化身，他的任何一次讲话和任何一种思想都被视为是正确的……如果他把党凌驾于一切之上，那他就是好样的，不会犯错误。因为我们的领导人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所以罢免他也就没有按照民主的程序。他要么死在工作岗位上，要么被推翻。”

作为“东德”共产党领导核心中的一员，莫德罗难道从来没有对此进行过反思吗？“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都是一种进步吗？我们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自己服务？……我们是为掌权而掌权，还是行使权力为所有人谋福利？”莫德罗承认，“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曾经提出过，然而，仅在私下里，在小圈子里悄悄议论过，相反，在可能引起集体反思和集体行动的时刻，我们都噤若寒蝉，闭上了嘴。”

“被戏剧性地推举出来”

转折的时刻到来了。

在接连送走了三位治国的“病夫”之后，苏联终于迎来了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和此前领导人铁青冷酷的面孔相比，戈尔巴乔夫脸上充满笑容和愉悦，吸人眼球。他机智灵活，自由回答问题，逻辑清晰。这个清新的形象获得了国内外的好感。

莫德罗也非常看好新的苏联领导人。此时的“东德”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依靠西方几十亿的外债勉强维持国家的经济。莫德罗认为：“这种状况不是阶级敌人（尽管阶级敌人一直在给我们的生存制造困难）造成的，而主要是一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治理念造成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但是昂纳克认为“东德”的社会主义近乎完善，反对一切改革方案。如果提出改革的问题，那就等于在批评他的政策，就会被指责为目光短浅、爱发牢骚，结果是被整肃、处分，甚至被赶出国门，“这种‘民主集中制’能保障一个领导人凌驾于全党之上。”

也是在1985年，一个苏联克格勃来到德累斯顿，从事收集有关北约和美军部队的军事情报的间谍工作。作为德累斯顿区委第一书记，莫德罗从来没有会见过这个名叫普京的人——他半开玩笑地说：“他的上司经常找我，普京还没有资格找我呢。”

莫德罗密切关注苏联的改革。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一堆新词：新思维、更多民主就是更多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建立欧洲大厦、公开性，等等。因“公开性”而带来的一些言论让已有30多年党龄的莫德罗感到不安，不过他自我安慰：“当打开拦河坝的闸门放水时，同水一起流出来的还有漂浮在脏水面上的垃圾。等到水面平静下来，一切脏东西都会重新沉到水底。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当然知道任何一个坏消息都会伤害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坚信，只有事实本身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是完全对的。如果我们的大厦建立在撒谎的基础之上，那它是不会牢固的。”

莫德罗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打开了苏联堤坝的闸门，我们中了邪似的看着他施展魔法。我们立即想到，在‘东德’也会发生变革，因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积累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此时匈牙利、波兰已经走上了改革道路，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的农村改革也初见成效。但是在最高统治者昂纳克看来，“东德”不需要进行任何改革。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能改变现状。凡是和改革和公开性有关的事物，昂纳克一概拒绝。

莫德罗表示坚定地支持苏联的改革，他年轻开明的形象赢得了媒体的赞赏，一些西方媒体把莫德罗称为“希望之星”和“未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戈尔巴乔夫”。苏联高层官员也暗示，希望看到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发生变化。1987年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离任前夕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在回答“戈尔巴乔夫希望谁是昂纳克的接班人”时，提到了莫德罗的名字。

昂纳克开始警惕起来。他向德累斯顿派来一个监察小组，目的就是找出理由把莫德罗拿掉。监察小组的报告称：“谁想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改革，谁就是想使国家回到1948年的状况，因为苏联如今主要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果而使国家处于1948年的水平。”

其实，此时“东德”的情况同样危如累卵。1989年初到8月，由于匈牙利开放了它同奥地利的边界，4.3万“东德”居民绕道匈牙利逃往“西德”。全国各地连续爆发游行示威。10月18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九次全会上，77岁的昂纳克被解除总书记的职务。

克伦茨作为昂纳克的接班人飞往莫斯科。他提醒戈尔巴乔夫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的孩子，这种父子关系必须得到承认”。但是戈尔巴乔夫已经自顾不暇。

数天后，柏林举行了游行示威，参加者达50万人。“东德”中央第十次会议选出了新的政治局，莫德罗当选为新的政治局委员。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向华盛顿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信号，表明事态正朝着“进行实际改革的方向发展，主要支点是莫德罗被戏剧性地推举出来了……”

“我们正是在这里被击败了”

1989年11月9日，存在了18年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一天时间，竟有40万“东德”人涌入“西德”。

在莫德罗看来，“我们正是在这里被击败了。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多年来未能体察人们的情绪，使他们对事物失去了政治直觉，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利用这样一种历史机遇。具有指标意义的一个事实是，此后几天，没有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柏林墙前露面，而另一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有当政的政治家却都陆续走过这里。”

在柏林墙倒塌的第四天，莫德罗被“东德”人民议院选为总理。他临危受命，组建政府。此时，“东德”的政治家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要求德国统一的巨大压力。莫德罗发表政府声明，坚决拒绝统一，“我信赖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愿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睦共处。”

莫德罗的构想是，分三阶段逐步实现德国统一，整个过程需要两三年时间。可是，历史进程在加速度发展。1989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同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并就该党奉行的政策向人民道歉。与此同时，各界联席“圆桌会议”做出决定：建立新宪法，彻底解散由秘密警察组成的国家安全系统；并于第二年五月实行政治自由选举。

在德累斯顿，莫德罗第一次会晤了“西德”总理科尔，“会晤之后，潮水般的人群打着‘西德’国旗，在圣母大教堂前热烈欢迎科尔。人们如醉如痴，使劲鼓掌，异口同声地呼喊要求统一的口号……德累斯顿大教堂前的集会使我明白，我关于建立联邦的设想也已成了一张废纸。”

1990年1月，每天约有2000人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东德”的经济合作降到了冰点，“东德”几乎得不到必需的原料，特别是原油。莫德罗比喻说，“病入膏肓的苏联的孩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而莫斯科却开始割断他的生命线。”

“圆桌会议”决定，将人民议院选举提前到3月18日进行，组成“圆桌会议”的新的政党和组织都要向政府派出代表。这一步骤表明，过去的执政党彻底让出了统治地位。同时，所有具有社会影响的力量都承担起了社会责任。

莫德罗受命领导民族责任政府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直到3月18日“德国联盟”在人民议院选举中获胜，由“统一社会党”更名而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只获得16%的选票，莫德罗辞职，由此成为“东德”共产党的最后一任总理，共在职4个月零5天。

半年以后，1990年10月4日，德国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复存在。此时，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已遭枪决；哈维尔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苏联开始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成为总统……

历史尚未结束。1991年8月，在苏共中央的邀请下，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莫德罗到位于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度假，住处不远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别墅。在那里，莫德罗又见证了震惊世界的“8·19”政变。政变旋即失败，重返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共产党解散了。莫德罗成为苏共中央的最后一批客人。

莫德罗至今仍是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这个党现在仅有7万名党员，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近六成。莫德罗曾当选为德国联邦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继续进行政治活动。作为“东德”前领导人莫德罗也被起诉过，被判刑十个月监禁。

回顾苏东剧变的历史沧桑，莫德罗承认，“没有民主机制，正是我们的模式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他又认为，“社会主义的失败并没有表明是历史的终结。”他在中国看到了希望，因为“狂妄的资本主义正统治全球——作为例外，中国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

---

1.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M].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 汉斯·莫德罗.我眼中的改革[M].马细谱，余志和，赵雪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2.

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1942年生，智利政治家，1994—2000年任智利总统，2006—2008年3月任智利参议院参议长。

非常幸运，2014年春天我在北京对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进行了专访。在拉美政治转型中，他是一位非常关键的政治家。

40年前，除了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少数国家，其他拉美国家都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拉美的军事独裁统治制度开始向现代民主制度转型，1989年智利的皮诺切特正式向文人交权，标志着拉美的民主体制得以确立[注]。

弗雷既是智利民主转型的见证者，更是重要的推动者。在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统治结束之后，弗雷作为第二位民选总统，在任职的六年期间（1994—2000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得智利成功跻身世界高收入国家，成为第一个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注]。

采访是在弗雷先生下榻的一家酒店进行的，当时他受中国外交部邀请来华洽谈中智两国有关事宜。这位在整个拉美地区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家是一位表情非常严肃的人，国字型脸线条分明，两条浓眉，眼神坚毅，浓密的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颇有些电影里英雄人物的气质。

事实上，他的父亲蒙塔尔瓦（Eduardo Nicanor FreiMontalva，1964—1970年在职）确实是智利的英雄。他公开反对皮诺切特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恢复民主，结果1982年在一次常规手术中被毒杀。在首都圣地亚哥的大街上，树立着这位勇敢者的铜像。

采访进行的时间很长。70岁的弗雷先生温和谦逊，对每一个问题都认真回答。他讲的是西班牙语，他的助手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由一位朋友翻译成汉语。在两位翻译忙碌的过程中，我常常想，弗雷先生与他父亲之间横亘着长达17年的军事专制统治，他是怎么度过那些艰难而漫长的岁月的？智利为什么能够实现平稳、和平的民主转型？

耐人寻味的是，皮诺切特威权体制管理下的经济发展很成功，却在1989年的民主选举中意外落败。弗雷先生解释道："因为在那个阶段，老百姓需要的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有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换句话说，民心开始变了"，"皮诺切特的军事专制不是通过暴力被打垮的，而是通过民主选举被赶下台的"。

许多拉美国家政治转型之后，上台的民主派为了取悦民众和获得更多的政治选票，纷纷向国内民众做出较高的政治承诺和福利承诺。短期内人民获得一点虚幻的实惠，但很快被极高的通货膨胀税所冲销。高通货膨胀使政府下台，大量资本外逃，造成经济萧条。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又做出同样的政治承诺。这就形成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恶性交替。

2006年，时任中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在南美考察时发现，贫困增加和两极分化是拉美的两大病症，这两大问题的背后则是"政客们的民粹主义立场和态度"。后来他在《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里这样写道："一旦形成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要想摆脱恶性循环，需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注]

在拉美经济发展方阵中，智利却独树一帜。在弗雷卸任总统的第二年，也就是2011年，这个世界上领土最狭长的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这意味着智利成功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转型，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智利的经验对于正在转型中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弗雷：智利为什么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采访时间：2014年6月19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嘉里中心

智利的政治转型是非暴力的

马国川：从皮诺切特的军人独裁统治到民主政治，智利的政治转型非常和平、平稳，被认为是世界政治转型的典范。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您认为智利为什么能够实行和平的政治转型?

弗雷：智利之所以能够和平地实现政治转型，首先，因为皮诺切特的军人独裁统治不是通过暴力被打垮的，而是通过民主选举被赶下台的。

实际上，即使是在皮诺切特统治期间，智利的宪法里仍然规定人民有民主选举的权利，只是当时的专制政府没有真正实行过而已。后来反对党一再施加压力，要求举行宪法规定的选举，在政府里面也有一部分人士支持和呼吁。于是，在“军人政府”统治了16年之后，1989年智利举行了民主选举，人民抛弃了“军人政府”。所以，智利的政治转型是非暴力的。

其次，智利的民主转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在1980年，西半球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政府，而且它们都支持智利人民的民主要求。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阻止时代的潮流。

最后，被选民推上台的民主政府并没有全盘否定“军人政府”的一切政策。智利没有像很多国家那样全盘否定过去，而是保留了自由市

场制度等好的政策。民主政府不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而是希望把智利过去的历史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它的重点是把过去好的做法继承下来，使国家平稳转型，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

马国川： 皮诺切特曾经残酷镇压军政府的不同政见者，数千人遭到逮捕、监禁和拷打，失踪者多达3000多人。皮诺切特政府践踏人权的行径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那么在皮诺切特下台后，新上台的民选政府是如何处理历史问题的?

弗雷： 民选上台的新政府不但没有纠缠于和过去的专制政府算账，反而在实行新政策前还征求原来政府里一些部长们的意见，大家对于智利的发展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不管是执政党还是下野的反对派，大家完全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以自己的利益集团为重，一味否定过去。同时，智利先后成立了"全国真相和解委员会"和"全国恢复和解协进会"，将过去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实公诸于世，查清责任人，帕特西里奥·艾尔文总统向所有受害人家属公开道歉，并向他们提供补偿金。

作为第一任民选总统，艾尔文先生执政期间，首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让老百姓免除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恐惧。新政府尊重基本人权，把国家发展的方向告诉人民，以公正和事实来营造一种友善的环境，让智利整个国家的社会环境、人心、氛围都稳定下来。

马国川： 在智利历史上，皮诺切特是一位重要而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有残酷镇压民主派的一面，也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面。您如何评价皮诺切特这个的历史人物?

弗雷： 其实，皮诺切特统治时期也是分为几个阶段的，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1982年以前，皮诺切特实施了一些经济方面的

改革。但是在1982年遇到一次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皮诺切特没有做好应对。但是后来的经济转型做得很好。

马国川：既然智利的经济发展很成功，皮诺切特为什么会在1989年的民主选举中失败呢?

弗雷：因为在那个阶段，老百姓需要的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有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换句话说，民心开始变了。

智利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马国川：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说，他的弟子们没有在智利实行真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您看来，智利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和原本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有什么区别?

弗雷：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冷战”时期的产物，这是我的看法。在“冷战”时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是智利并没有被新自由主义所左右，而是按照智利自己的需要决定自己的发展策略和政策。

比如，1964年我父亲执政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建议放松金融管制政策，智利政府没有采纳，仍然实行原有的金融政策。到1994年我开始执政的时候，也有国际金融组织强力施压，要求智利开放金融体系，让外汇自由兑换，我们仍然没有采纳。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货币危机频发的时代，智利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管理资本流入的成功范例。

马国川：我理解，可能正是因为智利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所以弗里德曼说，他的智利弟子们没有真正实现他的新自由主义的政

策。

弗雷：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和当时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环境、需求和国情去制定自己的政策。当然，国际上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但是，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决策，其他国家也不应该强迫和干涉其他国家的发展决策。

马国川：智利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智利是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

弗雷：智利的国民收入并不像西班牙、葡萄牙那么高，它刚好达到OECD的标准，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智利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智利的发展政策有连续性，每一届政府都延续原来的方式，然后往前推进。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新总统来了，就把政策切断，重新开始。

智利一直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对国际市场开放。首先，把国家拉入国际舞台，想办法和国际舞台接轨。其次，将智利国内的市场开放给国际社会，借助国际的力量把整个智利的国民经济带动起来。因为智利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如果它自我封闭的话，就没有办法发展了。所以要通过对外开放，借助国际市场的优势和力量，帮助智利经济上一个台阶。即使是在军事专制统治期间，皮诺切特也是用这个方法发展经济。

不管是我执政期间，还是现任总统，我们都希望把智利的经济纳入国际市场，而中国是国际市场重要的一环。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来到中国的原因。

其实，智利的政治转型也是通过对外开放的方式来推动的。

马国川：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的收入之间是不平衡的。可能国家经济发展很好，但是普通公民分享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由于民众的收入跟不上去，整个国家经济最终因为消费不足而停滞下来，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智利在提高民众收入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弗雷：民选政府上台的时候，智利的贫富差距很大。民选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要解决人民的贫穷问题。1990年贫困线下的人口占整个智利人口的37%，现在已经下降到了11%。一个重要做法就是大量建设基础设施，利用政府的资源大力推动健康、教育、住房等公共建设和公共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是用它的资源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不是政府亲自来做，而是让给民间，交给私营企业来做。政府通过招标，让私营企业来投资建设，政府允许私营企业通过收费来收回他们的成本和获得应有的收益，就像中国允许私人资本投资建设高速公路一样。

为了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智利政府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一个是税收改革；另一个是教育改革。现在智利国内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就是要提高税收，“损有余而补不足”，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要通过教育改革，让更多的贫穷人群受到更好的教育。要特别关注低收入人群，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从而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

智利没有所谓的民粹主义

马国川：20世纪80年代，拉美爆发债务危机，许多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影响，为什么只有对智利的影响不大?

弗雷：1982年智利经济还是受到了很大冲击，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智利的经济增长速率在拉美都是最高的。

智利政府对外汇储备管理得非常好，预留了很多的空间，可以从容面对国际金融的一些重大变化。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智利都没有多大的影响。在我的任期内，偿还了智利所有的外债。那时候民间有很多人投诉，埋怨有钱不让自己国家来用，为什么要去还外债呢。

马国川：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

弗雷：不能说民粹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有多种，既有左翼的民粹主义，也有右翼的民粹主义，它们只是政府的一种风格。新政府上台后就推翻上一届政府的很多政策，下一届政府又推翻这一届政府的政策，一次次讨好老百姓，以为这样我才能上台。但是讨好的结果是使国家陷入了非常危险的经济状况。这就是现在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情况。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好，因为你迎合了这个群体，另外的群体会不高兴；迎合了其他群体，这个群体也不高兴，最后造成社会群体的对立甚至是社会撕裂。

虽然现在许多人把智利作为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成功样板，但是整个智利没有民粹主义，智利政府也没有这种想法和思想意识。

我不想具体评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比如古巴或委内瑞拉的选择。仅就智利而言，不管是上一任的政府还是现在的政府，都没有、也不会一味地迎合老百姓的要求。而有些国家为了迎合老百姓的要求，没有一个连续性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导致发展出现了挫折。智利没有出现这样的困境，每一届政府都坚持预算平衡原则，采用增加税

收而不是赤字开支的方式实施福利计划。每一届政府都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政策就是为了国家好，没有刻意地去迎合某一方面的群体。在这一点，智利老百姓是有福气的。

马国川：那些实行民粹主义的国家往往喜欢将资源抓在政府手里，自己进行资源配置。但是从皮诺切特时期开始，智利似乎一直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

弗雷：资源配置非常关键。每个国家是把资源放在政府，还是放在民间，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不同环境需要来决定。有些时候要把资源在政府这块儿多放点，有些时候要把资源在民间那块儿多放点，有时候两方面要平衡。最重要的是，政府和民间要融合，使得资源配置达到最佳效果，让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最终达到良性发展的目的。

马国川：怎么来评价中国的发展和改革现状？另外，目前中国和拉美的关系如何？

弗雷：虽然智利和中国是1970年才正式建立邦交的，其实1952年中国已经在智利成立了拉丁美洲的第一个文化交流中心。这说明，智利政府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有兴趣和中国建立起一些政治交往。智利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拉丁美洲国家、第一个支持中国加入WTO的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以及第一个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现在中国跟智利建立了一个战略伙伴的关系。我希望会加强两国之间在更高层次的一些合作，比如说在环保、国家发展、现代化等领域的合作，不单单是商业方面的。

---

1. 王缉思，唐士其.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2. 约翰·L.雷克特.智利史[M]. 郝名玮，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3. 青木昌彦，吴敬琏.从威权到民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1946年生，波兰著名知识分子，犹太人，毕业于华沙大学历史系，现为《选举报》总编，曾任波兰国会议员。

著名的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曾提出“为一个美好的今天而非明天而奋斗”，坚持面向社会，以渐进的方式参与公共生活，促成独立的公众舆论和社会的自我担当，摆脱高压统治而恢复社会的自主性。

米奇尼克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诗人米沃什的诗句。1982年米奇尼克写道：“当你独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泪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动着手枪——在这漆黑的、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米沃什）。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注)

2011年5月，我和国内的几位记者朋友一起访问波兰，期间就到位于华沙市海尔姆大街上的《选举报》总部，采访了“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米奇尼克先生。

走进《选举报》的大楼，就像走进一所艺术馆，墙上挂的每一幅照片都充溢着艺术的美感。各个角落随意地摆放着植物，生机盎然。不远处的服务台前站着一位中等身材的壮硕男子，短头发，一件夹克衫搭配着一条牛仔裤，就像一位刚下班的普通工人。

当翻译告诉我们说，这就是《选举报》总编米奇尼克先生时，我有些失礼地多打量了他几眼，因为我很难把眼前这位和有世界声望的波兰著名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

米奇尼克先生引导着我们走进会议室，亲自为我们倒水，然后非常随意地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在征得我们的同意后，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还开玩笑地说：“我应该搬家到美国佛罗里达，因为那里已经禁止吸烟。”

我再次仔细打量这位波兰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他抽烟很凶，一根接着一根，毫无文人的优雅之气。他的头发稀疏而短簇，额头饱满宽大，厚厚的镜片后面双眼充满锐气，一点不像65岁的老人。但是，额头上几道深深的皱纹昭示着他曲折的人生遭遇。

就在那次采访前半个月，米奇尼克在德国魏玛获颁“2011年度歌德奖章”。在颁奖仪式上，米奇尼克说，他有时不太相信自己已经成了自由人，“我早晨醒来后，经常不敢睁眼，因为我害怕过去的20年只是一场梦”，“我会发现勃列日涅夫仍然活着，他们会来敲我的门，我弄不清他们逮捕我的时候是说波兰语还是俄语。”

米奇尼克：还有比面包更可贵的

采访时间：2011年9月13日下午

采访地点：波兰华沙《选举报》社

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马国川：您原来也是一个“红二代”，但是为什么从16岁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米奇尼克：在开始的时候，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却说我是反政府的。不对，我是斯大林主义政府的反对者，我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我以马克思主义反思、批判斯大林主义。一直到1968年，我最终选择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

可以说，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在我的理念里有这样的四个成分：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人权、公民社会。我追求的目标是：消除不平等，使社会更合理。

马国川：1968年之后，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为了保持稳定，开始"以自由换取面包"，人们日常生活的"面包"超越了人类所有的其他目标，成为唯一追求的对象。许多知识分子也选择了沉默，当时你们是怎么应对那个沉默的"面包时代"的？您害怕吗？

米奇尼克：我不怕，是因为我不知道可以怕。当时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直接感受过希特勒的残暴镇压，也没有直接受到过苏联对东欧的最苦难、最恐怖的压迫，所以我们并没有生活在恐惧的时代，而且我很笨，所以我很大胆。我依靠直觉和信仰努力工作。

从极权主义转到民主主义的路是不间断的。在以前，很多波兰人根本想不到可以反对政府，可以反对执政党，因为执政党不但逮捕我们的手，也逮捕我们的头脑。波兰大诗人米沃什有一本书就叫《被禁锢的头脑》。而现在，波兰公民可以自由地到国外旅游，也可以在国内自由地游行示威。

马国川：从1989年往回看，极权政权一直表现得非常强大，作为一个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您是如何度过长达30年的岁月的？

米奇尼克：我相信，极权统治注定要失败，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们虚伪的诺言。虽然他们看似强大，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是几乎没有其他力量了。我说"几乎"是因为他们还留有用自己的仇恨

和耻辱来污染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用尽全力来抵抗这些污染，在我们面临的全部斗争中，这是最艰难的。

因为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在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暴力折断了社会的联结。并且，当社会如此原子化，其内部政治崩溃，它就变成自动导向极权主义。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尝试合作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

还有比面包更可贵的

马国川：显然，您是一个对政治介入很深的知识分子。当您说政治这个词的时候，您脑子里想起来的是什么？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政治是为共同利益而参与工作。但是这种说法也值得推敲，因为“共同利益”的内涵很难界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说，法律的性质应该是平等的。可是，在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这种平等根本是不可能的。例如，在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法律是不平等的权利，因为党员的权力比非党员的权力要高。

马国川：您的半生其实都不得不应付政治的压力，当波兰实行和平转型之后，这种压力突然消失了，敌人没有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米奇尼克：我从来没有把共产主义看作是我的敌人，我要防止的是专制主义。专制摧毁人们的创造能力，扼杀人类生活的品位，并最终扼杀生活本身。

所以1989年的时候我对自己说，现在尽管有所改变，从今以后我们必须共同生活，不能把原来的当权者放到监狱。当然很多人有不一样的看法，我对这些人说，我们不应向波兰统一工人党学习，使用他们对付我们的手段，也不应使用斯大林时期的手段。波兰是所有公民的波兰，而不只是一部分公民的波兰。

我同意宽恕，但是不主张遗忘，不主张健忘。我们不要报复，要的是揭示全部事实真相。

马国川：人们普遍承认，在东欧各国里波兰的民主转型比较成功。在您看来，波兰转型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米奇尼克：现在波兰很多人在讨论如何评价转型以来的20年。看法有多种，我认为这是波兰非常成功的一段时间，我自己非常欢迎在波兰的变化，虽然有些东西我并不接受，而且我经常写文章批评政府的做法。

我个人认为，波兰成功转型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反对派和共产党的改革派之间能够达成妥协。我相信，革命之路是一条“死胡同”，因为革命只有破坏，不会建成什么新的东西。所以，通过妥协和协商，一步一步地进行改革是最好的。

马国川：东欧转型和北非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有什么共同点？您怎么评价北非和中东发生的变革？

米奇尼克：我们同样也在寻找自由，追求自由。

革命有两种：一种是革命者想要得到自由，另一种是革命者想要得到政权。我对北非的变革过程特别满意，因为原来的独裁者已经下台了，专制已经没有了，只是变革的过程还没有完成。

埃及和突尼斯的变革都是通过非暴力完成的，因为军队保持了中立。但是利比亚发生了内战，叙利亚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暴力的政权，它没有任何方法保护自己的公民。

我访问缅甸时，曾向昂山素季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评价阿拉伯国家的变化？她说，全靠军队的态度。她自己支持非暴力行为。

马国川：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您怎么看待爱国主义？

米奇尼克：我对爱国主义的看法是很警惕的。爱国意味着非常关心自己的国家，可是爱国主义呢，往往意味着只关心自己的国家，不在乎别的国家。我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

马国川：民族国家在独立的过程中形成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一度很兴盛。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怎么认识和对待民族主义呢？

米奇尼克：全球化意味着开放边境，允许来自国外的技术或产品进入我们的国家。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由于一些民族国家害怕全球化影响本民族，所以有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上场。在今天的欧洲就有这样一种新民族主义的波浪。新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认同本民族，以本民族为中心；另一种是民族歧视，是种族歧视。

在所有未来的陷阱中，民族主义者的矛盾是最危险的。

民主是灰色的

马国川：2010年您应邀参加官方交流访问中国，此前您也曾两次来中国，您对中国有何认识?

米奇尼克：中国有非常了不起的魅力，它的经济成就惊人，让我们非常佩服。我第一次到中国是1990年，和2010年这次访问比起来，20年间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另外，我去过拥有世界最豪华楼房的上海，我也去过破败衰落的山村，两个不同的地方几乎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

我在中国访问，发现许多人士和我说话的时候没有禁忌，非常开放地交流。我觉得，中国这么有经济成就的国家，不应该害怕一些不同的声音。

马国川：中国社会的思想是不统一的，尤其是知识界和精英层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分化，不同的观点在中国同时存在。

米奇尼克：我观察到中国确实存在多种观点，经济学家、政治家、外交官、党政官员，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包括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有不同看法。我和一些中国人交流，发现有些人支持我的观点，也有些人反对。

争论的各方都不构成对民主的致命威胁，说到底这都是些常规性的争论，而真正构成威胁的是，争论的各方强化自己的立场，把自己的位置绝对化，使妥协成为不可能，因而很容易瓦解民主国家的进程。实际上，民主不是黑色也不是红色，民主是灰色的。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问，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灰色的民主，拥有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机构，有可能以争论来代替武器。

马国川：那么在您的理解里，民主的本质和原则是什么?

米奇尼克：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这个自由属于拥有良心的公民。如此理解，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秩序中，冲突是一个持续的事实。

我所理解的民主原则要求人们询问自己——这是波兰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提出的——如果大多数人屈从于胜利的极权制度，像希特勒或者斯大林那样的，那么，我就必须跟随他们么？而我如果选择了民主，相信自由、宽容、我的文化传统、我的人类尊严，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失败？我视所有这些问题为民主的核心。

马国川：有些经济学家说，如果1980年波兰执政党能够推动经济自由化的话，那么今天可能仍然在执政。您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如果这样一个假设存在的话，它的前景是什么？

米奇尼克：我们当然可以做假设，但是它和实际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我可以同意，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波兰共产党进行改革，实行经济自由化，波兰就不会发生后来的经济危机，今天的情况也会很不一样。

但是，波兰的政治转型是避免不了的，因为正如《圣经》所说，人的生活不只是靠面包。还有比面包更可贵的。除了面包以外，我们还需要自由，还需要尊重，而这是专制政权从来不会保证的。

很多经济学家不喜欢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可以通过协商寻找一个妥协的办法。而经济学家眼里往往只有数字，看不到人。

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公民社会

马国川：在有些人看来，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成员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作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尊重每个人的想法，只能尊重大多数人的愿望。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在30多年取得经济上的成就，与它的稳定是分不开的。

米奇尼克：一个国家并不是家庭，国家是公共体，每个成员是平等的，不会有一个人是家长，其他人要听他的话。如果在波兰有这种做法，那么它就是违宪的。

中国30多年来的成就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想知道，它还能够持续多久？对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层来说，现在的中国是他们的理想国家，他们都在说"中国模式"。可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学习"中国模式"？俄罗斯也许可以采取这种发展模式，但是俄罗斯缺少中国人。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模式"必须有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意识形态。

我觉得，对于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仅有经济成就恐怕是不够的，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比方说更多的自由、更公平的待遇，等等。中国总理不是也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有两个选择：它和普通人进行对话，通过对话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或者拒绝对话，这恐怕将导致国家不能控制的社会混乱，使国家不可能继续保持稳定。

马国川：在中国一些人认为，每个国家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社会转型也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他们认为，通过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和改良，能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米奇尼克：我完全同意，因为执政党内也有支持现代化、支持民主化的人。我一贯的主张是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沿着

团结合作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

2010年我到中国参加中欧论坛活动，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中国人，和他们交流特别有意思。有时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年轻了30岁，因为他们富有激情、胆大、勇敢。

马国川：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持何态度?

米奇尼克：我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我只是说出个人的感觉：好像没有人知道，中国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将一步一步地变成民主国家。在波兰，民主的来源是经济危机，经济失败导致民主；我觉得，在中国反而可能是因为经济成就而变成民主国家。

中国正在实现转型，我想提醒的是，未来中国实现转型以后，会面临完全新的问题。

马国川：转型中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自从计划经济转型以来，人们一直希望建立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了十几年之后，人们又感到了失望，因为中国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倾向。

米奇尼克：我很熟悉这个过程。中国现在有很大的腐败问题，波兰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波兰已经形成稳定的民主政治，所以解决腐败问题的方式比较稳定，并不需要伤害市场。

现在的自由市场不是人类最理想的一个经济制度，因为有些生活领域不能受自由市场的管理，例如科学领域、制药、教育、文化等可以部分市场化，但是不能全部市场化。我不喜欢资本主义，1989年波兰转型开始时，我全心支持经济改革，虽然这种经济手段也不是最好的，但是对波兰来说，没有其他选择。

可是，一个国家能不能只发展经济而不给人民自由？如果这样的国家掌控世界，会不会造成麻烦？我觉得不行，这种做法在这一段时间内可能是非常对的，但是这个时段一过去，它就失效了。

米克尼克的思想历程

“这是一个很复杂、很长的故事，”在我的提问下，米奇尼克先生回忆起过去的岁月，语调平淡地说，“我确实从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政治。”

叛逆的“红二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年，米奇尼克出生在波兰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里。他的父母都是波兰的老共产党员。

丘吉尔曾经说：“苏联红军所到之处就把它的制度带到那个地方。”斯大林也说：“我到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势力范围。”于是，苏联坦克所到之处，本来属于欧洲文化传统的东欧各国相继建立起来极权制度。这种制度不久就受到了质疑。1956年爆发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的“波兹南事件”，都说明了东欧人民对于新制度的不满。

作为一个“红二代”，米奇尼克的头脑并没有被禁锢，因为他读了很多马克思的书，“这是一种用来描绘现实的语言，总是批判地描写”。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曾被老师赶出课堂，因为他在课堂上大声质疑被掩盖的历史事实，追问卡廷事件的真相。

不久，米奇尼克组织了“矛盾的寻找者俱乐部”，很多成员来自“红色家庭”。天真给了这伙少年力量和勇气。就像米奇尼克所说，他们生活在“一个不知道害怕波兰共产党的特殊的小圈子”。

他们质疑权威，专门讨论各种犯禁的问题，例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自由问题、苏联干涉匈牙利的问题、波兰是不是需要第二次革命的

问题，等等。

结果，16岁的米奇尼克竟然被高层关注到了。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上，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点了他的名。在当时的波兰，任何自发性组织都是被禁止的，米奇尼克的俱乐部却侥幸地存在了一年多才被解散。

1964年，米奇尼克和年长的朋友策划了一封公开信，内容关于波兰独立和议会民主。于是，在他18岁的时候，警察第一次造访，他被关了两个月。从此，他成了波兰共产党改革派圈子里的重要人物。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

1968年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份。

邻国匈牙利发生了“布拉格之春”，波兰作为苏联的胁从国也参与了出兵镇压，使这位年轻人的心灵蒙上了巨大的羞辱。另一事件则引发了他的义愤。当时，沙皇反对者、波兰诗人密凯维兹的戏剧《先人祭》被政府强行禁演，米奇尼克和年轻人随即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很快他被大学开除，再次被送进监狱。18个月后，走出牢狱的米奇尼克走进一家制作电灯泡的工厂，当了两年焊接工人。

1970年，哥穆尔卡黯然辞职，接任者盖莱克积极推动对外开放和国内改革，华沙街头开始出现可口可乐和万宝路香烟。一些非官方出版物（油印、复印）和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的组织也悄悄出现了。

在松动的政治环境下，米奇尼克成为波兹南大学的扩招生，197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一本《极权主义起源》在朋友们中间热烈流传。

米奇尼克这样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运用。我父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相信革命暴力能够带

来社会公正。这给他带来了8年牢狱之灾，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莫斯科审判。他肯定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需要重蹈斯大林审判吗？我也向自己重复这个问题。”

如果说，米奇尼克早年也曾是共产主义的信奉者，只是“信上帝，但不信教堂”（信共产主义学说，不信掌控大权的某些人）。那么在经历了两次牢狱之灾后，他彻底告别斯大林主义，最终选择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像索尔仁尼琴一样，米奇尼克忍不住要说：“监狱，你塑造了我。我感谢你！”体制内批评者的阶段从此结束。

但是，与主张通过革命实现民主的西欧“左派”相比，作为一名东欧知识分子，米奇尼克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波兰不可能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极权主义将延续很长时间。因为波兰处在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的控制之下，想要赢得一场对于苏联的军事战争是毫无希望的。

在现实主义的考量之外，他还有更深邃的历史反思，“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当今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

这些富有哲理的话都是米奇尼克在监狱里写下的。1977年他重返监狱，开始用笔写下自己的思考。这是专制体制的意外“收获”，因为它反复地把他投入监狱，而这期间成了米奇尼克写作灵感焕发的时刻。后来这些文字结集为《狱中书简》，美国作家乔纳森·谢尔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米奇尼克是少有的“同时具有反思行动的写作能力和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他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为了行动而写作，他直接面对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

确实，米奇尼克既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行动者。

米奇尼克把眼光落在了社会领域，“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如同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社会那样去做，在一个非公民社会中首先做一个好公民。他呼吁的不是作为个人的行为，而是倡导建立社会的自我组织，让社会自己承担起自身的命运，在以严厉的方式压抑各种社会组织的极权主义政权下发展一个新的空间。

早在第三次入狱的前一年，他就组织了以知识分子为中坚的“保护工人委员会”。它宣称自己的目的并不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目的非常具体：给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受到政府压制的工人家庭以援手，想办法弄钱给那些失去父亲的家庭，并帮助遭受审判的工人寻求有利的证据。成员和组织的活动都是公开的，所有发表的文件都开诚布公地公开自己的观点，组织本身和每个成员的行动都有自主性，而且互相信任。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这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组织。在一些持异议者的眼中，参加“保护工人委员会”的人们甚至被讥笑为“社会工作者”。即使如此，这个公开透明的社会组织仍然被极权主义政权视为“敌对组织”，参加的成员有的丢掉工作，有的遭受毒打，有的被逮捕。

但是以米奇尼克为代表的波兰知识分子没有气馁，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在米奇尼克看来，组织起来的社会也并不寻求推翻政府，而首先是社会的自我担当，承担和改善社会和人们的具体处境，重建“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的力量足够强大之后，和政府协商，寻求与政府的对话和互相承认。

就像磐石下的小草，公民社会的种子在波兰极权主义政府的重压下，艰难而又不屈地成长起来。其中一粒种子最终成长为一棵大树，它就是1980年成立的主张非暴力反抗的“团结工会”。令人惊讶的是，在工人们规模浩大的声援运动之下，团结工会诞生并争取到了合法地位。此后不久，“保护工人委员会”宣布将自己的活动并入团结工会，同时仍然保留公开化、自主性等基本政策。

“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

米奇尼克坦陈，自己不是工人运动的领袖，而是社会运动中的一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理性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人们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自发力量导入理性的轨道，将来自不同方向的不同人们的不同要求，做成一个宽广、结实的公共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磋商、调解，而不是使用任何一种强制性力量来解决。这就是米奇尼克所说的“公民社会”——让冲突得到真实的表达；每一个人拥有与君主相同的权利。

在米奇尼克看来，如果仅仅着眼于由哪一位反对者取代现在的当权者，那么什么也不会改变，因为“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

“在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

所以，即使在团结工会里，米奇尼克也是一个反对派。诚如他自己所说：“瓦文萨是一个运动的领袖，而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这个独立知识分子坚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他严厉防止瓦文萨成为一个凌驾于团结工会之上的新权威，从而把该组织变成一个新的专制组织。

后来，在回答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做得这么好，能够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说，这是知识分子帮助了他们，是“保护工人委员会”帮助了他们。

例如，1980年底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之后，米奇尼克在一篇名为《希望和恐惧》的文章里呼吁，团结工会减少罢工或避免以罢工作

为威胁，以自己的理性唤起政府的理性，“如果仅仅以罢工或以罢工相威胁才可以迫使政府理性地行动，这种形势是一种社会性的危险，因为这迫使团结工会组织者以罢工作为一种武器”，“我认为除了把社会调和制度化别无他法，为谈判和妥协、也为独立的公众舆论创造一张形式上的网络。”

但是极权政府没有学会妥协。在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里，米奇尼有近6年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可是，米奇尼克坚信，民主制度有赖于统一国家中的社会团结，社会团结则有赖于各阶层和团体具有一种妥协的心态，“这种妥协建立在我的一种确信之上，多元化的民主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并与之妥协。妥协哲学是一种认可犹豫的哲学。相比之下，激进主义的、革命的、煽动的和暴力的哲学，采取了更为简单容易的途径……它导向断头台而非民主。”

值得庆幸的是，波兰避免了走向断头台的歧路，在日益壮大发展的公民社会面前，极权政府选择了妥协。

“没有流一滴血而完成的转型”

1989年春天，波兰召开圆桌会议，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坐在一起，讨论政治改革问题。米奇尼克作为反对派参加了谈判。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派的代表，都不知道圆桌会议能否产生成果，更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

最终，谈判者战胜了互相的不信任。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谈判，波兰政府承诺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在当年夏天举行的选举中，团结工会大获全胜。“这样，我们就打开了通往民主主义的大门”，米奇尼克说，“这是一场没有革命的巨大革命。没有人走上街头，没有路障，也没有枪杀令”。作为一种妥协，统一工人党领袖雅鲁泽尔斯基被反对派阵营选举为波兰转型后的第一任总统。经过30多年的坚持和奋斗，波兰的历史终于掀开了新的篇章。

波兰开启了东欧变革的先河，开启了东欧民主变革的历史进程。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民主和自由之门是由许多人勇敢地打开的，而波兰人在其中发挥了难以置信的关键作用。波兰前总理马佐维耶茨基认为，波兰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因为波兰人能够超越所认为的现实政治的最大边界，而对最后的胜利并没有丧失信心。

米奇尼克在谈及这段历史的时候，不无自豪地说："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为没有流一滴血而完成的转型出一份力量"，同时他也承认，"如果我拒绝承认我们的前统治者所做的贡献，那么从我的角度也是非常不适宜的。"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曾说，"米奇尼克在波兰所扮演的角色和力量'如同甘地'"。1989年圆桌会议之后，这位当代"甘地"一度出任国会议员，但不久后辞职，"我从来没有考虑自己是一位政治家，在这个角色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舒服。在离开议会之后，我感到真正的解脱"。从那时起，他一直主编波兰最大的报纸《选举报》。在这份报纸上，他依旧批评现政权，批判波兰社会。

米奇尼克认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个"波兰知识分子"。在接受一家中国媒体采访时，他坦率承认，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在波兰转型之前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以我的性格、思维方式，在目前的波兰政坛没有我能做的事，没有适合我的位置，因此我只去谈政治理论上的难题，也就是努力去在另一层面上提出某些适时的问题。"

"通往自由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最后我们还是需要自由，"米奇尼克最后说，"我个人一辈子会支持自由，我不需要金钱和权力，但是我一直需要自由。"

---

1. 切斯瓦夫·米沃什. 被禁锢的头脑[M]. 乌兰，易丽君，译.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施乐文（Roman Slawinski），1931年生，波兰著名汉学家，曾留学中国6年，现为波兰科学院院士。

2013年春天，我应约到波兰的华沙大学和雅盖隆大学进行访问。在波兰期间，我采访了许多人士，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波兰科学院院士、汉学家施乐文先生。

那天下午，我沿着波兰老城的街道往南走，在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的雕塑后面，就是施乐文先生工作的波兰科学院。跨过厚重的大门，走过古朴的走廊，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见到了82岁的施乐文先生——当时他正在那里举办个人画展。没有想到，这位汉学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油画家。他引导我观赏每一幅画作并热情地讲解。

随后，我们来到科学院对面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来开始闲谈。下午的阳光斜照进来，正好映在施乐文先生的脸颊上，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色。老人身材魁梧，面相庄严，两条银白色的眉毛又浓又长。在这位西方知识分子身上，散射着浓厚的东方哲人气质。

1931年，施乐文出生在波兰南部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家乡被德国人占领，凡是抵抗人士都被杀害了。战争期间，不屈的波兰人建立了地下秘密中学，冒着发现就被枪毙的危险开展教育工作。施乐文在地下学校完成了中学学业。战争结束后，他进入波兰历史最悠久的大学——雅盖隆大学。

1950年，施乐文来到中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外国留学生。施乐文笑着回忆说，“那个时候很多人说我是傻瓜，因为刚刚爆发朝鲜战争，去中国似乎意味着送死。”在他的记忆里，在中国度过的时光非常美好。

史料记载，1950年中国政府与东欧国家交换留学生。当时中国百废待兴，而且承担着抗美援朝的巨大耗费，人民生活困苦，但是对远道而来的留学生悉心照顾。这些留学生享受着相当于一个中国讲师或者教授的待遇，在外地参观时，地方政府启动高级别的警卫保护[注]。

在中国的六年青春岁月，施乐文收获的不只是知识，还有爱情。他结识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姑娘。经过周恩来总理批准，两人结婚，一起回到了波兰。回国后，施乐文先在华沙大学任教，后来成为波兰科学院院士。

我们的谈话范围广泛，涉及波兰历史、中国文化，精神矍铄的施乐文侃侃而谈，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来自中国的我相形见绌。这位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老人见证了纳粹对波兰的蹂躏，也见证了波兰共产党的兴衰。他还是波兰最有名望的汉学家，主编过一本波兰文的中国近代史，后来还出版了英文版[注]。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同时，他同样关注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改革开放以来，他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访问，2001年还以校友身份参加了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虽然对传统文化不再完全否定，但也存在质疑和批判，认为传统文化阻碍了现代化进程。可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宣扬传统文化的势头浩大，方兴未艾。特别是中国进入新政治周期之后，一些所谓的“新儒家”大肆张扬要复兴儒家文化，仿佛唯此才能推动中国进入世界大国行列。

施乐文说：“中国应该有选择地利用儒家思想”。在他看来，新儒家思想完全不妨碍民主化，而且民主化也跟儒家没有对立，“台湾地区完全可以证明，中国文化和国情可以民主化，并不存在与中国文化、国情的不适应。”不过，施乐文提醒道，“不要幻想儒家思想能够代替其他思想。”

一位汉学家的观点如此清醒，怎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呢?

施乐文：不要幻想儒家思想代替其他思想

采访时间：2013年5月21日下午

采访地点：波兰华沙

我亲眼看到波兰转型成为民主国家

马国川：1955年您离开中国，回到波兰，当时波兰国内形势如何?

施乐文：当时斯大林已经死了，新上台的哥穆尔卡主张和苏联建立平等的关系，所以最初许多波兰民众都拥护他。

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是苏联强加给波兰的，根本没有问我们的意见，喜欢不喜欢都要接受。当时苏联打德国，必须经过波兰。战争结束后，一部分苏联红军长期驻扎在波兰。1946年波兰第一次选举，国民大部分支持农民党，苏联支持的波兰共产党的得票率只有10%。但是最后农民党的领袖被逼跑了，波兰共产党宣布赢得了选举。如果你有百分之百的权力在手里，得到想要的东西是很容易的。

苏联不但在波兰有驻军，它的军舰、潜水艇等也在波兰建造，只付很少钱，甚至不付钱。苏联人干预波兰的政治，甚至直接控制，因为一部分领导就是苏联指派来的。战后首任总统贝鲁特出生在波兰，但是长期在苏联生活，不会说波兰话，而是说俄语。

马国川：比起贝鲁特来，哥穆尔卡开明得多。

施乐文：虽然哥穆尔卡的统治有所松动，但是仍然严密地控制着波兰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等各方面。尤其到后来，哥穆尔卡镇压工人罢工，人们越来越反对他的统治。

马国川：当时您在华沙大学任教，作为知识分子，您的感触应该很深。

施乐文：是的。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当时波兰共产党并不要求人们入党。知识分子也很少参加波兰共产党，有的坚决不入党。直到20世纪80年代，波兰这个天主教国家也仅有300万共产党员。

马国川：据我所知，有很大一批人才是华沙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在波兰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波兰最负盛名的知识分子米奇尼克先生就曾经是华沙大学的学生。

施乐文：是，不止他一个。只有工人和知识分子结合，才能有社会变革。以前经常有工人罢工，都被镇压下去了。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1970年的海滨罢工都被镇压下去。20世纪80年代也有工人罢工，但是知识分子参与进来，结果就大不同了。

马国川：20世纪80年代工人罢工波及波兰全国。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上台不久，就宣布在波兰实施“战时状态”，即军事管制。他自己说，这是为了“拯救国家免于崩溃”，是“最后的一条道路”。

施乐文：雅鲁泽尔斯基以前是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军官、最好的指挥，非常优秀，而且会说会写，但执政之后就完成违背了之前说过的话。他搞军事管制，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维持统治了。反对派的实力很大，企业都在反对派的手里，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实施军

事管制更糟糕，中国的说法是“官逼民反”。军事管制的结果就是把人民推到对立面，完全跟政府对立起来。

雅鲁泽尔斯基说，如果不搞军事管制，苏联会派兵干涉。其实，解密的档案表明，苏联根本没有想要动用军队干涉波兰，也没有胆量占领波兰。苏联从匈牙利事件中得出了经验教训，波兰比匈牙利还大，搞不好就会引发战争，所以并不愿意派军队镇压。雅鲁泽尔斯基当时搞军事管制的借口是不成立的，不过是借此来维护统治。

马国川：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雅鲁泽尔斯基的高压政策为什么没有奏效呢？

施乐文：雅鲁泽尔斯基虽然是一个独裁者，但没有人听他的话。对本国的军队，波兰共产党仅是表面控制，没有多少人真正听从他们。事实上，雅鲁泽尔斯基搞了那么多年的军事管制没有用，经济也没有起色。经济是基础，经济搞得糟糕透了，人们必然会起来反对。

到最后，雅鲁泽尔斯基决定妥协。团结工会也希望不要有流血，不要用武力办法来改变制度，而是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于是大家坐在一起，举行“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后，波兰共产党仍然保留了1/3的职位，雅鲁泽尔斯基继续担任总统。不过在后来的选举中，大多数工人将选票投给了反对派，雅鲁泽尔斯基就下台了。

比起判决来，社会评价更重要

马国川：波兰这种不流血的转型方式非常了不起。

施乐文：对，波兰转型非常成功，在东欧国家里也是最成功的，它是骨牌的第一张。波兰经济、人口比其他东欧国家大，所以它会影

响别的国家。

转型以来，波兰变化很大。70年代波兰经济主要靠外债，80年代经济一直下降。转型以后，很多国有企业私有化，外资开始在波兰投资，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首先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私人可以办报纸，国民的民主权利大大增强。

马国川：转型时期的私有化常常有暗箱操作。在波兰转型期间，是否有一些人利用权力和关系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财富？

施乐文：现在做不到了，转型之初的时候是有的，一些高高在上的人利用权力，廉价购买一些破产的国有企业，自己当老板。这只是一部分，不能说所有的私营企业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有的企业是从零开始，慢慢做大，也有的企业破产了。总之，各种情况都有。

马国川：在转型之前，工人罢工被镇压，甚至有主教被暗杀，但是凶手和指使者并没有受到惩罚。例如，雅鲁泽尔斯基虽然被送上过法庭，可是一直没有被判刑。为什么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呢？

施乐文：雅鲁泽尔斯基曾经被送上过法庭，可是拖了很多年也没有结果。他现在已经90多岁了，又老又病，上帝会解决问题的。

和平转型是通过妥协的办法解决历史问题。和平转型就要妥协，不能今天妥协了，明天又反悔。肯定是有一些正义得不到伸张，但历史是可以记录的。比起判决来，社会评价更重要。

马国川：您的观点特别引人深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历史的审判比当下的审判更重要？

施乐文：可以这样说。所以波兰出版了很多历史书，都是记录过去的。例如，和苏联共产党比起来，波兰共产党没有大规模杀过人。

执政初期有一部分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缺衣少食。很奇怪，年轻人死亡得比老人还要多。这些都被记录进了历史。

马国川：在您看来，波兰转型对中国有什么启发呢?

施乐文：我不知道有没有启发，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每个国家都有太多的因素，每天都在变化。而且在别的国家发生的变化，还可能影响着另外一个国家。

但是我觉得，应该交流这方面的思想，要知道别人怎么解决具体问题，可以少犯一些错误，但并不等于百分之百把一个国家的经验搬到另外一个国度。以前就是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东欧，反而不好。所以我们一定不要重复失败的历史。

我主张有选择地利用儒家思想

马国川：我看您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发表过研究儒家的文章。

施乐文：儒家思想是古典的思想，对社会治理很有用，不仅对老百姓有好处，对官方也有好处。儒家提倡孝道，尊敬老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讲孝道，一个人的晚年是很可怜的。国家再出钱有些问题也永远解决不了。对于官方来讲，提倡对国家“忠”，这样便于管理。

我主要是对当代新儒学感兴趣。当然，我知道在中国对新儒学有很多批评。

马国川：和孔子的思想比起来，新儒家极力与现代社会融合，但是似乎效果不佳。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儒家里面没有民主、自由、科学等现代的思想因素，很难适应现代社会要求，

也难以承担起中国现代化的责任。

施乐文： 要求儒家思想里有民主、自由、科学等现代思想，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那是2500多年前产生的思想，不能苛求古人。

不过，也不能说儒家里面完全没有现代思想，“有教无类”就是平等，尽管这种平等是有限的。儒家思想并不妨碍民主化，也并不妨碍自由主义的思想。台湾地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那里有37年的军事管制，但是1986年以后实现了民主化，同时依旧主张儒家思想。除了台湾地区，日本、新加坡、韩国也是成功的先例。

我主张有选择地利用儒家思想，而不是全盘照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也没有别的历史思想资源，同时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包含儒家思想，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如果一段时间弃之不用，那么现在恢复也是有道理的。

马国川： 您对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怎么评价？

施乐文： 确实过火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吸收一些西方的文化、科学、制度等，如果不批判传统思想，就不可能改变。所以，我理解那一代人为什么严厉批评“孔家店”。

1949年以后的30多年里，比“五四”运动的时候更彻底，对于儒家思想不是批判，而是根本否定掉了。这对中国搞现代化不利。

马国川： 在您看来，儒家思想可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

施乐文： 当然可以发挥，而且是唯一可以用的资源。在波兰和欧洲其他国家有宗教资源，但是中国没有。

现在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现象非常严重，这有各种因素，多年的战争会影响社会道德，“文化大革命”也导致道德水平下降。但是依靠新儒家思想还是可以改善的。有一部分社会问题不能靠法律制度来解决，必须是通过人的思想来改变。

马国川：这样的过程是很长的，大陆和台湾地区不一样，“五四”运动的时候批判儒家，1949年以后又完全抛弃，儒家文化的基础已经非常薄弱了。

施乐文：20世纪50年代有很多新儒家思想的学者，像唐君毅、徐复观这些人很严厉地批评台湾地区的独裁制度。1958年他们在香港发表《中国文化宣言》，虽然说的有道理，但是没有人听，没有回应。

新儒家思想完全不妨碍民主化，而且民主化也跟儒家没有对立。新儒家的思想现在采纳就行了，可能不一定马上就有结果，但会逐渐发生作用，所以不能轻视它。

不要幻想儒家思想代替其他思想

马国川：但是也有人认为，儒家思想“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大可能发挥作用，可以引进宗教。

施乐文：宗教如果没有断绝的话，现在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但是1949年以后断绝了，现在恐怕难以发挥太大作用。

波兰也有很多年的专制，对宗教进行破坏，但是这种做法是没有远见的，反而引起了人们对宗教的同情和对执政者的反感。

马国川：和悲观的观点相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一些学者鼓吹说，中国的儒家思想将来会在世界传播。

施乐文：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世界思想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儒家思想不可能来代替其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民主思想，也不能代替天主教、伊斯兰教、新教，等等。

孔子学院对教中文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是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方式，效果还是不太好，它只是教一点很浅显、也非常有限的东西。可能是因为没有理念和人才。总的思想是好的，但还是必须要下功夫，要有最好的人才介绍中国文化，但也不要幻想儒家思想代替其他思想，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很反对西化，说西化是不对的。但是实际上中国从来也没有全面西化。

马国川：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思想解放，开始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和思想。

施乐文：我赞成这种做法，因为从长期来看，传统文化并不妨碍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东亚一些国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过去搞闭关锁国是不对的。不应该闭关，而应该开放。中国改革开放，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这是邓小平的功劳。当然，每个人都有问题，邓小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马国川：和否定传统思想一样，中国的历史也被随意书写。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现在有些人仍然讳莫如深。

施乐文：以前有一些关于历史的书写基本上是假的，没有真的东西。现在很多人开始说一些真话了。这些历史必须重新写。

为了更客观，我主编波兰文的中国近代史时，就请来各方面的人来撰写。虽然观点不一样，但堆在一起人们就可以看懂。现在中国学

者又准备了一部近代史著作，我也准备采纳他们的一部分资料，把它翻译成波兰文在波兰出版。

马国川：中国历史包袱沉重，面临的现实问题也非常多，社会思想也很复杂，对于未来的走向分歧极大。

施乐文：总的来讲，现在比过去开放得多，人们可以说真话了。我知道中国社会分歧很大，有些人认为，所谓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于中国。

马国川：您确实了解中国。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影响很大，一些人认为西方的民主跟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情不适应。

施乐文：台湾地区完全可以证明，中国文化和国情可以民主化，并不存在与中国文化、国情的不适应。

当然，民主化也不能百分之百解决问题，还是要有一定的社会秩序，但是不能按照以往的方式进行严密控制，限制公民的民主权利。有些东西想控制也控制不了，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即使禁止，人们也可以读书，可以通过电脑学习和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

还有一些人认为，民主就是选举，底层可以选举自己所认识的人，上层只能选党派，而且有贿选等问题，所以没有真正的民主。这些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谁也没有说民主选举是最好的方法。

马国川：丘吉尔说，民主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最不坏的选择。

施乐文：总而言之，最重要的不是执政的方式，而是人们对这种执政方式的认可度。

---

1. 田涛，刘晓琴.中国留学通史·新中国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2. Krakow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M]. Ksiegarnia Akademika，2006.

第四篇
新的世界历史也许刚刚开始

何方，1922年生，陕西临潼人，国际问题专家、党史研究专家，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2011年，世界的目光都投向北非。最早从突尼斯开始的以民主为主要诉求的革命，相继蔓延到埃及和利比亚。北非的强势统治者黯然谢幕。这些国家政局稳定数十年，经济发展速度也不太慢，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如何理解这场革命，它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采访了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何方先生。

何方先生家住在北京顺义一个环境幽静的小区。客厅墙上有两幅字画引人注目：一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原所长陈乐民先生手书“仁者寿”三字，文雅秀气；另一幅则是革命家兼书法家李一氓手书的七言诗，古朴刚劲。当时已经89岁的何方先生仍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讲话时还带有老家陕西临潼口音。

何方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16岁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外语学校学习俄文，抢救运动中挨过整。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过县委宣传部长、省青委副书记等。195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曾任驻苏联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一直在张闻天指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何方复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职。[注]

20世纪80年代，何方与李一氓、宦乡一起向中共中央建言，改变对时代的判断，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放弃“三个世界”理论，对外交内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注] 试

想，如果仍然把当今时代判定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势必对外输出革命，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不断，谈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遑论改善民生、富裕文明。

难能可贵的是，何方先生离休以后，把研究重点从国际问题转入中共党史。先后出版《党史笔记》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在知识界产生极大的反响。因为他的书史料扎实，逻辑周密，在恢复历史真相方面有大面积突破，而且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也触目可见。

何方饱览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也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对历史的研究和反思，让他不仅成为严谨的学者，更成为大彻大悟的思想家。

在采访中，他没有就事论事地谈论北非革命，而是将其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变化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70年来，世界发展一直存在两大潮流：一个是经济市场化，另一个是政治民主化。北非国家政权更迭说明，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仍然在向前发展，势不可挡。”

正如何方先生所说：“民主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阶段，再艰难也得走下去，这个潮流是谁也躲不过去的。”

何方：北非巨变，政治民主化潮流第四波

采访时间：2011年8月30日上午

采访地点：北京顺义万科城市花园

伊斯兰国家不排斥民主

马国川：利比亚、突尼斯、埃及等国的专制政体曾稳定数十年，经济发展速度也不太慢，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为什么会爆发革命？怎么看这场似乎突如其来的政权更迭？

何方：在我看来，北非政权更迭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政治民主化潮流开始出现第四波。初步看，它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由于那里的伊斯兰国家专制制度一般比较严酷，没有反对派活动的余地，所以一旦发生，就显得有点突然性、偶然性和自发性，如同当年俄国的“二月革命”一样。

第二，这是各国长期社会矛盾积累和积聚的结果。特别是各级政权的贪污腐败，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经济发展又赶不上就业的需要，使大量劳动力失业，沦为赤贫。例如埃及，人口8000万，失业率9.5%，其中90%是青年。人们对贪官污吏、统治者、贵族、大富豪的痛恨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从这点上说，北非中东这次政权更迭又是必然的，迟早要发生。

第三，北非中东各国的政权更迭都是内部因素造成的，既无外力插手，也不是美国的和平演变。被推翻前的统治者反而亲美，使美国进退两难。

第四，这场更迭是世俗的民主革命。虽然有些地方也有教派冲突的成分（例如人口多的什叶派受人口少的逊尼派统治而导致前者不满），也会在革命中夹杂这种因素，但是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宗教因素这次没有起什么作用。在已发生革命的国家，不仅“基地”组织的影响看不见，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也多被排斥在运动之外。所以

有的媒体说，“这场革命既无关乎伊斯兰教，也无关乎圣战，而是与自由和生计有关。”

马国川：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似乎相信，伊斯兰教同现代民主并不相容。

何方：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是人口最多的四个伊斯兰国家，其多党选举制都在日臻完善。其中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民主化尤为成功。当然，政治民主化在伊斯兰国家中发展很不平衡。

北非三国的政权更迭，其他伊斯兰国家受此影响而纷纷推出某些政治改革措施，这些都说明，在伊斯兰世界民主制也被认为是好的政治体制。因此，我们不能把北非和后来中东所发生的革命看作少数几个国家的特殊事件，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民主化潮流的又一波。政治民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任何国家也不会例外，只是有迟早之别而已。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短短三四十年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但两次大战的性质不同，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它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阻碍了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新的更加惨烈的大战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有造成严重破坏的一面，但它是反法西斯的民主性质的战争，是使20世纪世界从战争与革命时代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转折点，促进了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政治民主化成为一股持续至今并将不断发展的社会潮流。

马国川：在您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政治民主化潮流经历了哪些阶段?

何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民主化，我看是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是“三波民主化潮流”。

第一波是法西斯倒台后的政治民主化。那次民主化主要是德意日等西方国家，也包括印度等一大批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它们都在第一波里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些国家有的自己民主化了，有的是被民主化了（如德意日和一些亚非拉国家）。在这一波里，原有的美英法等民主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第二波民主化的高潮，体现在1955年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那次会议说明，亚非拉国家不光是要求民族独立，也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在这次高潮中，大批亚非拉国家推翻了殖民统治或专制制度，逐渐变为民主国家。

第三波民主化是由苏联解体引发的。在这一波民主化浪潮里，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很短时间里就摆脱了集权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亚非拉原来的一些军人政权或者专制国家，也纷纷建立起以多党议会制为核心的民主政体。如拉美多数国家由文人政权替代了军人政权；1989年53个非洲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只有3个国家，1994年已有48个国家。

马国川：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主化潮流结束了20多年的“冷战”，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

何方：其实，这波持续时间反而会比较长，而且由于这些国家多数缺乏民主的传统、甚至缺乏民主所必需的基本文化条件，所以许多国家民主化进程颇为曲折。不过，民主化的方向是确定的。一些伊斯兰国家也在这一波民主化潮流里走向了政治民主。2011年发生的北非

政权更迭是政治民主化的第四波，已经蔓延到了中东国家。它是不是会限制在伊斯兰国家里呢？也很难讲，还有待观察。

马国川：是否可以说尽管道路曲折，但政治民主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股世界潮流，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

何方：政治民主化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化”完。但是民主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阶段，再艰难也得走下去，这个潮流是谁也躲不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还没有多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到21世纪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民主化了。以选举制为例，1975年全世界民选政府只有30个国家，到2005年已增加到119个。今天放眼世界，保持专制制度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了。

民主化潮流浩浩荡荡，即使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潮流的推动下，民主化的深度和广度也都在不断发展和提高。例如种族歧视曾是美国建国后一直背着的大包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严重存在。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曾做过一个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讲演。但到21世纪初，黑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可以说超额实现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而且种族歧视的言行在美国会受到法律制裁。

市场化是“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

马国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计划经济受到了许多国家的青睐。社会主义国家都选择了计划经济，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又纷纷通过改革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为什么？

何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70年来，除了政治民主化，世界发展的另一大潮流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比经济市场化要复杂得多，但是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也拖了好长时间，同样并不太平坦。

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市场化经济的国家还不到世界所有国家的1/10，只有6亿人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即使日本、德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在战后一段时间里实行的也是管制经济，因为它们要接受援助，只能由政府实行分配。真正能实行市场经济的，只有美、英、法等少数国家，而且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

1985年出现全球化这个名词，真正的全球市场化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全球化之前，整个国际交往是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30年算作“国际化”，后30年才是全球化。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主要区别在于：一看各国是否都实行了市场化；二看国际行为体是否已不再限于国家，而越来越是跨国公司等非国家实体了。

在国际化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进行市场化改革，没有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当时的苏联、中国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由于市场化在全世界迅猛扩展，令全球化出现高潮，完成了从国际化向全球化的过渡，而且也为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夯实和扫尾的工作。

马国川：全球化加速了世界各国的市场化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仅10年时间，除了极少数几个小国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或落后的自然经济，世界各国都实现了经济市场化。

何方：所以1995年11月，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在一次会议上说：“将来，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视为突出的事件也许不是两个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束。这么多的国家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也许是震动更大的变化。这是一场把亚洲、东欧、拉美和非洲几十亿人送上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的运动。”

世界的历史验证了萨默斯的论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市场。这场波澜壮阔席卷全球的市场化运动，是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的。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选择市场经济呢？因为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和主要动力。全球化也是世界经济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年均增长大约只有1%~2%，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其间还来了个大萧条和紧接着的所谓“特种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不然，世界经济长期保持着4%~6%的年增长率。原因就在于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大的世界潮流。凡是顺应潮流、实行市场化的国家，经济必然发展得快；凡是反其道而行的，发展就一定慢，甚至倒退。

马国川：全球的经济市场化以后，不但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削弱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经济主要依靠自身的规律运转，对此应当是有共识的。

何方：对。因为全球化的行为主体，除了国家外，还有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

一项研究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世界100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已有51个是跨国公司，只有49个是国家。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与扩大，国家的作用还在不断减弱，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却越来越大。

为什么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后果那么严重？那次经济危机的原因恰恰是没有全球市场化。大萧条时，市场化的国家仅有不多的几个，而且各国政府还控制着经济，为了自保而高筑壁垒，以邻为壑。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全世界也没有市场化，这就导致商品不能很好流通，实际上加剧了危机，一些农场主甚至把牛奶倒进河里去。

而现在呢，全球化和市场化已经推进到这么深的地步，所以也就不大可能再发生那么严重的危机了。为什么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没有引发大萧条？危机爆发之初，许多人士悲观预言，此次危机将超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可是没有想到，一年多的时间世界就基本上渡过了危机，开始了复苏，而且许多国家的经济还在继续增长。危机后果也没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秘密就在于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卷进市场化的人口已经超过60亿，基本实现全球的市场化，只剩下极少数几个国家排斥对内对外的市场化而自甘落后。

应当认清世界大势

马国川：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前几十年的发展道路非常曲折，甚至付出了许多不应该的代价？

何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中国没有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世界潮流，在很长时期里甚至在逆潮流而行。

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西方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在推进市场化时，中国正在积极搬用苏联模式，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人家在推进国际化时，中国在搞闭关锁国，耽误了一个重要历史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后来实行改革开放，才没有再次掉队。中国打开国门，放弃计划经济，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成效显著。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印度，现在印度反而低于中国，因为印度的市场化比中国晚了十来年，直到1992年才放弃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结果在经济上很快被中国赶上和超过了。

市场化不只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和参与全球化的起点，也是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每个国家，要得到经济迅速发展和赶上世界潮流，就必须对内和对外都尽快实现和不断完善市场化。事实证明，不实行市场经济、坚持单一公有制，迟早要遇到大麻烦。

马国川：中国深得经济市场化的好处，但是现在也面临诸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加剧、腐败蔓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许多人也在追问是否要继续市场化的改革?

何方：有些人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中国搞了市场经济，这是完全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没有同时实行政治民主化，社会缺乏监督，贪官污吏横行，结果不但妨害了市场化本身的完善和成熟，而且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制度性腐败，为今后社会发展留下极大隐患。

马国川：但是直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仍然很高，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民信心增强，谈"盛世"的人越来越多，对此您怎么看?

何方：社会矛盾这么多，谈何"盛世"？！有些人淡忘了我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不是想继续努力，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市场化，特别是启动政改，而是要停止前进，甚至实行倒退了。

有一个问题是必须面对的：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能不能持续。以前的成绩有些是在破坏生态和浪费资源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当然不可能持久，许多严重问题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以生态来说，破坏容易恢复难，既要花成倍的代价，也要用成倍的时间，甚至有些已永无恢复之日。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浪费，造成长期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社会缺乏监督，腐败蔓延，两极分化严重。究其原因，根本上在于社会上的权和利分布太不公平，既得利益集团操纵一切，劳动者参与制度缺失。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面对公私资方，劳动者的权利是什么？面对政府，普通老百姓的权利是什么？面对政府及其主管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权利是什么？在诸如此类的相互关系上，现实情况是什么？一句话，当代中国存在的实质问题和当务之急，是看清世界大势，推进政治改革、民主和法治，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果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不能进行政治改革，不能走向民主法治，就会越来越多地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阻碍中国成为文明国家。

马国川：政治民主化是与经济市场化紧密结合的，不能完全分开？

何方：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参与全球统一市场，同国际接轨；就必须开展对外贸易，对操纵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的跨国公司持积极态度，进行合作。这种经济基础和发展趋势，一定会影响政治以及其他上层建筑。

推动国家文明和现代化有两大支柱，一是经济市场化，二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既含有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但主要的还是各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市场化和民主化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再艰难也得走，只能是早走或晚走的问题。

马国川：过去数十年的历史证明，无论全球还是中国，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何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困难终究抵不住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以中国的市场化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阻力极大，但“化”的也很快。“左”的和保守的势力竭力抵制市场化，也只能做到且战且退。

现在只剩下几个小国还在精疲力竭地抵制市场经济，但恐怕也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很快就会被全球化、市场化的潮流裹

挟走。

政治民主化更是历经挫折，直至流血冲突。但回顾历史，就世界范围而言，政治民主化的速度同样惊人。到20世纪末，多数国家民主化了，保持独裁专制的国家已变成了少数。这次北非政权更迭浪潮后，专制国家将会更少。

北非政权更迭说明，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仍然在向前发展，势不可挡。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面前何去何从？这是关系到未来的大问题，我们应该认真思考。

---

1. 何方.何方谈史忆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2. 何方.争议下的国际问题观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王缉思，1948年生，国际政治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王缉思是国内一流的国际问题专家，常被国内外媒体称作“中国知名智囊人士”。但是王缉思本人并不喜欢被称为“智囊”，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现在很多人都走入一种误区，将此（成为‘智囊’）作为判断一个国际政治学者成就的标准。我不同意这样的标准，所以我排斥‘智囊’这个称呼。判断学者成就的标准应该是他的思想和学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个影响比‘智囊’要伟大……‘智囊’这个词里面隐含了太多的政治含义和价值含义，但是我不喜欢它的价值含义。”

因此，尽管在政策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王缉思并不把政策研究作为一项事业，而是把教书当作一项事业，他曾夫子自道：“我会把一个大学教授作为我的偶像，而不会把从政后的基辛格作为我的偶像，我对他极少尊敬，尊敬的也是他狡猾、睿智的那一面。”㊟

2011年春天，我到北京大学采访王缉思。

虽然2011年刚刚开始，却注定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关键一年。先是北非和中东发生革命，多个国家的政府更迭；继而日本发生9级地震，由地震引发的一系列灾难考验着世界。各国政府能否通过前所未有的考验，世界将向何处去?

当时王缉思还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学院位于著名的静园西侧，是一座雅致的五层大楼。我看到一个资料说，“文革”中王缉思在这附近见过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从小就在北大校园长大。他的父亲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字学家王力先生。

王缉思身材魁伟，温文尔雅，略微矜持。对于我的问题，他侃侃而谈，显示出深厚的学识和深刻的见地。恰在那时，他领导完成了一项关于1979年以来世界政治变迁的研究课题。1979年以来的30多年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整个世界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政治变化。这个过程，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注)

在王缉思看来，30年来世界政治发展的结果虽有待观察，但仍有轨迹可循，从中可以看出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与此同时，世界面临新挑战，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经受考验，未来并不确定。正确总结30年中世界政治发展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可以帮助澄清一些以往可能产生的错觉，对政治生活的内在规律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这对于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篇采访刊登后，颇受好评。论者称赞说，王缉思揭示了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的宏大而复杂的国际政治图景，客观而理性。数年过去，国际形势的发展印证了王缉思的判断。

难能可贵的是，王缉思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判断。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人认为美国在走向衰落，王缉思明确反对。他的判断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可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里弥漫着燥热的情绪。相当一部分学者大谈美国衰落和中国崛起，鼓吹“中美冲突”。呼吁中美双方减少“战略互疑”、避免走向对抗的王缉思似乎成为少数派，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因为假如没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就不可能推进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改革措施，而对美关系的稳定是塑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关键(注)。

未来是不确定的。唯一确定的是，中国需要王缉思这样的具有稳定价值观和理性治学精神的学者，而不是围绕着政治和政策打转转

的“智囊”们。

王缉思：新的世界历史也许刚刚开始

采访时间：2011年3月18日上午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伊斯兰宗教传统能够同现代民主相容吗

马国川：2011年以来，在中东和北非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学家，您怎么评论这些事件?

王缉思：有些人把中东北非发生的事件称为“民主运动”，但是我个人并不怎么强调事件背后的民主诉求。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突尼斯、埃及等国物价上涨，平民生活水平下降，因此，这些国家民众的民主诉求，实际上也是民生诉求。

任何政治制度变更都不可能马上解决问题，民主也一样。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能够马上解决所有现实的社会问题吗？显然不能。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民主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伊斯兰国家存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它们往往在认可民主化的同时反对西方化。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教与西方的世俗主义与物质主义世界观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事实上，伊斯兰国家在使民族和宗教传统与自由民主制相结合方面已经做出一些独特的探索，但其具体做法往往让西方人充满疑虑，而且还不能说已经取得了成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的制度建设与政治过程。

在伊斯兰世界，一个看似无法走出的困境在于：任何政府如果意欲强行世俗化即对伊斯兰主义采取压制政策，那么它就不仅在理念上与其自由取向相矛盾，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不走向威权化的道路，从而与民主原则渐行渐远；而如果它试图与伊斯兰主义结盟，那么从西方通行的意义上说它就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世俗的政府。

马国川：这是否意味着，一个民主的、世俗化的政府与伊斯兰宗教传统不能兼容?

王缉思：这是一种观点，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伊斯兰宗教传统能够同现代民主相容。一些事实似乎也证明了后一种观点，例如，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是人口最多的四个伊斯兰国家，它们的多党选举制都日臻成熟，其中印度尼西亚在摆脱苏哈托统治后的总统直选尤为成功。

总之，在过去的30多年里，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已经使民主制在当地大多数人的眼中成为最好的政治体制。但迄今为止，伊斯兰国家中尚未出现一个完全成熟的民主体制。因此，在伊斯兰世界政治发展的问题上，无论是伊斯兰国家，还是外部世界，都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宽容与更多的创造性，也许更需要某种崭新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智慧。对于中东北非，还需要认真观察。

任何政治体制的生长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马国川：其实，不仅仅在伊斯兰世界，民主制在全世界都得到了普遍认可。因为在过去30多年，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化浪潮，包括苏联东欧的转型国家，也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原来的一些军人政权或者专制和独裁国家，都开始了民主的制度建设过程。如何认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

王缉思：亨廷顿将这股浪潮称为民主的“第三波”，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在建立以多党议会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方面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有许多国家甚至是在“一夜之间”被民主化了。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历史上就曾经尝试过西式民主，现在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再度站稳了脚跟。但为了解决转型期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和矛盾，它们都努力保留一种独立于社会利益纠葛的强势行政权。因此，它们在制度上一般来说既没有选择美国式总统制政府形式，也没有选择英国式议会内阁制，而是选择了一种介于议会内阁制与半总统制之间的制度，使总统既能够获得议会中多数党的支持，又能够作为不同政党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者与仲裁者。

至于苏联的五个中亚共和国，独立之后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多党制民主政体，但因为出现了政治动荡甚至武装冲突，都强化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机构的地位，转变为一种强势的总统制。更有甚者，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总统被赋予了“无限期行使总统职权”的终身总统地位。由此可见，虽然代议民主政体的根本原则乃是对国家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但在这些转型国家，一种相反趋势的存在似乎仍然具有其必然性；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强人往往发挥了超越制度之上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这些国家最终可能采用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形式，目前还难以进行确切的判断。

马国川：除了古巴以外，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已在形式上实现了多党民主制。在东亚和东南亚，继韩国的民主化之后，原来的威权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泰国相继建立了多党制民主政体，长期一党执政的新加坡也出现了多党选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大部分走上了民主化之路，南部非洲国家则都已经成为宪法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王缉思：但另一方面，在这些地区，民主的实际运作仍然问题重重。在亚洲，“第三波”中出现的民主国家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政治动荡的困扰，一种法律至上、相互宽容的民主政治文化尚未形成；而在非洲，由于家庭、村落和族群仍然是人们生活的重心、忠诚的对象及基本的政治单元，国民国家的建设仍未彻底完成，因而民主或者往往成为削弱了政府行动能力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干脆蜕变为一种选举游戏。另外，类似中亚转型国家的强人政治现象，同样也出现在众多的非洲国家。

马国川：看来，非西方国家在转向民主制之后，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

王缉思：任何政治体制的生长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之这些国家又普遍缺乏西方式民主的传统，甚至缺乏民主所必需的基本文化条件，所以在巩固民主制度及使民主本土化方面仍然面临严峻的考验。需要注意的是，非西方国家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固然妨碍了这些国家向民主制靠拢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些本土因素也有可能成为新制度的生长点，这种可能性尤其需要得到各相关国家的政治家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西方国家的“再民主化”

马国川：其实，过去30多年里，不仅有一大批原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纷纷采纳了西方式的多党制议会民主政体，西方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一场“再民主化”的洗礼。

王缉思：英国学者吉登斯称西方的“再民主化”为“民主的民主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既有民主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充实；另一方面是制度创新。

例如，英国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英国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设立了地方议会，使其在广泛的领域内独立处理地方性事务，以实现权力下放。这一举措不仅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有效克服了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官僚化，而且也为解决北爱尔兰冲突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使其和平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布莱尔政府对英国的世袭君主制和上议院也进行了若干改革，废除了英国王位的男性优先继承权和上议院的贵族继承制，特别是后一方面，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在实现公民政治平等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

日本是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再民主化”的国家。在过去30多年，日本告别了战后形成的“五五体制”，政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并且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开始推行一系列旨在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扩大地方权力的“结构改革”，在克服官僚主导型的决策机制、政党内部的派阀政治、自民党一党独大等有日本特色的政治问题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马国川：在制度创新方面，西方国家有哪些举措呢？

王缉思：为什么要进行制度创新？因为传统民主制的一些缺陷和弊端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传统的竞争性多数决策民主制具有其内在的不足。在这种体制之下，胜者全胜，负者全负，产生了两方面的重大缺陷。第一，复杂的政治决策问题往往被简化为相关政策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人数对比，即政治力量对比，结果导致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缺乏理性与共识。第二，少数群体的利益，尤其是一些恒定的少数群体的利益往往被忽略、被牺牲，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乃至冲突，因为那些恒定的少数群体往往会做出退出相关政治过程或者政治共同体的选择，政治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就不可避免。

正是为了克服传统民主制中存在的上述缺陷，共识民主论和慎议民主论应运而生。二者都强调政治决策的开放性、参与性和达成共识

的重要性；区别则在于，共识民主更注重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协商合作，而慎议民主更注重普通民众的参与，不同政治观念与立场的沟通与交流。当然，从实践上看，无论是共识民主还是慎议民主都还处在实验和探索阶段。前者仍然主要局限于原本就具有统合主义传统的北欧国家，后者仍然难以抵消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过程的强大影响。

马国川：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再民主化”与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是过去30多年里民主化浪潮的两个方面。

王缉思：这两个方面大有不同。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再民主化”是对传统民主制的发展和完善的话，那么一大批非西方国家则刚刚开始其民主的制度建设过程。

世界范围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志

马国川：总结30多年世界政治的变迁，是否可以说，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

王缉思：毫无疑问，一个国家民主与自由的程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志。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一直稳定，即使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或一般性社会危机，也不会出现政治体制向法西斯式的独裁转型的可能。1970年时，采用竞争性多党制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是少数，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占绝大多数。

从长远来看，非西方国家向民主政治的过渡表现出某种不可逆转的势头。伊斯兰国家、中亚国家、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实践说明：一方面宗教、文化与政治传统对民主化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程度同民主化出现的迟早没有必然联系，但同民主化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

马国川：因为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国民主化的成熟程度也不同。

王缉思：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自的诉求和特色。各国民主化的过程、形式与结果都是丰富多彩的。对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方面的探索不应过多指责，而应该表现出更多的理解、耐心和宽容。

“冷战”结束后，广大非西方国家得以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虽然出现了美国使用武力“解放”伊拉克和阿富汗，强行推动当地“民主化”的情况，一些国家的“街头政治”和“颜色革命”也有西方势力挑动的背景，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总体来说是内生、自主、反映国内民众普遍政治要求的。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的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政治对立等，并不能否定民主本身的价值和各国“试错”努力的意义。

马国川：在一些新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社会和政治秩序并不稳定，如何平衡自由和民主、稳定与秩序呢?

王缉思：自由和民主、稳定与秩序，是一个天平的两头，必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过度的个人自由和小群体自由会导致社会分裂、价值观扭曲、公共生活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冲突和暴力对抗。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在刺激人的欲望无限膨胀的同时，不仅导致了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还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的恶果。在新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比如最近出现剧变的埃及，上述问题比在西方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够完善，法治不够健全，但人们在西方生活方式的诱惑面前，不断增强的欲望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的可能性。在一些国家，部分公众的不满通过激烈的形式表达，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维护社会秩序的努力，又往

往转变为超越法治的强权，压制了个人自由、损害了弱势群体的权利。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维持这一动态平衡的砝码，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都未能提供完整的答案。

新的世界历史也许刚刚开始

马国川：过去30多年是全球化空前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与外部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世界的发展对中国有何影响?

王缉思：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日益增加的复杂互动关系。30多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程，意味着它对自身在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格局中实际及预期地位的调整，意味着它对西方精神、价值观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再评价，也意味着它在观念和制度领域的重新选择。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1/5的大国，中国国内的变化本身就改变着世界政治，同时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回顾30多年来的世界政治，特别是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变化，都以各种方式牵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从历史顺序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和保守主义的兴起，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化，东欧的政治剧变，苏联、南斯拉夫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民族分离和国家解体，所谓的“三股恶势力”（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中亚等地区的猖獗，高加索和东欧中亚等国家的“颜色革命”，古巴、朝鲜等国对本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坚持，对中国政治既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冲击，又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政治进程同世界政治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

马国川：虽然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但30多年来各国和各地区的政治变迁是否表现出某些相似性甚至趋同性？中国是否分享了某些相似性？

王缉思：这是可以肯定的。过去30多年的世界政治发展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而在后半期，那些已经采纳了自由民主制的国家不得不通过艰难地探索民主的“本地化”以巩固和完善其基本制度，自由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已经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得到普遍承认，但同时相信“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已经被人们所抛弃，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根据自身传统和条件，都在市场动力和政府干预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过去30多年里，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社会重新获得活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顺应世界潮流是中国之所以成功的秘密。

马国川：有些人把中国的成功总结为“中国模式”，试图将其提升为一种可以挑战西方制度、价值观和领导地位的替代性发展模式，但是受到了许多人士的批评。

王缉思：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说，没有“中国模式”。我向来认为，中国还不能称为一个模式，因为我们这条道路还在艰苦的探索之中，还没有完全成功。世界上确实有些国家想学中国，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这一套体制，没有一个国家能学得了。

中国国内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族群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这些困难和考验说明，稳握政权和国家复兴都需要更高的政府透明度和更有效的问责，同时还需要更加坚定地履行对法治、民主和人权的承诺，而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普遍共享的价值观。如

果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物品，与其他国家更多地共享价值观，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将得以更好地维护。

马国川：那么，能否得出结论，将来世界上将出现“普遍同质国家”？

王缉思：历史并未终结，“普遍同质国家”不会出现，整个世界正在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日本大地震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日本真正出现致命的核泄漏，影响到别的国家，这就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人类的灾难。面对海啸、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面对越来越凸显的环境、能源、粮食、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各种极端主义的兴起，世界如何实现共同治理？如何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

30多年的历史说明，苏联模式固然已成为不会再重演的历史，而今日西方也无法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力。新兴国家点燃了新希望，但一切皆只在探索阶段，其普世意义尚待历史考验。同时，人类面临共同的生存困境，挑战实在太大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旧的历史确实已经终结，新的世界历史也许才刚刚开始。

---

1. 陆昕.对话王缉思——经世致用的人文主义学者[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
2. 王缉思，唐士其.三十年世界政治变迁（1979—2009）[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3. 王缉思.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钱乘旦，1949年生，江苏金坛人，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院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

读大学期间，我偶然在学校附近的书摊上买到过一本《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它是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总结了英、法、德三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不同路径。作者认为，“英国式道路的最大特点是政治相对稳定，政局起伏不大，国家像一艘航船，在较平静的海面上航行，方向既易掌握，又无须经历巨大颠簸，因此只要驾驶得当，便可达到彼岸。”注

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作者钱乘旦这个名字。我没有想到，20多年后我会和钱乘旦先生坐在一起，喝着咖啡，当面听他讲述英国历史。

那是在北京大学东门外成府路上的一家咖啡馆里，顾客不多，我们坐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窗外是喧嚣的车流、匆忙走过的行人，还有巨大的脚手架——中国也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只是走得很艰难、很辛苦。

谈起《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66岁的钱乘旦先生笑着说，那是他当年在南京大学任教时写的书，倏忽近30年过去了。他是南京大学的历史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担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2006年他来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此时他已经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长于英国史和世界史研究，担任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

让钱乘旦名声大噪的，是2003年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解世界上9个主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兴衰史。此后中央电视台拍摄了十二集电

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轰动一时，引起了强烈社会反响。钱乘旦就是该片的学术指导。

那天我采访钱乘旦先生，主题是英国《大宪章》。2015年恰值《大宪章》800周年。1215年6月15日，在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草地上，51岁的英格兰国王约翰（King John）与起兵反抗的贵族和主教们和解，签署了《大宪章》。随后，这份文件被复制成13份，散发到英格兰各地[注]。

我在收集资料时发现，正是在1215年，中国也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蒙古大军攻克了金中都，即今天的北京。金朝第七位皇帝完颜仓皇南逃，北京城又换了新的统治者。中国历史仍然在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里打转转。诸如此类的历史事件一再发生，多得让后人几乎都记不得。

可是，整整800年过去了，《大宪章》不但没有被湮没在历史洪流之中，反而被翻译成各种不同文字在世界流传。为了纪念《大宪章》800周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纪念活动。大英图书馆举行为期半年的"'大宪章：法律、自由与遗产'八百年纪念展"，展品就包括《大宪章》的原件。那是一张写在羊皮纸上的文件，不过A3纸大小。那时羊皮相当昂贵，所以文字必须精简且压缩。该条约以拉丁文撰写，共4000多字。展览吸引了众多人士参观。

《大宪章》赋予人民反抗的权利，后来演化为反抗王朝专制的旗帜。它不仅影响了英国的历史走向，也影响了欧美许多国家历史的进程，成为自由的象征。

近代以来中国深为激进主义所苦，《大宪章》之后的英国现代化道路，更值得中国认真研究借鉴。诚如钱乘旦先生所说，"虽然说渐进式道路决定了行进的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是它走出的每一步都是稳定的，不会忽进忽退，国家稳步向前，政权变了也不会反复。在历史

上，其他那些采用了英国式道路的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在那些国家中，民主政治具有最稳定的基础，它们的经验也最值得人们思考和借鉴。”

钱乘旦：《大宪章》的历史启示

采访时间：2015年4月19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成府路咖啡馆

《大宪章》是封建时代的产物

马国川：1215年，约翰王和贵族签订《大宪章》，按中国人的看法，这种做法是匪夷所思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被打败后，肯定被废黜，甚至被杀，不可能签署什么宪章。那么，英国的《大宪章》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签署的，为什么英国国王会屈服于贵族们的压力？

钱乘旦：首先要搞清楚，欧洲的封建制度究竟是什么含义，否则很难理解《大宪章》。

中国人脑子里面的“封建”，是指秦始皇统一之后的历代皇权大一统，这种制度以皇帝为中心，政治上最大的特点是高度集权。

和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大一统的体制完全相反，欧洲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基本特点是分权：第一，有以王权为代表的世俗权力和声称代表上帝的教会权力之间的分权；第二，有后来出现的自治的城市，自

治的城市并不在“封建”的权力范围之内；第三，在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封建”结构内，权力也是完全分散的。

土地分封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封臣一旦得到土地，就得到了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治理权，包括政治、经济、司法、军事、铸币、战争等。治理这块土地的是得到土地的人，不是给他土地的人，因此国王只要把土地封授出去，他就失去了对那块土地的治理权。这种情况在欧洲不同地方的表现形式不完全一致，但基本原则是一样的。封授土地的人和领受土地的人从社会地位方面看是一样的，所以国王和贵族属于同一个社会集团，只有封主、封臣之分，没有社会等级之分，这是典型的“封建”状态。

马国川：这和中国古代社会里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完全不同。在皇权之下，大臣们是为皇帝管理国家的官僚集团。

钱乘旦：如果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概念去套用，就难以理解欧洲的封建社会。英国的封建状态和欧洲大陆也有不同，就是英国的王权相对强大。

来自法国诺曼底的威廉一世在1066年征服英国之后，英国国王就保持了较大的权力，对贵族有较大的控制力，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封建的特性。从理论上说，每一个领主对自己的领地仍然是有完整治理权的。国王和贵族在同一个社会层次上面，有等级高低之分，但他们的身份是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也是相互的。

马国川：有个贵族在对国王的誓言中说：“和你一样优秀的我们向不比我们优秀的你发誓，我们接受你为我们的国王，至高的上帝规定你要遵守我们所有的法规和法律；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我们就不接受你为国王。”

钱乘旦：这段话很典型地说明，国王与贵族不是两种不同的人，这跟中国皇帝和臣子的关系完全不同。

《大宪章》的直接背景，就是因为约翰王破坏了封建规范，不断增加税赋，搜刮城市，和教会的关系也搞得很僵，因此贵族、教会、市民都反对他。1214年，约翰王在法国吃了败仗，丢掉了很多土地，回来后要求英国贵族继续跟他去法国打仗，贵族趁机提出要求，要他遵守封建规范，约翰王不接受，贵族们就拿起武器反抗；约翰王打不过他们，只好坐下来谈判，于是就在1215年签署了《大宪章》。

马国川：为什么《大宪章》后来被叫作《自由大宪章》？

钱乘旦：我们可能把“自由”理解为一个空洞的口号，现代人经常是这样。但在那个时候，“自由”是一些具体的规定，是习惯所造成的规矩，不可侵犯。比如对教会而言，自由就是教士们自己选举教会的官员，国王不能干预；对贵族来说，就是国王不能随便侵占他们的财产、增加税收和军役等。《大宪章》总共63款，其中大部分都是贵族们的条款，要求约翰王遵守封建规范。

《大宪章》的内容可以归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国王不可以任意地侵犯臣民的财产，占内容的50%以上；第二类是不可以任意处置臣民的人身，大约占40%；第三类是规定建立一个24人的贵族委员会，相当于执行协议的监察小组，可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情况，一旦国王违背诺言，就可以组织并号召臣民反抗国王。不过这里必须特别说明：所谓的“臣民”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指土地贵族，当时绝大多数人是农奴，没有人身自由，“自由人”是很少的。

马国川：看《大宪章》的原文，与现代宪法比较相去甚远。它没有关于国家架构、权力性质、公民政治权利的阐述，行文也不是法律文书或契约文字，而是国王对臣属与主教做出的承诺。它只是一份保

证书，所涉及的臣民权利也主要在财产权利方面，没有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表述。

钱乘旦：《大宪章》要解决的是时弊，而不是原则，当时并没有所谓的“公民政治权利”这种意识，这和后人的想象有很大不同。《大宪章》不是要设计一种政治理想，英国人从来不做这样的事。《大宪章》的实质就是封建时期的贵族、教会和市民要求国王严格地遵守封建规范，如果一定要给它定性，那么它绝对是封建的文件，主要是维护封建贵族的利益，涉及教会和市民，跟普通老百姓毫无关系，因为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农奴，没有自由可言。

此外，贵族和国王签署一个文件不是惊天动地的事，在约翰王之前，也有英王和贵族签署文件。从整个欧洲来看，类似的文件在其他地方也有过。

《大宪章》成为反抗王朝的旗帜

马国川：《大宪章》签署之后，是否得到了严格的遵守呢？

钱乘旦：从一开始就没有。签订《大宪章》的第二年，约翰王就公开把它撕毁了，双方的战争又重新开始，不过恰好约翰王在这一年死了，贵族强迫他的儿子亨利三世重新签订《大宪章》。后来几乎是每一代新君主，都会在贵族的强迫下签署一次，一共签过20多次，到都铎时期就停止了。为什么停止了？因为都铎王朝不是封建的王朝，而是一个专制的王朝。

在长达30年的玫瑰战争（1455—1485年）中，英国的封建领地军事贵族几乎都被消灭了，都铎王朝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启用一批新人管理国家，国王成为专制的君主，他和贵族间的“平等”关系不再

存在了；新出现的贵族只是协助国王管理国家的官僚，非常接近中国皇权体制下的官僚集团。作为一个专制王朝，都铎的权力渗透到全国，没有人敢挑战国王的权威。换句话说，专制王朝消灭了封建等级制。

马国川：按照流行的价值观来看，集权的专制王朝取代分权的封建社会应该是历史的退步。

钱乘旦：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统一的国家还不如分裂好？有些人动不动就把美国搬出来做榜样，那么美国是不是赞成它的国家闹分裂？其实，相对于封建社会的破碎状态，权力集中其实是一种进步，因为从西罗马帝国解体一直到文艺复兴，差不多1000年时间里西欧社会被封建制度撕裂了，成百上千个大小领主战争不断，民不聊生，经济发展和生活进步都谈不上。

这种情况使很多人希望看到强大的权力，比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理论家都鼓吹强大的王权，为什么马基雅维利的学说被视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的起点？因为他针对当时的封建分裂状态，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基于民族国家的王权理论，他希望看到强大的君主。

“进步”是一步一步走的，不是火箭升空。历史就是这样，必须先走这一步，才能再走那一步。政治制度从来都只是时代性的，时代赋予某种制度存在的理由，没有哪一种制度从来都是正确的，或者是永远存在的。

马国川：既然都铎王朝是一个专制王朝，贵族就失去了与国王平等协商的地位，国王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反复签署《大宪章》了。

钱乘旦：因此，《大宪章》慢慢地被忘记了。莎士比亚写的历史剧《约翰王》就根本没有提《大宪章》，这就证明那个时代的人已经不把《大宪章》当回事。

《大宪章》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是在斯图亚特王朝以后。1603年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统治英国。这个王朝一开始就和英国议会闹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大宪章》被重新搬出来，作了新的解释，赋予新的时代意义，目的是为了证明反对国王有道理。

马国川：400多年前的陈旧文件是怎么被重新解读的?

钱乘旦：例如，当初是不准国王剥夺贵族、教会和市民的财产，现在变成了不准剥夺任何国民的财产，因为到17世纪农奴制已经没有了，从理论上说任何人都是自由的，所有人的财产都不能被剥夺。这样，《大宪章》就变成“全民”的东西了。同样，所有人都不能随意被逮捕和关押，而不仅仅是贵族、“自由人”。总之，经过重新解释，“自由”不再限于《大宪章》最初所指的那些人，而是全体英国人的自由。反抗专制王权，也就变成整个民族的事业了。

尤其要指出，《大宪章》中规定假如国王违背诺言贵族可以拿起武器进行反抗，而全国的人民（不要忘记当时没有几个“人民”）都应该站在反抗者这一边；到了17世纪这个条款被解释成全体英国人拿起武器反抗国王，这样，议会就为他们反抗国王找到了历史的依据，《大宪章》也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旗帜。《大宪章》就是这样被赋予了现代的意义，改造成现代“自由”的标杆的。

1688年，英国完成了“光荣革命”。第二年，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大宪章》里面那些被重新解释过的原则被固定下来，从而为建立君主立宪制提供了历史的依据。英国人喜欢用历史的依据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而不像法国人，总要先编织一套理论，设计一套方案，然后才可以行动。

马国川：《大宪章》的历史地位就是从此奠定的吗?

钱乘旦：是的。17世纪英国发生了内战、革命、处死国王等一系列翻天覆地的事件，《大宪章》和这些震惊整个欧洲的事件联系起来了，自然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美国人又把《大宪章》的原则搬到他们那里去，反抗英国统治，这样，《大宪章》的影响就变成世界性的了。

《大宪章》的历史启示

马国川：能否说，到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的时候，英国已经认可民主政治的正当性?

钱乘旦：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当时英国是完全反对民主的，那时的欧洲人都不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在欧洲的话语体系中，民主是一个负面概念，是一个坏东西。亚里士多德说过政治形态有三种：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他并不认为民主是一种好的政体。直到法国大革命，才把观念翻过来。

马国川：启蒙运动中一些思想家鼓吹民主，特别是卢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民主哲学。

钱乘旦：因为有了英国革命，《大宪章》才变得重要；因为有了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才变得重要。法国革命那么大的影响力，由此才把民主的负面形象扭转过来，民主才变成好东西。

英国从光荣革命开始再也没有发生暴力革命，英国人学会了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就是用和平、渐进、改革的方式改变现状。《权利法案》的最大价值，是用议会立法的方式，确立了法治的地位。法治为民主制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只有在法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向民主制度过渡。

马国川：和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法国大革命时期把民主理念高高举起来，但是并没有成功实现民主。

钱乘旦：法国大革命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提倡没有约束的绝对民主。1793年制订的宪法，在字面上设计了完美无缺的民主制度，但这部宪法根本没有执行过，因为到1793年，法国社会已乱成一团，暴力决定一切，民主无法执行。我们必须知道，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被执行是需要有规矩的，而规矩就是法；只有严格地依“法”行事，才可能执行民主。

因此，英国和法国从正反两方面说明，首先要有法治，才可能实现民主。世界上大多数成功实现民主的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包括美国也是如此。1789年的美国宪法的核心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并不是民主。

马国川：许多人把英国走过的道路称为“渐进主义”，而把法国走过的道路称为“激进主义”。这种总结有道理吗?

钱乘旦：有道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出版过一本书《走向现代国家之路》，比较了英国、法国的现代化道路：英国走的是和平、渐进、改革的道路；法国选择的是暴力、跳跃、革命的道路。

其实，在每一次革命前，几乎都曾有过改革的机会，人们首先要求改革，改革的尝试失败以后才会发生革命。英国的渐进主义道路花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从来不会倒退；法国的激进主义道路上疾风暴雨，跳跃反复，代价极大。

最值得深思的是，法国几次革命都没能巩固共和国，1875年却由一帮落魄贵族在走投无路中把法国的共和制确立下来了，关于这个过程，可以看一看相关的历史记载。在法国，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不是靠革命，而是靠改革。

马国川：顾准在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之后，宣称自己"坚决走上了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就是要避免法国激进主义，他欣赏的是英国的经验主义。

钱乘旦：是的，英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奉行经验主义，碰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而不去构建解决人类永恒命运的学说。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来说，特别值得思考。其实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有这样的特点，只是近代以后慢慢丢掉了。

马国川：近些年《法国大革命》在国内成为热销图书，人们从中得出的一个普遍共识，就是要摆脱激进主义，寄希望于改革。

钱乘旦：现在中国只能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问题，首先要建立法治基础，才能实现民主。

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拔苗助长只会搞坏，搞坏了还不如不搞。我们有过教训：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心态越来越急躁，越急就越弄不成，"欲速则不达"。此外，民主制度究竟是什么，实质怎样，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但仍旧值得注意。

马国川：对于现在的转型国家来说，回顾《大宪章》的800年历史，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钱乘旦：我们不能从这个事件当中直接得到启示，那毕竟是800年前的事。《大宪章》提供了一些宏观命题，我们只能从这些命题中思考某些问题，比如说：民主和法治究竟谁先谁后，英国渐进的发展方式有什么优点，还有英国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给人们什么启发，等等。

总体而言，英国的道路是成功的，否则也不会成为世界上领现代化之先的国家。虽然说渐进式道路决定了行进的速度可能比较慢，但

是它走出的每一步都是稳定的，不会忽进忽退，国家稳步向前，政权变了也不会反复。在历史上，其他那些采用了英国式道路的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在那些国家中，民主政治具有最稳定的基础，它们的经验也最值得人们思考和借鉴。

最后，我必须再一次强调：《大宪章》解决的不是一个民主问题，800年前的英国贵族反抗国王，只是想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即封建贵族的利益，和“民主”这个概念毫无关系。今天的中国人千万不要搞错了，任意想象历史。

---

1.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化国家之路[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张森根，1937年生，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拉丁美洲研究专家。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学者慨叹：中国经济总量这么大，而且不久的将来可能要超过美国，可是真正研究世界各国的学者却很少，尤其是研究非洲、拉美各国的学者更是鲜见。不了解世界，又何谈大国？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纷纷叹息。另一位学者说，这个问题在拉美最突出，导致各种谬论流传。

确实如此。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改革时偶尔提到“拉美化”或“拉美病”。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地界定“拉美化”或“拉美病”的概念，只是笼统谈论拉美国家遇到的各种问题，如贫富悬殊扩大、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地下经济泛滥、对外资依赖性强、金融危机频繁和政局不稳定，等等。由于当时提及“拉美化”或“拉美病”的学者很少，因此他们的呼吁在国内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大回应[注]。

进入21世纪以后，问题更加严重。“拉美病”“拉美化”“拉美现象”“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莫名其妙的提法，都把拉美当作失败的典型。每当国内外学者谈论拉美时，常把它当作一种反面教材。

特别是在2004年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一些学者大批特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说拉美是新自由主义泛滥的实验所。在他们的文章里，拉美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新自由主义不但没有帮助拉美实现经济腾飞，反而使拉美国家进一步陷入发展的陷阱，等等。在一些媒体的宣传中，拉美似乎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其实，这些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明着谈论拉美，实则在对中国改革发表“高论”。比如，既然新自由主义把拉美搞坏了，中国当然应该远离、批判新自由主义；既然拉美的土地私有化恶果多多，中国就应该坚持土地集体化；既然委内瑞拉都坚持社会主义，中国更应该坚守现有经济和政治体制。

结果，真正的拉美被屏蔽了：拉美人民强烈追求政治民主，勇敢地反抗军政府统治，迫使军人“还政于民”；拉美国家实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成功，2000—2012年拉美的贫困率从42%下降到2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拉美的“人类发展指数”高于东亚、南亚和中东；智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是许多国家研究和模仿的对象……㊟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人大肆批评“华盛顿共识”，声称“华盛顿共识”导致拉美经济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引领中国成功的“北京共识”应该取而代之。

那些年，我为《SOHU小报》撰写专栏，每期都采访一位学者谈一谈当时的热门话题。2010年6月，我就拉美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张森根先生。

张森根先生从1965年就开始研究拉美问题，撰写和翻译了大量有关拉美的著作，是一位资深的拉美研究专家。他为人热情，快人快语，对那些流行的说法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例如，他对于“华盛顿共识”三个版本的辨析，对于“华盛顿共识”在拉美的真实实施情况的介绍，迄今仍然有意义。“华盛顿共识”还在不断地被人说起，“北京共识”似乎已被忘却。

诚如张森根先生所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拉美的进步，不能总是拿拉美说事，更不能拿‘虚构的拉美’说事。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拉美的历史和现状，分享他们的历史经验，以便与他们一起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民富国强，欣欣向荣。”

张森根：不要总是拿拉美说事

采访时间：2010年6月15日上午

采访地点：北京朝阳区拂林园

拉美的现代化道路不足为训

马国川： 近年来，拉美成为国内的一个热门话题。作为拉美研究专家，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张森根： 我想起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老话，“我们现在对拉丁美洲也还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一些报刊发表的关于拉美的文章中有的缺少了分析的眼光，报道的内容也不全面。有的不顾事实，故意炒作。怀有各种不同目的的炒作，真实的拉美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马国川： 拉美和中国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共同的背景可能是国人关注拉美的一个重要原因。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拉美的现代化进程?

张森根： 在现代化道路上，拉美比我们起步更早。但是总体来说，拉美寻求现代化的路程曲折，算不上成功。1800年时，拉美是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人均国民实际总产值（按1960年物价计算）达2500美元，超过北美（239美元）。到1900年时，拉美的人均收入只占美国的1/8。1995年时，还只相当于美国人均的12.8%。具体来看，拉美的发展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70—1930年左右），是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增长阶段；第二阶段（1930—1980年），

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增长阶段。由于推行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模式长达半个多世纪，拉美与东亚国家相比，也明显地落后了。

马国川：可是，如果只考虑单纯的GDP年均增长率或人均GDP增长率，1870—1950年，拉美的综合数字都高于西欧国家的综合数字或单个国家（如英、德、法）的统计数字。

张森根：80年间表面上光鲜的数字并不能改变拉美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处的边缘地位。究竟如何看拉美发展的问题，还可以从它们与美国相比较的研究中得到启发。经济史学者指出，1995年拉美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数字与1900年的百分比数字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拉美的经验告诉我们，表面的现代化，特别是只求GDP增长的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国家的发展问题。美国拉美学会前会长伯恩斯教授在他的著作《简明拉丁美洲史》里指出，起步于19世纪下半期的拉美各国的现代化，只是一种“表面性的现代化”，单纯地仿效19世纪欧洲和20世纪美国的现代化，不论在理念上或形式上都存在着这种毛病，无创造性可言。他指出：“这种现代化只是一层虚饰，为顽固的机制加上装饰性的点缀，同时却不去实现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改革。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缺乏真正的实质。”在伯恩斯看来，“发展”“进步”“现代化”等字眼，在拉美都走了样。在“发展”的名义下，甚至连“能够满足人民需要并为他们提供文化福利的传统生存文化”，也往往遭到了破坏。故而他把19世纪和20世纪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分别贬称为“进步的贫困”和“发展的劫掠”。通过对这一地区100多年现代化进程的剖析，伯恩斯得出的结论是：“发展（应该）是为大多数人民提供最多的好处。”

马国川：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拉美的“发展”和“进步”不能简单地和“现代化”画等号。

张森根：毫无疑问，如果大多数人民没有获得最多好处，经济权力的运作又始终由一小撮人操盘，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问题长期解决不了，甚至以恶劣破坏生态环境、无知无情又大量地消耗各类资源为代价，这样的国家能称得上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吗？伯恩斯认为，在拉美“殖民地历史长时期遗留下来并在19世纪得到加强的结构体制，至今还继续存在着”，因为，这里的上层人士仍然“趋于将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和愿望混为一谈”。而“维持现有体制比实行真正变革要容易得多”，这就造成了拉美永久的不解之谜——在具有巨大潜力的富裕地区却普遍存在着贫困。结论是，拉美的现代化道路不足为训。

拉美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吗

马国川：1980年以后，拉美逐渐抛弃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增长模式。

张森根：到1980年，由于推行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模式长达半个多世纪，拉美与东亚国家相比，也明显地落后了。所以，从那时起拉美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开始向出口导向和新型发展模式过渡。

马国川：有评论说，20世纪80~90年代处于转型阶段的拉美，成为战后以来经济最阴暗的萧条时期。

张森根：确实如此，这一阶段也是拉美各国迈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最艰苦的调整时期。由于涉及发展模式和现代化战略的重大调整与改革，拉美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失去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也经历波折，甚至陷入困境。1994—2003年，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连续三次发生了金融或经济危机，使拉美经济遭到重创。

马国川：国内有人认为，拉美之所以经历波折，是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后果，甚至说拉美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张森根：这种说法把1990年威廉姆逊制定的供拉美国家经济调整与结构改革参考的十条，等同于新自由主义，说“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是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继而推论说拉美的困难是执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

事实上，威廉姆逊本人并不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威廉姆逊提出“华盛顿共识”的本意，是为拉美国家确立一套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一般规则，和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再说，美国有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吗？美国政府奉行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里根政府早期和克林顿政府同新自由主义也扯不在一起。美国政府为解决拉美债务危机而推出的结构调整方案，一个是1985年的贝克计划，一个是1989年的布雷迪计划，统统在“华盛顿共识”出笼之前。再说，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经济政策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也不是一回事。例如，在分配政策上，美国官方从来不屑一顾，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关注拉美国家在这方面的进展。

马国川：看来，“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没有关系。

张森根：2005年威廉姆逊说，实际上有三套“华盛顿共识”的版本。第一套是当初他同10个拉美国家学者一起总结出来的，即原生态的“华盛顿共识”。第二套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的“华盛顿共识”。第三套是斯蒂格利茨心目中的所谓“华盛顿共识”。2005年底，前巴西中央银行行长Fraga撰文说，不要指责“华盛顿共识”，那些贯彻了“华盛顿共识”基本方针的国家，经济上都要比那些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去做的国家强些。智利最成功，墨西哥和巴西都不错。

马国川：那么，在您看来，造成20世纪80~90年代拉美经济停滞的原因是什么？

张森根：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原有的发展模式。这种被称为发展主义，国家干预主义或民众主义的发展模式，推行了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70~80年代早已弊端丛生，接着又陷入债务危机。拉美各国要进行结构调整，摸索新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出现波折，有时甚至陷入困境。经济市场化改革之路山高水险，难免一波三折。

拉美的经验和中国自己的经历，都说明经济改革的成功总是要付出一定成本。拉美国家经济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现在把它统统归罪于新自由主义，那么如果这些国家有的取得成功，比如智利，我们难道就要歌颂新自由主义吗？

马国川：说拉美是“新自由主义重灾区”的理由之一是，拉美收入差距大，基尼系数高。

张森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确实对拉美收入差距的拉大有重大影响，但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早在1970年前后就在0.44~0.66。这是发展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民众主义带来的，同新自由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拉美的收入分配问题是几代人造成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较满意的解决方案。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也超过了0.5，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相当均等到拉开这么大，比有些国家经过几代人才拉大收入差距的情况，冲击力要大得多。我国的经验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性、综合性的问题，决不应简单地归结于某一种经济理论。你总不能说，中国的0.5也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吧？

马国川：一些人士就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是搞新自由主义，同样，他们也把拉美的市场化改革都定性为新自由主义改革。

张森根：不能把市场化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画等号。20世纪80~90年代拉美各国的经济改革，除了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影响，新结构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实用主义的影响也不能低估。我认为，称它为经济市场化改革较为妥帖。

经过市场化改革，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拉美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到2004年，拉美经济终于走出了低谷，增长率达到5.6%，2005年增长4.3%，宏观经济趋于稳定。拉美在经济市场化改革方面也逐步走向了成熟。比如对中央银行的改革，不少学者认为是成功的。拉美中央银行现在基本上推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受选举周期和政党政治的影响，利率、融资等方面也不受政府的干预，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稳定价格、控制通货膨胀。金融体制改革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化改革最难闯的关隘。拉美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有重大借鉴意义。

拉美的民主化失败了吗

张森根：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拉美经过这20年左右的努力，在政治民主化领域里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进展，1990年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也逐渐交出了全部权力。除1991年9月海地军人政变后被联合国干预外，拉美各国普遍确立起宪政制度，包括议会制、选举制、政党制和军队国家化等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原则，即现代政治的宪政原则在拉美政治生活中都得到承认。文人执政替代军人独裁，政党政治取代兵营政变已昭如日星。尽管拉美政治民主的制度化尚是初步的，甚至是脆弱的，还待日臻完善，但这一领域里的进展对拉美国家经济市场化改革和今后的长期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马国川：可是，现在一些人士宣扬说，因为民主化的失败，拉美在“向左转”，拉美刮起了“红色风暴”，出现了“反美同盟”，等等。

张森根：拉美的民主化没有失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民主化进程中，拉美政党政治空前活跃，各类政党，不论老党和新党，右翼党和左翼党，不论内部的传统派还是新兴派都在市场经济规则和民主政治的大框框内施展身手，以便在现存的体制内赢得胜利，走向成功。尽管人口中的相当比例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运行不满意，对与市场经济相伴的收入下降，贫富差距拉大、贫困和失业不满意，但拉美大多数政党都不太可能与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根本冲突。他们的立场都在向中间道路靠拢，其纲领、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越来越接近，趋向性日益明显于对抗性和差异性。言词上再激烈的政党，一旦上台执政，就不能不守着上述这条政党政治的底线，即遵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而现实地面对国际国内严峻的挑战。“左派不左，右派不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左派”内部的分野并不逊色于“左右”之间的分歧。

拉美政党政治的经验表明，对所谓的“左右”之间和“左左”之间言词上的分歧，不必看得太重。重要的是，即使分歧再大，各方都不至于挑战现存的民主政治体制，如权力制衡制度、选举制度、军队国家化等重大规则。

马国川：那么，您怎么评论查韦斯等人采取的一系列国有化措施呢？在国内一些人士眼里，查韦斯的“新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全球化”的例证。

张森根：与其称查韦斯为“新社会主义”者，还不如称他为激进的民众主义者更为贴切。无论是老牌的民众主义领袖还是新生代的民众主义领袖，都鼓吹平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实施多阶级合作主义，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

路”在拉美当代史上反复出现过几次，庇隆主义、阿普拉主义等都奉行过这一政治路线。1968—1975年以贝拉斯科将军为代表的秘鲁军政府也宣称走“第三条道路”。当时军政府颁布了一部激进的土改法，采取一系列国有化措施，大搞社会所有制企业，并打出“第三世界主义”和不结盟的口号，宣称走一条“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独创道路，以谋求秘鲁“第二次独立”。最后还不是偃旗息鼓、中道而废?

拉美左翼政府近年纷纷上台执政,确实是事实，但上台执政的左翼和中左翼政府，总体上都是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的激进改革派或温和改革派，从政治信仰、理论渊源和政策主张等角度来分析，跟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一码子事。在施政方面，他们要恪守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等资产阶级政治文明通行的基本准则。一旦违背了这些基本准则，他们的执政地位就岌岌可危，政局云谲波诡，右翼就会重新上台执政。

马国川：有人以皮诺切特军政府为例，认为威权政府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说一民主就要出现民粹主义的大乱。

张森根：在拉美，威权主义政治真的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吗？与民主运动同步的则通常是经济危机，而不是经济繁荣吗？经济发展水平同稳定的民主制度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吗？至少，皮诺切特军政府下台后智利艾尔文、弗雷、拉戈斯三届政府的实际情况，显然与上述观点有抵忤。智利的经验证明，政治民主化照样会带来经济繁荣和持续发展。智利致力于解决贫困与不平等问题，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如说是智利政治制度的健全、政党的清廉化、法制的透明化、民主化带来的必然产物。经济增长固然是智利解决贫困、不平等问题的基础，但是只有建立了一系列政治决策，社会、行政、金融等制度性保障措施，这个问题才会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拉美独立后，在170~180年间，专制统治、民主和军人干政轮番交替，这虽然有文化、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但教训也是深刻的。造成众多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并不和谐、全面。在20世纪80~90年代才建立起稳定的政治民主制度，这对拉美今后社会较健康的全面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拉美的进步，不能总是拿拉美说事，更不能拿“虚构的拉美”说事。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拉美的历史和现状，分享他们的历史经验，以便与他们一起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民富国强，欣欣向荣。

---

1. 苏振学.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朱莉·阿·查利普.简明拉丁美洲史[M].王宁坤，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9月16日—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首任总理，为新加坡独立和崛起做出卓越贡献，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李光耀：一个政治强人的背影

我一直想采访李光耀先生，因此阅读了大量有关他的文字资料。遗憾的是，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溘然去世，当面采访永无机会，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回溯这位拥有世界声誉的政治家的一生，也通过他的眼睛重新打量世界和中国。

本来，再过五个月他将迎来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在国家独立50周年之日，无数荣耀和祝福将献给这位91岁的老人。但是，他最终没有等到那一天。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溘然离世。新加坡失去了“国父”，世界上众多政治家也怅然若失。

自古以来，政治家就是一群自信自负的人。但是当今世界的许多政治家，却乐于向李光耀请教治国理政之道。即使是与众多世界级领导人有密切交往的基辛格也说，“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新加坡首任总理、精神导师李光耀”。

在地缘政治的夹缝里纵横捭阖，不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等城市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化强国，他自己也从一个国土狭小的岛国领导人成为活跃于世界舞台的重量级政治家。这就是李光耀的故事。

孤独起航

“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多年以后，李光耀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那一天，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当时许多国家争取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被强加的：马来亚联邦将其驱逐，宣布“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

新加坡是个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小岛，曾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地带，并由此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周围都是充满敌意的大国，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虽然35岁的时候，这位律师出身的政治家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但是他从没想到自己在42岁的时候，将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怎样盖房子，怎样修引擎，都有专著教导。但是，还从没有一本书是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

李光耀说：“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国际社会的评论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将走投无路。一名评论员甚至把英国从殖民地撤出的情况跟古罗马帝国的没落相比。当古罗马军团撤走，外邦人接管后，古罗马帝国的法纪全垮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评论说：“花费超过1亿英镑建成的英国基地一旦关闭，新加坡的经济将会垮掉。”注

此时的世界正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之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影响巨大。大多数刚独立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刻板地坚持风靡一时的社会制度，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希望以此加快发展步伐。虽然事后证明，这

种干预性经济政策必然导致资源错配，增加官员的贪腐机会。但是直到苏联解体，这种理论才被推翻。

在时代的洪流里，李光耀没有迷失航向。他坚信，只要坚持维护社会秩序、给人民提供教育、维护睦邻友好关系、厉行法治、增强投资者信心，那么国家没有道理不发展。

在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独立国家里，民族主义往往高涨，统治者也乐于操纵和利用民族主义。但是李光耀不为民族主义所动，他保留下来新加坡第一位英国殖民者莱佛士的雕像。这个举动让西方投资者感到安心。

和中国香港不同，新加坡缺乏一批现成的企业家。为了经济发展，它的选择就是向跨国公司敞开了大门。新加坡的年轻官员们四处奔走"招商"，设法使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商机感兴趣，游说他们派团前来亲自实地考察。有些跨国公司甚至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只能在地球仪上辨认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

那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是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李光耀不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

"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李光耀说，"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李光耀坚信，如果能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准，新加坡就会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基

地。他决心把处于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创造为第一世界的绿洲。为此，他利用学校、工会、民众联络所和社区组织，重新教育新加坡人民，使他们改变想法和习惯。

后来中国各地方政府流行的招商引资的做法，30年前就在新加坡上演过。当时新加坡修建基础设施，提供精心策划的工业园。其中规模最大的“裕廊工业区”面积达到9000英亩，无论是公路、污水处理和排水设施、电力或水供，区内设备一应俱全。不过，在最初几年，裕廊工业区荒芜一片，人们称它是财政部长吴庆瑞的“愚蠢之作”。

从小心翼翼地进入到蜂拥而至，1970年时新加坡终于成为跨国公司的青睐之地。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疯狂的动荡时代。

跨国公司把各种工业带进新加坡，同时新加坡政府尊重跨国公司，让它们自行选择它们认为能成气候的工业。新加坡政府的任务，就是广泛拟定经济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期限，并按照时局的新变化进行调整，建造基础设施以及培训与教育工人来满足雇主的需求。

《时代》周刊等美国杂志，纷纷刊登有关新加坡的报道，热烈赞扬新加坡的辉煌成就。美国跨国公司不但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基础，而且把新加坡转变成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

通过贸易和投资，新加坡和主要工业国联系起来，而且随着蓬勃发展的世界贸易起步。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蒙受严重的打击。但是新加坡经受住了，因为此时它的经济已经起飞。

新加坡奇迹般地成为东亚的经济中心。

向新加坡学习

李光耀无疑是新加坡奇迹的缔造者。这位讲一口流利英语的新加坡人是一个华裔，一百多年前他的曾祖父从中国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随着清朝的没落，当时他的家乡正在经历一场大动乱。英国人建立的这个商业中心，让李光耀的曾祖父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好的生活。

李光耀生于忧患。在前半生，他就唱过四首国歌：英国的《天佑吾王》、日本的《君之代》、马来西亚的《我的国家》，最后是独立后的新加坡国歌《前进吧，新加坡》。外国军队来来去去，包括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还有日本人，然后又是英国人。

李光耀自幼就接受英式教育，12岁时考入当地顶尖的英校莱佛士书院（初中部），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中断学业。战争结束后，他荣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他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

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被卷入政治变革的大潮中。他由于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与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在工会中建立了群众基础，并与“左派”人士一起组织了人民行动党。然而，他最终和激进的极左人士分裂，并一直以“反共者”著称。他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他之所以反共，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领袖集权）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

197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来到新加坡。

在总理府会议室内的座位旁边，李光耀特意让人放了一个明代的蓝白色痰盂。因为两年前他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就发现会议室里摆着痰盂，而且有些中国领袖当着客人的面使用它。虽然总统府里规定不准抽烟，李光耀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摆了个烟灰缸。

不过，邓小平没有使用痰盂，也没有像在国内那样吸烟。这位年长19岁的政治家非常尊重李光耀。因为在三天的访问里，邓小平发现新加坡已经成为秩序井然、干净整洁的现代化国家。而在58年前，他在去法国留学期间曾在此驻留两天，那时的新加坡不过是一个肮脏混乱的殖民地。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邓小平向李光耀表示祝贺。

李光耀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这和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两位政治家惺惺相惜，尽管是第一次见面，却从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李光耀称赞说：“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然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邓小平邀请李光耀到中国访问。李光耀说，等中国重新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我就去。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李光耀不同意，他认为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新加坡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中国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李光耀的话显然打动了邓小平，进而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一个月后，“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

邓小平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

此时的新加坡，已经成为连接亚洲与世界的贸易中心，也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国际金融中心。它所面临的已经不是缺乏投资和就业机会的老问题，而是如何改善新投资项目的质量，以及如何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李光耀与邓小平结交，为新加坡打开了除欧美和日本之外的新腹地。

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也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在邓小平访问之前，中国的媒体把新加坡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在邓小平回国之后，这种说法消失了，新加坡被描述为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欧国家的改革都遇到了来自外部或自身的难以逾越的障碍，风光不再，中国才重新选择。

当时可供选择的是两种模式：东亚式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欧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像邓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赏“四小龙”，特别是新加坡的许多做法。在20世纪80年代，以威权主义的方式发展经济的东亚模式的弊病并未显现。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里明确提出“向新加坡学习”，“出国去看看并且要向各国学习。特别是向新加坡学习。他们有良好的社会纪律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应当向他们借鉴，并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强人命运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就像坐上了“一辆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

腾飞，一跃成为发达富裕的国家和地区。

“亚洲四小龙”的成就世界瞩目，新加坡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新加坡政府稳定而清廉，不仅关注推动经济发展，而且投资于公共住房，兴办令人羡慕的社会服务体系以及高度发达的教育事业。这一切让几乎所有的新加坡人在经济上都有保障。

“新加坡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因为我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某些变革”，李光耀曾如此总结说，“我们知道效仿西方和日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正如一位英国教授对中国学者所说，“没有奇迹，只有常规，按照先进经验办事，依靠国际支援。”

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世人瞩目，而其政治体制则备受质疑。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亚洲四小龙”是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代表。这种体制处于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之间，其特点是严格遵从政府的权威，而政府常运用压制性手段来维持和执行社会控制，从而有效地提高效率。

新加坡显然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这个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国家里，街头示威属于违法，违法者将被捕。未经警方许可，五个人以上的集会可能构成“非法集会”。在过去的50年里，这个国家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而且这个党一直控制在精力旺盛的李光耀手中。

曾任驻亚洲外交官联合会主席的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一书里说，“新加坡长期在李光耀总理家长式统治下”，“他容不得反对意见或批评，实行新闻审查，按照自己的观点厉行他的法治和秩序。在这个由单一政党——人民行动党——而实际上由他一个人统治的国家，不存在值得注意的反对派。”

李光耀对于这类批评嗤之以鼻。“我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李光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还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

早在当选总理之前，李光耀就公开说过，“我从来没有因为民意调查或欢迎度调查而过度忧虑或纠结过。我认为如果你为此而过度忧虑或纠结，你就是一位虚弱无力的领导者”，“当地位、声誉或实际效用不足以支持权威时，就必须采取措施应对威权面临的挑战。”

“在被别人爱戴与被别人惧怕的问题上，我一向都认为马基亚维利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这种公开认同马基亚维利的做法令人惊讶，因为李光耀在多个场合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

“任何社会要成功推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它的人民必须先得在教育和经济上达到高水平的发展，有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再只是为了基本求存而斗争。”李光耀说，“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

在20世纪下半叶，有一批政治强人活跃在东亚地区，包括韩国的朴正熙、中国台湾的蒋经国、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他们以实践验证着李光耀的观点。

1979年10月，李光耀在首尔的青瓦台会见了朴正熙。当时这位军官出身的总统已经掌权18年，在铁腕统治下把韩国经济发展得蓬勃繁

荣。朴正熙给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李光耀后来回忆说，“少了朴正熙，韩国也许永远也不会发展成为工业国。”

巧合的是，在李光耀离开五天之后，朴正熙就遭到暗杀。专制体制的缺陷导致他个人的悲剧。在李光耀访问之前不久，朴正熙似乎有所预感，曾在办公室里写下一副中国书法赠给他的女儿朴槿惠：“身与名俱没，江河万古流”。

类似的悲剧也发生在菲律宾。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曾单独问李光耀，马科斯是英雄还是奸雄？李光耀的回答是：马科斯或许一开始是个英雄，结果却变成奸雄。在这位游击队员出身的奸雄任期内，菲律宾农业、工业和教育都得到显著发展。可是在实行了20年军法统治之后，1986年他终于在人民的反对声中乘坐美国空军直升机仓皇辞庙，流亡夏威夷，直至客死他乡。

和这两位强人不同，台湾地区的强人得以善终。台湾地区在蒋经国的领导下，也实现了经济腾飞。李光耀和蒋经国关系密切，他称赞蒋经国“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20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解除了戒严令，着手推行政治改革。当1988年蒋经国与世长辞时，台湾已经开始平稳地进行政治转型。

我们不知道，这些在身边发生的历史巨变，是否对李光耀产生了影响。毫无疑问，李光耀是清醒的政治强人。1984年他就明确表示：“我们要想给后世留下积极的影响，不是通过抓住权力不放，而是通过权力交接方式……如果抓住权力不放，在自己虚弱的时候就会有人从我们手中夺走权力，到时，在‘谁是接任者’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没有发言权了。”

1990年，67岁的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担任内阁资政，接班人是他选择的吴作栋。

8年之后，李光耀在电视上看到苏哈托被迫下台的凄凉一幕。他说：“每当我想起苏哈托那个时候的窘境，就不免要庆幸自己提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政治局势和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卸下总理一职。”

但是世人都知道，内阁资政李光耀才是新加坡真正的主人。

辩护与反思

“眼看这么一个控制严密的泱泱大国先是颤动，继而失控，最终瓦解，真叫人瞠目结舌。”在自传里，李光耀这样描述苏联的解体。

这个划时代的事件震惊世界，也引发了新一波民主化浪潮。美国思想家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事实上，福山推崇的民主价值观并没有一统世界，相反，“亚洲价值观”在“冷战”结束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盛行一时。

东亚各国就像一行雁阵，翱翔在世界经济的天空。最早起飞的是日本，随后是“亚洲四小虎”，进入20世纪90年代又有“亚洲四小龙”加入行列。当然，还有中国。聘请李光耀担任经济顾问的越南也奋起直追。这些国家多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

成功的经济发展给东亚国家带来了不只是繁荣，还有自信。美国一位驻外大使在1993年指出，“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亚洲开始轻蔑地谈起西方的衰落，并把他们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归因于自己文化的优越和西方文化的颓废。

李光耀是“亚洲价值观”的代言人。他说，“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和新加坡人）的确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是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

“我认为民主制度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发展，”1992年在马尼拉的一次演讲中，李光耀直言不讳地说，“一个国家如果要发展自己，更需要纪律，而不是民主。民主过于兴旺，就会催生无纪律、无秩序的环境，这是不利于发展的。”

李光耀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并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于亚洲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儒家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归于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

1994年美国《外交》季刊刊登李光耀的长篇谈话记录《文化是决定命运的》引起了极大的国际反响。李光耀强调，东方社会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他抨击当代美国社会的崩溃，直言“美国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强加于别的社会，这一套在这些社会根本行不通。”他认为，美国“需要检讨其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基本设想，并在此过程中从东亚社会中学习一点东西”。

第二年，福山的导师、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台北发表演讲，把新加坡的模式同中国台湾的民主模式做了对比。他引述《纽约时报》的标题，总结出两种模式的差别：新加坡“干净而小气”，中国台湾“污秽而自由”。他的结论是：“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诚实和效率，则很可能伴随他入土为安。在一些情况下，专制体制短期内能有所作为，但是经验显示，唯有民主体制才能造就长久的好政府。”

李光耀则以挑战的口吻回应类似的质疑：“如果历史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即如果历史表明自由的民主制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请忽略我吧，不要宣传我，可以吗？”

正如亨廷顿所说，“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没有人在意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4年发出的警告。克鲁格曼在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里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马哈蒂尔总理于1996年对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宣称，“亚洲价值是普遍的价值，欧洲价值是欧洲的价值”。

仅仅一年之后，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没有逃脱这场厄运。这次崩溃暴露了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另一面：朋党主义、讲关系、搞贪污、走后门或私下交易。

李光耀承认，这些社会病态是东亚的老问题。这些陋习的确对危机有所影响，加剧了危机所带来的损害。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他开始了反思。

2000年，李光耀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公开表示，在信息时代，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了。这番言论使得许多人感到诧异。

后来，李光耀对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做了更详细的说明。他指出，在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是发扬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在这种情况下，“重农抑商”和“学而优则仕”的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显然就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了。

李光耀说，过去新加坡有望成功的人士通常都向往进入政界、行政部门或者军队，很少有人自行创业，成为企业家的人更少。东亚国家要想同美国竞争，必须先改变它们的文化态度，“必须接受一些文化领域的根本变革”。

“我必须改变我原来的观念了。”李光耀坦诚地说，“新加坡缺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需要改变固有的思维，接受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经济学家吴敬琏评论说，“李光耀确实是一位有眼光、有胆识的领导人。”

现实与未来

一个政治家是否伟大，不取决于他所治理的国土面积的大小。一个大国领导人，可能只是一位小政治家；一个小国领导人，也可能成为大政治家。

晚年的李光耀奔走于世界各地，是许多国家政府的座上客。在世界的各种论坛上，人们都认真倾听他的声音。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新加坡和亚洲。李光耀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在过去三代人的时间里，李光耀每次造访华盛顿，总有一大批人等着见他，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外交领域的高层领导，”基辛格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讨论会总是洋溢着一种很少见的坦诚氛围，他德高望重，而且经验丰富，每一位与他打过交道的美国总统都能从中受益。”

李光耀认为，在未来二三十年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他说美国肯定不会沦为二流国家，“只要世界继续以经济为主导，只要美国还能继续在科技创新领域中保住领先的地位，那么欧盟也好，日本或中国也罢，相信谁也取代不了美国当今所拥有的超凡地位。”

邓小平之后，李光耀仍然受到了中国历届领导人的尊敬。他们都认真倾听李光耀的意见，李光耀在不吝赞美之余，也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将不可避免地赶上美国。”不过他也指出，“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的劣势和需要克服的障碍比大多数观察人士意识到的都要多。在中国的治理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缺少法治。”

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之后，李光耀就向当时中国的智囊团表示异议：“这个词语本身就是矛盾的，任何崛起都是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他建议改为“和平复兴、演进或发展。”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行为文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国家。”

2004年，一位70多岁的中国领导人问李光耀：“你相信我们在‘和平崛起’上的立场吗？”李光耀回答：“是的，我相信，但有一点要说明。你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大跃进’运动、‘文革’和‘四人帮’，还见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过程。你们知道陷阱很多，而且知道如果中国要一帆风顺地不断发展，内部需要稳定，外部需要和平。然而，你们给中国年轻人灌输了太多对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这可能导致不稳定。”

因此，李光耀建议，“要让中国青年一代明白中国曾经因为闭关锁国和过度注重意识形态而犯的错误，这一点是至关主要的。必须向他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带着谦卑和责任感迎接挑战。”㊟

对于中美两个大国的未来，李光耀也感到担心。作为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一方面认为，“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它得容忍中国这个大国。”另一方面又认为，“谨慎起见，亚太地区应该维持均势，亚太各国之间的一个广泛共识就体现了这一点。这个共识就是美国在

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应该维持下去……这有利于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种稳定符合各方利益，包括中方利益。”

在飞速变化的时代面前，李光耀不但关心世界的未来，也努力推动新加坡适应时代的变革。当许多人还在说应该学习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治理的老话时，李光耀却说，“现在世界已经发生变化，我们也必须改变。”

新加坡也确实在悄然变化。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不再安于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制衡。

2011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为1965年新加坡建国以来历次大选最低；反对党则史无前例地获得六个议席，创下了建国以来反对党赢得议席的最高。不久，年近九旬的李光耀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

如果说，作为新加坡第一代总理的李光耀的作风是家长式的，那么面对时代变化，第二代总理吴作栋将领导作风转变为兄长式，第三代总理李显龙将领导作风进一步转变为朋友式。

李显龙说，作风的变化固然是因为自己与父亲李光耀的个性略有不同，但更大原因是因为时代变了，自己也不得不变。李显龙总理在2012年元旦发表讲话指出，经济发展将不是衡量国家状况的第一标准。

当一党独大日益受到质疑批评时，人民行动党于2009年开始推动政治改革，期待改革后的选举制度能公平对待各个政党，有利于选出强大政府和让国会发出不同声音。因此有评论家认为，新的新加坡模式正在建构。不过，这种转型仍然缓慢，最近一位新加坡媒体人出版《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就对缺乏民主自由的现状表示不满。

很显然，新加坡的转型得到了李光耀这位开国领导人的默许，甚至是支持。老路难以维持，转型已是必然。李光耀对于历史的走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

李光耀提醒新加坡：“在早期，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抵制住了第三世界的潮流，着力吸引跨国公司进入新加坡，而且我们这个做法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必须再次抵制第三世界中民族主义沉渣泛起的潮流，让我们的视野与行为体现出国际水准……”

世间再无李光耀

李光耀身材高大，直到晚年仍然腰板挺直，气度沉稳，望之如恂恂儒者。举手投足之间，又有英国绅士的风范。

或许意识到身后的各种议论，李光耀六年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从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

因此，李光耀说：“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他甚至充满嘲讽地说，“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尽管如此，李光耀仍将以政治家被人铭记。

世间再无李光耀。他的去世，宣告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东亚政治强人全部谢幕。

李光耀刚刚掌权之际，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是400美元，而现在已经超过52000美元。作为漫长而多变的时代里的一位领导人，李光耀不仅成功改变了新加坡，对于世界的影响力也超过了同时代的政治家。李光耀对于亚洲和世界事务的独特判断引人深思，必将成为塑造未来世界的重要“遗产”。

---

1. 本文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
2. 李光耀口述，格雷厄姆·艾利森，罗伯特·D. 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M]. 蒋宗强，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年5月19日—1938年11月10日），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总理及国民议会议长，被称为“土耳其国父”。

凯末尔：走向共和

2013年9月23日至28日，我参加“中国记者学者代表团”访问土耳其。期间参观古迹和清真寺，了解土耳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考察土耳其的发展现状，颇多感慨，回国后就写了这篇文章。

2013年10月29日，土耳其将迎来建国90周年。目前这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既是中东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伊斯兰国家，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2011年土耳其GDP增速达到8.5%，仅次于中国，而其人均GDP则是中国的两倍。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已经是世界第16大经济体，其目标是到建国100年的时候跻身世界十强。

可是90年前，土耳其还是奥斯曼帝国专制统治下的一块贫瘠落后的土地。正如清朝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一样，奥斯曼帝国当时被称为“欧洲病夫”。和中华民族比起来，作为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和宗教包袱的民族，土耳其走向共和的道路更加艰难。

它们完成了自己也不清楚的历史使命

1908年12月，年仅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在北京即位，成为大清帝国历史上最年幼的皇帝。而在四个月前，远在万里之外的另一个古老

帝国奥斯曼的第34任苏丹哈米德则被迫宣布，冻结了30年的宪法再度生效，奥斯曼帝国进入了真正的君主宪政阶段。

哈米德是一个悲剧人物，奥斯曼帝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在他上任后的第一年里制订的。这部1876年底正式颁布的宪法规定，苏丹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不对任何他人和机构负责。不过它也规定，帝国境内的所有臣民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和享有同等的权利，司法独立，保障人权和人身自由，保护私有财产。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开始出现“共振”现象。大清和奥斯曼这两个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的帝国，在19世纪上半叶几乎同时遭受来自欧洲列强的巨大压力，穷于应付。

不同的是，东方的古老帝国对于世界的大变局懵懂无知，除了极少数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外，执政者仍然沉醉在“天朝帝国”的旧梦里不肯醒来。

处于欧亚大陆的奥斯曼帝国则早已感受到世界大势的变化，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推进现代化。1869年奥斯曼帝国就颁布公共教育法，宣布12岁以下的儿童实行强制性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方式[注]。

不过，自19世纪中叶开始，反对独裁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倾向开始出现。作为“血腥暴君”的哈米德毫不手软。在宪法颁布的第三年，他就解散议会，严酷镇压立宪派。此后30年，苏丹权力明显膨胀，帝国的极权统治达到顶峰。有人评价说：“他（哈米德）企图恢复最后的东方式的专制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的帝国中的每一个自由的思想活动都在萌芽时就被扼杀。”同时为了应对时代变化，维护统治，他也推广新式教育和建设现代军队。

帝国的统治者几乎都本能地抵制变革。在遥远的东方，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也扼杀了“戊戌变法”。这场以民主宪政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仅仅推行了一百天，就以“戊戌六君子”喋血街头而告终。

高压政策似乎是有成效的，但是静水深流，在平静的表面下政治革命的浪潮奔涌。高压政策导致宪政倾向和独裁统治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召开立法会议，启动宪政进程。第二年波斯也颁布宪法，实行宪政改革。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反对派在国际形势的鼓舞下，加快了行动。

就像清末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一样，在奥斯曼帝国也出现了“土耳其青年党”。不同的是，前者致力推翻帝制；后者主张恢复宪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以此来捍卫奥斯曼帝国。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个革命组织里都有不少帝国军队里的军人。同盟会里有蒋介石，“土耳其青年党”里有凯末尔，两人当时均籍籍无名。

在近代史上，帝国的统治者都渴望“船坚炮利”的军事现代化，许多年轻人因此被派到国外的军事院校去学习。有相当多的人除了学习军事技术，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西方的思想意识。因此推翻旧制度的往往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帝国的军人。

1908年7月，“土耳其青年党”的部分军官发动兵变，威胁苏丹如果不接受宪法，他们将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苏丹哈米德被迫恢复中断30年之久的宪法和选举，由此开始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二次次宪政运动。

第二年，统治帝国33年的哈米德被废黜，穆罕默德五世被推举为新苏丹，颁布新宪法。新宪法仍然沿袭了30多年前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不过明确限制苏丹的权力，进一步保障公民权利。它规定，20岁以上的帝国公民皆享有选举权而不受财产资格的限制，公民享有结社的权利，内阁政府对议会负责而不再对苏丹负责。

就在奥斯曼帝国里的宪政运动迅速推进的同时，大清帝国里的立宪运动则迭遭打击。1907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但迟迟没有进展，同时对联名上书请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的立宪派予以打击。直到1909年，在慈禧去世前3个月，清政府才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同时公布“宪法大纲”作为今后的制宪纲领。大纲参照20年前《日本帝国宪法》而制定，但是删去了日本宪法中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开篇即强调“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这部以维护清朝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宪法大纲”让立宪派大失所望，体制内改革派力量流失殆尽，只剩下一些颟顸的宗室弟子横行跋扈，恣意弄权，终至天怒人怨。1911年10月10日，帝国花费重金训练出来的新军在武昌起事，海内响应。4个月后，六岁的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宣布“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自此垮台，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体制也随之结束。

在大变革时代，统治者不肯放弃权力，以各种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几乎是历史的成例。不管是大清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都不遗余力地推进军队现代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在自掘坟墓。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们完成了自己也不清楚的历史使命。

“我不做凯末尔，但我却很羡慕”

在确立君主立宪之后，奥斯曼的军事领导人试图加强帝国，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他们试图提倡忠于奥斯曼帝国，却引起民族意识觉醒的各民族的抵制。在横跨亚欧大陆的辽阔疆域里，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从属民族不断反抗。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使得奥斯曼帝国陷于混乱之中。

1914年开始，一个又一个的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外交大臣格雷伯爵哀叹道："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为"同盟国"，在战场上与"协约国"厮杀。4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失败告终。战败国不但损失惨重，而且面临被肢解的危险。

战争期间，协约国就先后签订四个秘密条约，蓄谋将奥斯曼帝国分割给俄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战后，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屈辱的停战协议，英、法军队进入首都伊斯坦布尔，成立军事管理机构，苏丹成为傀儡。希腊和意大利也分别由爱琴海和地中海登陆，希腊军更是长驱直入，威胁到安纳托利的心脏地带。

自从公元七世纪以来，安纳托利高原一直是土耳其人的家园。在危急存亡之秋，已经成为将军的凯末尔受命来到安纳托利高原。这位童年丧父、成长于亲戚家中的职业军人个性刚强，具有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率军防守达达尼尔海峡，打败英法联军，被誉为"伊斯坦布尔救星"。

1919年5月，正当中国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时候，凯末尔在安纳托利高原东部召开"东部各省保卫主权大会"，正式把这里作为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的政治舞台。凯末尔反对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条约，愿意放弃旧帝国的阿拉伯诸省，但是拒绝割让小亚细亚、伊斯坦布尔和土尔其海峡。他呼吁筹建新的民族政府，捍卫主权独立。

一年以后的1920年4月，新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土耳其中部城市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苏丹政权，"在伊斯坦布尔的那种依靠个人统治权形式的政府，1920年3月16日不复存在，至此已经永远成为历史"。奥斯曼帝国的末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仓皇流亡国外，延续了六百多年的奥斯曼帝国黯然谢幕，以凯末尔为主席的新政府成立。

这时候，年轻的“中华民国”却在内乱中不能自拔。民国成立后，军人武力日渐崛起，北洋军阀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南北对峙，相持不下。而协约国显然不愿坐视近在身旁的土耳其独立，出兵镇压。

年轻的共和国不仅要与苏丹势力做斗争，而且要与获胜的协约国作战。同仇敌忾的土耳其人团结在凯末尔周围，为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富有灵感的凯末尔巧妙地利用协约国之间的严重分歧，分别与他们缔结条约，分化瓦解。

1922年9月，土耳其在士麦那大败希腊军队。凯末尔骑着马进入这座地中海地区最古老的城市，宣告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经过长期的艰苦谈判，1923年9月《洛桑和约》签署，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新土耳其的认同。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首都从易受攻击的伊斯坦布尔迁到小亚细亚中心地带的安卡拉，在大选中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

而在半年前，“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则在北京抱憾而终。这位年长凯末尔15岁的民主先行者在临终前仍谆谆告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革命思想在各殖民地中得到传播。正如一位美国的黑人领袖所预言的那样：“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

战后民族革命的高潮在世界各地出现。在所有反对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中，土耳其最惊人，也最为成功。在所有的同盟国里，有能力反抗获胜的协约国，并迫使它们修改媾和条约的只有曾经被人轻视的土耳其。虽然与奥斯曼帝国比起来，新的土耳其疆域要小得多，可是这个新主权国家的民族构成与政治疆域相吻合。

1924年，土耳其颁布新宪法，正式宣布国家实行共和制的政体形式。新宪法赋予土耳其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规定年满18岁的土耳其男性享有选举权。宪法还给予妇女选举权，并允许她们参加议会。新宪法为共和国的发展提供了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从19世纪开始的宪政运动终成正果。

此时，比土耳其共和国年长12岁的“中华民国”仍然在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奋斗。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曾经有一个时期是以土耳其为榜样的。清末以来，康有为专门写过介绍青年土耳其革命的文章，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也一直在研究土耳其。蒋介石在日记里曾写道：“我不做凯末尔，但我却很羡慕。”

1925年，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率军北伐，到1929年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可是中国宪政运动仍然没有结果，因为按照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设想，“革命”成功之后，还要再经过一个“训政阶段”，然后才能“还政于民”。

“土耳其必须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

近代以来，许多国家致力于推进国家现代化，希望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然而进入20世纪，民族主义思潮蓬勃兴起，一些文明悠久的国家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和盲目崇拜科学是冲突的产物，而自己古老的精神文明可以矫正这种不平衡现象 (注) 。不管是中国，还是土耳其，都有这样的思潮在涌动。

这种转折很难说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其中郁结着浓厚的情绪，也折射着一个自豪的文明被不受欢迎的外来者压制所导致的不满。就像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所描述的那样：“你用枪炮、铁路和商业闯入这里，高高在上；不过，在文化和道德上，我们要高于

你们。我们终将把你们踢出去，让你瞧瞧。”与此伴随而来的，是对西方事物的仇恨，继而就是反对现代化，因为接受现代化就是承认西方的先进性。[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苏俄革命的成功，现代化似乎出现了另一条道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好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的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人们需要和平。布尔什维克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和苏维埃政权的主动示好，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中国创造了一股澎湃的思潮。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也开始“以俄为师”，按照苏俄模式改组国民党。这两大事件的产生扭转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以西方的科学、民主和文化作为共和国新秩序基础的思想被抛弃，中国开始进入顾准所说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

土耳其似乎更有理由敌视和反对西方。作为曾经辉煌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国度，土耳其不仅有历史资本，也有现实思想资源，更何况近代以来它饱受西方的压榨和欺凌。

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东大地上的另一位强有力人物、伊朗的礼萨汗就坚决拒绝接受共和主义和议会，认为它们太混乱，威权君主是帮助难以驾驭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

不过，凯末尔既没有选择苏俄的“新路”，也没有像礼萨汗那样走“老路”，而是义无反顾地走西方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他说：“为了生存下去，土耳其必须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为此他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废除君主制，坚持共和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耳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来源。“主权在民”的原则——“土耳其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利益统治自己”得到了1924年宪法的确认，而且得到了土耳其共和国后来几部宪法的尊重。

凯末尔倡导平民主义，要求建立民治民享的政府。他说，与奥斯曼帝国完全不同，新土耳其的政府是平民主义的政府，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民族的生存和保证国民的福利”，好的政府就是能够达到这两个目标的政府。

虽然为了加快现代化，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也倡导国家主义，但是这种国家主义绝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调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工业化运动同样是民主化的强大推动力，也是我们革命活动的基础，”凯末尔如是说。

凯末尔主张建立现代政党，引进直接选举机制，从而“使民主思想和现代文明的原则成为共和国的法律和司法的基础。”这位强权人物欢迎就国家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他曾对手下的将军们这样说：“议会和报纸就是在这里监督和批评政府和军队的，我的将军们，请你们最好习惯这一点。”

建设“现代文明国家”是凯末尔的终生奋斗目标。他说：“在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在民族的思想教育中，我们的指南将是科学与技术，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作为一个90%以上人口都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土耳其在漫长的数世纪里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传统势力的土壤深厚。凯末尔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社会领域进行了一场世俗化的改革。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规定，除教职人员，任何人一律不得身着宗教衣帽，政府工作人员必须穿西服戴礼帽。后来又强制所有男子必须戴礼帽，凡戴土耳其帽者将依律治罪。

因为改革涉及每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因此震撼力比废除哈里发制度更为强烈。凯末尔带头脱下军服，换上西服，以为国民表率。

土耳其还在文字、语言和历史方面消除伊斯兰教的痕迹。文字改革的措施最为激烈。1928年大国民议会通过法律，将土耳其文字拉丁化，规定不允许公开在土耳其语中使用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这种土耳其文字的书写形式，表明土耳其民族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认同。文字改革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反叛，为通往新时代之路扫清了障碍。

1938年11月10日，年仅57岁的凯末尔因病去世。在执政的15年里，一个崭新的土耳其已经确立。这个国家不但拥有比较完善的现代政治制度，还有独立的经济体系，而且国家与社会的联系超越了传统的方式，成为一个既现代化又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社会。

历史的“扳道夫”

在凯末尔去世前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授予他“阿塔图尔克”（即土耳其之父）的荣誉称号。在这位民族的伟人去世后，国家建造了一座庄严宏伟的“国父陵”。

“国父陵”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可以俯瞰“土耳其的心脏”——安卡拉。遥望天际线处，尽是连绵的山丘。在这个古老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凯末尔为民族的独立而战斗，也为民族的民主事业而推进改革，义无反顾。他将土耳其推上了民主的轨道，从此土耳其再也没有走回头路，也没有“脱轨”。

军人政治是20世纪中东历史的重要内容，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也曾发生三次军事政变。不过每次军方都辩称是为了恢复民主的程序或者改善民主的缺陷，干预后他们确实遵守诺言，很快就将政权交给经过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因此，军人的干预并未导致政治民主化进程

的中断和独裁政权的建立，反而促进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军人成为土耳其民主的守护者。

经过多年的发展，土耳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并相对成熟的民主制度。尽管政党政治在形式上似乎纷乱不已，但是无损于土耳其共和国民主的根基。无论有何种政治倾向，政党主导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最可能的途径，就是在既定的民主框架下赢得更多的选票。上台后的所有努力，也是“改善民众的生活品质，提高民众的政治权利”。

马克思·韦伯曾指出，有些杰出人物扮演了“扳道夫”的作用，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凯末尔就是土耳其的“扳道夫”。

---

1. 本文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哈全安,周术情.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
2.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六版）[M].计秋枫，朱庆葆，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3. 迈克尔·罗斯金.国家的常识[M].夏维勇，杨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卡扎菲（Mu’ammar al-Kaddafi，1942年6月7日—2011年10月20日），1969年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利比亚最高统治者，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

哀卡扎菲

2011年10月20日，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的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的一个废弃下水管道中被捕，随后被乱枪打死。这个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国内则出现了不同观点的尖锐对立，争论激烈。这篇文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

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意大利的一幕，又在隔地中海相望的利比亚上演了。

1945年4月27日，墨索里尼在逃亡途中被游击队发现并俘虏，翌日被枪决，尸体随后被运到米兰，倒吊在洛雷托广场上示众。

时隔66年，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在逃亡途中双腿中弹，躲进了下水管，最终被拖出来，中枪身亡，尸体被放在米苏拉塔城的一家冷藏库里示众。

想一想那些死在卡扎菲独裁统治下的万千利比亚公民，卡扎菲今天的下场固然并不值得同情。相反，人们更应该纪念卡扎菲暴政下的所有牺牲者。可是，这位69岁的老人临死前惶恐的眼神、浑身的血迹，不免令人顿生恻隐之心。

诚如奥巴马所说，卡扎菲之死标志着卡扎菲政权走到尽头，利比亚人民漫长痛苦的篇章画上句号。可是，卡扎菲的悲剧还没有完全结束。

他的妻子和三儿一女在国外流亡，命运未卜。他的五子穆塔西姆俘虏后被枪杀，他最器重的次子赛义夫也已被俘，而且失去了双臂。五个月前，最小的儿子赛义夫·阿拉伯及三个孙子在西方联军对首都的黎波里的空袭中丧生。假如卡扎菲地下有知，面对儿孙，是否也会发出“奈何生于帝王家”的浩叹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丝毫不奇怪。纵观历史上的专制政权，开始多有“大丈夫当如是”的豪迈，可是结尾总是逃不脱“奈何生于帝王家”的沉痛。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几乎完全相同，开始时得意洋洋，死也不肯放松权力，最后非要被逼上吊不可。尽管各个王朝寿命长短不一，总是要经过流血改朝换代，再流血再改朝换代，永远在封闭的系统里循环，以万千生民的鲜血作为润滑剂，没有政治文明可言。

任何独裁专制政权都是相似的，它们都以暴力来维持运转。对于卡扎菲这样以暴力夺取政权的独裁者来说，最自然的选择就是以暴力维持已经到手的权力，因为权力是他们的“通灵宝玉”，绝对不容他人染指。因此，囚禁、绑架、暗杀等为现代政治文明所唾弃的黑暗政治手段，反而成为这些独裁者们惯用的“撒手锏”。20世纪40年代，“左派”人士骂国民党不搞民主，有个对联写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注)。

这副对联活画出卡扎菲式独裁者的骄横嘴脸。由于他们使用黑暗政治手段维护独裁统治，在位时间越长，积怨越多，“退出成本”越高，所以他们往往选择“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方式，将国家权力

私相授受。虽然父子相残、斧声烛影的故事也不少见，但是比起外人来，至少自己的子弟不会挖祖坟吧。

在世界历史上，一家一姓可以统治数代，乃至数十代。然而20世纪以来，独裁者往往及身而亡，“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如此，卡扎菲亦复如此。

以此观之，卡扎菲今日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然而，人类的政治文明已经在100多年前提供了新的可能。这就是民主体制。一个政治家可以通过竞选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即使数年后被选下去，也是安然退场，不用担心“身死名裂”。假如自求进步，还可能重新上台，再展宏图。

诚然，由专制政权转向民主体制很难。对于握有权力的人来说，放松双手比握紧双手要困难得多。就像蒋经国所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假如卡扎菲像蒋经国一样，放弃一己之私，早日开启利比亚民主化大门，必会成为传奇人物。在世界政治文明浩浩荡荡的21世纪，卡扎菲昧于世界潮流，一意孤行，终落得家破人亡的凄惨下场，难道不值得人们哀之、悯之?

令人奇怪的是，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脑袋里有“贵恙”的人，厚诬民主体制，为专制辩护。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我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来诅咒一切反对民主，维护专制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民主，维护专制者！”

卡扎菲死了，故事还没有结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寄语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衮衮

诸公：民主潮流，势不可挡。顺势而为，名垂青史；逆势而取，身败名裂。何去何从，慎之慎之。

---

1. 马国川.告别皇帝的中国[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后记

这是一个媒体人生存艰难的时代。在各种压力之下，一些媒体朋友转型，更多的则留下来坚守。每一个真正的媒体人身上，都有一个自由不羁的灵魂。虽然未来变幻莫测，但是媒体人心中的理想主义永远不会泯灭。

这里收录的采访及文章，大部分刊登在我服务的《财经》杂志。作为一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媒体，《财经》杂志秉承“独立立场、独家报道、独到见解”的理念，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作为《财经》杂志的一员，我感到自豪。感谢《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先生为本书所写的精彩序言。感谢《财经》杂志同仁们对我的宽容和帮助。

特别要感谢吴敬琏先生、资中筠先生、柳传志先生、俞可平教授、钱颖一教授。他们是我非常敬重的师长，我经常从他们的文章和谈话中获得教益。他们为本书写了热情的推荐语，让我非常感动。他们的鼓励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在采访中，得到了许多师长和朋友的无私帮助，他们是：邢玳琪、刘波、何迪、左军、Schuyler Schouten、周舸、高战、文克坚、石岚、宋以敏、李昕、叶彤、韦森、王宁、许成钢、肖梦、吴素萍、文贯中、宋丙涛、聂思克（Krzysztof Nieszwiec）、周宇、何怀宏、李猛、贾宝兰、杜文棠、胡瑞连、陈南渝、孙伟林。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信出版集团的各位领导和编辑为这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特致谢忱。

衷心希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马国川

2015年9月20日于北京